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历史学概说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史学概论”无论就一门学科看，还是就一门高校历史系的必修课程看，无疑都是新的。我校历史系最早正式开设这门课程是在1984年。到现在为止，大约有十年时间，这门课程曾先后在本系本科、分校本科、本系夜大与函授的专科等学生中进行讲授。学生反映学习了这门课程后，对于自己在历史系的专业学习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此，因为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各段历史专业课程，都是以史为主、兼及本段历史的一些具体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但是，却缺乏对于史学自身一些根本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显得缺少一门能够超脱于具体各段历史之上而又能够驾驭、帮助各段历史学习与研究的课程。史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力图解决这个问题。

正因如此，“史学概论”应当被视作是高校历史系学生学习历史专业的一门入门课程，设置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其所讲授的内容应该包括有关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其学习和研究史学的某些基本方法。重点是应用。这样，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后，就会促进对其他历史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从事初步的史学研究工作。果真如此，这门课程便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诚如白寿彝等许多先生谈过的，“史学概论”这门学科和课程，涉及到了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法等几门学科与课程的内容。为此，在本门课程中势必要讲到这些。但是，又不能是上述几门学科和课程的重复或“拼盘”，而应该融汇其精华于概论之中，自成体系。同时，它还应该充分地吸收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问题，面对现实，引导学生关心并勇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借以缩短学生学习历史与研究历史之间的距离。

根据以上的考虑和宗旨，本门课程和教材主要是讲了史学研究的特点，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论文、历史书著的撰写、编纂等几个问题，希望学生学习本门课程以后，能够对于史学这门学科有个基本的认识，并且初步掌握它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为学习其他历史系的专业课程和进一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本教材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由孙恭恂撰写；第三章由马卫东撰写。

在我们编写本教材时，参考了前此已经出版的《史学概论》、《历史学概论》、《历史科学概论》等相类似的书籍，从中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教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出来，谨向以上书籍的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教材中的错误、疏漏，定然不少；一方面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予以补充、改正，另一方面恳切地希望同行们给予指正，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能够得到提高、补正。

孙恭恂
1993年12月

历史学概说

第一章 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

一、基本概念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很清楚，欲弄清史学研究的特点，必先要弄清史学研究的对象即历史的“特殊的矛盾性”，弄清历史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史学，就应该先研究什么是历史。

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认识是，世界由物质组成，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这个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便是历史。因此，历史的一般性定义就是这种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但是，认真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还有以下两层意义。

第一，它有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的区别。“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既包括自然史，也包括人类史的“历史”，就是从广义上对历史的理解。而单单指人类社会史的“历史”，便是从狭义上对历史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常说的也是史学所要研究的“历史”，应该是指的狭义理解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史。

第二，历史应该是人类社会活动发展的过去形态。这是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现实形态相对而言的。在佛教寺庙里，供奉的主佛像一般都有三尊，称“三世佛”：一尊是代表过去“世”的燃灯佛，一尊是代表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一尊则是代表未来“世”的弥勒佛。这里也明确地将“世”划分为三，有过去、现实和未来。我们史学所要研究的历史，就正是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世”，即过去的形态。

二、主要特点

人类社会史作为世界的“某一现象”，明显地与其它的一些现象有着区别、不同，也即是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前提。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了人才有人类的社会，也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因此，正象李大钊说的：“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这样，无疑地历史所首先表现的就应该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包括了征服自然的和社会实践的活动。

第二，一度性，又称一去不复返性。

虽然作为历史，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动还不象某些自然界的现象，可以“重复”地出现或者经过实验人为地让其“再现”。例如，生物界的植物，一年四季从种子种植、胚胎生芽、长成根茎、开花到结出果实这样一个过程，一般地每年就都至少可以“重复”一次。物理中的电磁感应现象，亦完全可以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一次又一次地予以完成。化学中的现象也是这样，某些元素的氧化和还原，就都可以在一定的设备下，经过实验或者工艺流程，使之反复地出现。人类社会的活动却只能是一过即逝，谁人再也不能让其“重演”。秦朝过后是汉朝，隋朝灭亡续大唐；前朝一切只能成为故事，再也不会出现在新朝的历史中。正象《红楼梦》中说的那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曾经演出过叱咤风云历史活剧的帝王将相们，一个个地只能作古，是不能再生的。他们所表演的历史活剧，自然也就只能够载之千古，而不会再现于后世重演。

第三，复杂性。这是与自然史相比较而言的。自然界是没有意识的存在，在自然史上充满自然力的支配，但一切都是在一些全然无意识、无辨别力、无目的的因子（动力）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下运动与运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却不是那样“简单”，它在受着历史规律支配的同时，还受着有意识的人的牵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归根结蒂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创造历史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着各自的意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得好：“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所以，如果把历史比作是一个有血有肉、情节曲折、妙趣横生的长剧的话，恰恰人就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

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但是它不仅要存在、发生在这些人的活动中，而且通过千千万万的有生命、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才可以实现。这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的运动相比，显然是要复杂得多，甚至容易给人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

第四，统一性和多样性。

人类客观历史的统一性，又可以叫做普遍性，是指历史所共同的东西、普遍的存在，其实际所说的即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如人类历史的物质性、运动性等。一般地说，这种统一性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7—19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同国家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有着共同规律的，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当然，如果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的话，它又可以包括如下的三种类型：

其一，能够在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起作用的规律，所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规律。我们常说的人类社会的五种形态及其依次进行的顺序，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列宁就说过：“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然后“农奴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即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其二，仅仅在某一个社会历史阶段起作用，而并不能够适用于其它社会历史阶段的规律。例如，关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就只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而并不能够在无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挥作用。

其三，为某一个社会或某一种社会现象所独有的规律，哲学上又称“个别规律”。例如，在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的规律等。

凡此种种，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或其某个阶段、某个时代某一社会现象的共性、普遍性，也即是统一性。

历史的多样性，指人类社会历史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事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是雷同的，哪怕是在一个极其微小的事情上或者极其短暂的瞬间里。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例如，就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形态看，有些民族（如欧洲历史上的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就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径直地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中国及一些不发达的民族主义国家，还经过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社会历史阶段；其中，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阶段，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有不少都经历了飞跃的发展；有的从领主封建制社会直接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西藏地区和云南的傣族地区；有的从奴隶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云南凉山地区；也有的则从原始社会径直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东北的鄂伦春族地区，等等。再如，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其社会形态和性质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众所周知，就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进程和因素来说，又都是极不相同的。英国、法国、美国不同，日本、德国更是迥异。

凡此这些，都是历史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和有力证明。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47页。

在历史发展中，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辩证地存在于一共的。任尔历史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是，却都要受着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制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讲了“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愿望及其对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的话后，就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在这里，能“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显然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是由这些规律所决定的了。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这一切人们“动机”背后和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与此同时，历史的统一性即规律性，又是只能通过历史的多样性即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的历史进程，才能够体现出来。例如，正是通过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统治，两次内战以及被称之为“光荣革命”的1688年的宫廷政变等一系列的具体事件，体现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资产阶级革命、确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同样，通过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都能体现出这个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后新的生产关系又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基本规律。因此，我们说历史的统一性是寓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的。历史的多样性是历史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了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无从谈起。

这在哲学上，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但是，任何一种物质的运动形式又是具有着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而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则是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毛泽东还进一步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显然，在看待历史上，如果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不了解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正确关系，也就是等于不了解乃至抛弃了辩证法。

第五，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又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例如，历史上一次大的战争，其爆发常常是由各种经济、政治乃至思想观念因素所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则可以视为是这些国家内政的继续。换句话说，其爆发带着有着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但是，究竟爆发在何时、何地，由何个导火线来引爆，却是往往带有偶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世界的复杂矛盾引起的，尤其是当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以后，战争更是一触即发了。它的爆发绝对是必然的。但是，18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波希尼亚”成员普林西刺杀却成了这场大战的导火线。这是个偶然事件，当时许多国家都始所未料。一些国家的首脑在事后才发现，这是个难得的挑起战争的“借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哲学概念上讲，必然性是客观事物与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必然性就是规律性的一种体现。偶然性则不带客观事物与现象的本质联系，是不能够改变客观某一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它常常不与规律相联系。具体到人类历史，必然性则表现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从中表现出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而偶然性却是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以何形式表现，由什么历史人物去完成，以及它的结局怎么样，等等。

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互相联系的辩证关系。

1. 历史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形式。秦王朝的建立，是在承袭了战国时期封建割据、连年战祸之后，其时战争的残酷犹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那时，社会经济的残破和人民生活之艰难是完全可想而知的。刚刚“得离战国之苦”的秦王朝不仅不思“休养生息”，反而修阿房宫、筑骊山陵墓、建长城、伐南越、戍五岭、徭役、兵役极度的繁苛，再加上它又专任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从而造成了“赭衣塞路，圜圉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其兴也暴，其亡也暴。秦始皇所定下的秦朝“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只能够是个幻想，其速亡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却并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经由了秦末农民战争才得以完成。公元前209年秋，一队900人的戍卒走在安徽宿县大泽乡，“遇雨失期”，这时戍卒有个胸怀“鸿鹄之志”、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奋臂一呼，于是大家“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掀起了这场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后来，虽然陈胜败死，然“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正象贾谊概括的那样：“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一作用显然带着许多的偶然性，如“遇雨失期”，九百戍卒中有个陈胜存在，乃至戍守渔阳的遥远，大泽乡的地理位置、气候等，但是，恰恰是这一事件完成了秦朝灭亡的历史必然，而秦朝灭亡的“必然”也就是以这些“偶然”的具体形式，得以实现。

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得以实现，还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即假如没有这个偶然事物，则还会有另一个偶然的事物产生出来，最后实现其历史的必然。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就说得十分好：“这里我们

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表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这里，“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恰巧就正表现出了历史的必然，而“他就会出来”且不论这个人是谁，则便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了。

2. 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补充。它对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

历史的必然要通过历史的偶然为其具体的形式来加以实现，或曰“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偶然性却不是只在那里消极地体现必然性。相反，它对必然性的实现、完成，能够也必定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首先，历史的偶然性是能够促进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和到来。这种“偶然”常常表现为地理环境，包括地形、资源、气候等，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作用，甚至“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其具体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些革命家先进思想和活动在发动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如，俄国一些进步思想家对俄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列宁就概括得十分精辟：“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正是这些“先驱者”的思想和活动，极大地加速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至于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起的巨大指导与发动作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马克思刚刚逝世时，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思想家特别是革命的思想家，其理论对于历史必然性实现的意义，完全可以用列宁的一句话加以概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历史偶然性促进必然性的实现，有的时候则表现为政治家、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对于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个作用之大，正如同列宁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7—438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的那样：“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的。一个事变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成功，都常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其迟来与速来，却是常常是与某个或某些杰出的个人的出现相联系的。象前面举的拿破仑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军事独裁者”，而拿破仑个人的军事才干和政治魄力，恰恰适合了这一需要，因而他的登台及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出现，就极好地完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赋予他的历史使命。拿破仑成为“军事独裁者”这个“偶然现象”无疑地是大大地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进程。

这一点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样表现出来。在英国内战中，最终资产阶级的国会派战胜了查理一世，且将他送上断头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首先是体现了英国的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必然，但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克伦威尔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够予以忽视的。甚至他的军事才能这一“偶然”性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对此专有论述。他说：“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的对手。他只靠骑兵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的胜利。”

在科学史上，某个“偶然”的个人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同样也是举不胜举的。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珍妮纺纱机及瓦特蒸汽机等发明，不但其发现者、发明者带有“偶然”性，而且这些发现、发明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偶然”。但是，恰恰是这些“偶然”的事件，在人类的科技史上树起了丰碑。

其次，也要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有时又阻碍、延缓了历史必然发展的实现。在中国古代某一个帝王由于刚戾暴虐或骄奢淫逸的“性格”，滥用奸佞，政治黑暗，而使本来正在顺利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相对安定局面，为之破坏，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历史发展出现曲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一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或正在发展，而由于出现错误的领导或错误的举措，结果使得革命遭受挫折乃至失败，历史为之“倒退”的事也是时有发生。更有如希特勒等反动人物的出现与活动，造成了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历史一时的“逆转”等一类的事，亦不乏见。至于在战争中由于指挥员个人的“偶然”因素，致使战局改变，导致本来必然胜利的结局，却以败北告终等等的事实，就实属更多了。同时，某一场天灾、瘟疫等自然界的“偶然性”延缓了历史发展必然的迅速实现，也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事。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偶然性从反面影响及于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和证明。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08页。

3. 历史的偶然性终究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其最后的结果也完全决定于历史的必然性。

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某些偶然的事变成功了，甚至演成了一场改变历史面貌的轰轰烈烈的活剧，如，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这本纯属“偶然”的事件，却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其结果导致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一天也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由美国共和党领袖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为契机，引爆了美国南北战争，最终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获胜，成了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深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样，1911年10月，由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在其总部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试制炸弹不慎爆炸的“偶然”事变，引起的武昌方面新军的提前起义，成为了推翻清王朝乃至二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先声。1919年5月1日至2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历史阶段。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从当时看，甚至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事变发动者来说，都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乃至带有突发性质。可正是这一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创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局面。

这些从历史的长河看，不乏成功的和意义深远、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历史“偶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们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符合了当时外国的或中国的“经济的必然”。

反之，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某些事件不但不能成功，而且只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有的即便也闹腾了一阵子，甚至维持了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终归是因其一败涂地而告终，任尔曹身败名裂，并“不废长江万古流”！历史并不因其“偶然”事变及后果而改变自己总的进程。如，1915年12月发生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史称“洪宪帝制”的事件与事隔不久，发生在1917年6月的“张勋复辟”事件就都是如此。同样，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查理二世的复辟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林肯被反动分子所刺杀，未能丝毫改变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亦是如此。这些都同样表现出了历史必然性的作用。

第六，人类社会的历史还与自然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因为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是生活在自然界中，一天也不能与自然界脱离开来；自然史影响着人类社会史，人类社会史也影响着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在讲了前边关于历史分为自然史与人类史，以及“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的话后，就说：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自然史，但是，“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

生的变更出发。”

首先，自然界制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种情形越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界能力低下的时候，越是突出。例如，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几个文明古国都是与大的河流分不开的。尼罗河流域哺育了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产生了古巴比伦，恒河流域是古代印度的摇篮，黄河流域则孕育了中国古文明。同样是古希腊的著名城邦雅典与斯巴达，由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不同，无论是在生产部门、奴隶制形态，乃至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历史进程时刻受着其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就是近代也并不例外。美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它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它的本土遭到战火摧残，对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乃至其能够控制美洲、称霸世界都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与欧洲大陆相隔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这就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尽管一时席卷西北欧，但是始终只能空袭英国，却不能够直接地进入英伦三岛。至于在人类历史上，完全由于自然因素如大的地震、洪水等而使得古代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小国归于毁灭的事是并不少见的。自然因素影响及于一场战争胜负的情况，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同时，人类的活动在历史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然史的内容。

一种情况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如中国历代的治理黄河工程，筑堤防海活动，圩田、梯田的建造；现代的人工造雨、植树造林、人工破冰雹，改造沙漠工程等。另一种情形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如工业发达以后，废水、废气、废料污染环境，由于某种原因致使大气中的臭氧层出现空洞，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良田成为沙漠，等等。

第二节 史学——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一、基本概念

关于史学的含义，人们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意见。古代希腊文 *Historia* 是史字的意思；译意即为“真理的寻求”，后来发展到英文、法文，又有了“征询”、“问而知之”之意；亦有人认为希腊原文实际上是带有“纪事”，即以“求真的精神纪事”的意思。史为“纪事”在中国也有此说。《礼记·玉藻》说：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亦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学（这里姑且不谈传说中的史学萌芽）。记言、记事，虽然《礼记》与《汉书》所述“左史”、“右史”的功能略有出入，但是“记录”下当时的事和言以为后世垂训，却是一致的。

另一说，史学最早起源于史官。台湾的李宗侗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1984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在讲“史的起源”时，标题即为“史之初义为史官”。他明确地说：“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指史书”，并认为这一点与西欧史之起源不同；“在中国，史书是后起之义，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另，别的书著中也有此说。他们的依据大多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释“史”字时的一段文字：“史，记事者也。”看来，关于史学源于史官说之最早认识是许慎。

也有人认为，史学起源于史书。有了文字以后，人们才能把历史记述下来，遂成史书，而有了史学。黑格尔在赋于“历史”一词以史学含义时即说：它是“指那些通过想像为了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种说法，把史料即说成为史学。这在中国曾经有过。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说过：“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现代世界也有的史学家持此一说。英国的《剑桥近代史》多卷本的计划者阿克顿就认为“他们的任务既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的党派的历史，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在他看来，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阿克顿及其继承者的看法，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人开始对之不满，甚至进行批评，指出他们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缺乏洞察力”，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

关于史学含义的如上种种说法，有的是对其起源阶段认识的反映，表明其最早时期认识的粗浅与表面，有的则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十分的片面性（如，关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意见）。那么，史学到底是什么呢？如何表述才算得上准确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段颇为经典的论述，给我们很好的解答。他们指出：史学“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0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

的科学”。

首先，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自然包括了人们向自然界作的斗争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如阶级斗争、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活动等。同时，史学要研究的还是人们这些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这里，既包含了对人类客观历史的实际认识，也包含着对人类客观历史的实际描述、阐述。

我们知道，概括起来，人类的活动不外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大项。史学应该属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范畴，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过去形态的一种认识活动。既是认识，就应该包括认识它的现象和本质、过程和规律这样两个方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感性（“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各个事物的片面，……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阶段发展到理性（“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阶段的过程。史学既是人们对于客观人类历史的认识，理所当然地也要经历这两个阶段；搜集史料，排比整理，即史料学，属于弄清历史现象及其表面联系的感性阶段，运用抽象思维，透过历史现象认识历史本质，经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则属于对历史认识的理性阶段。只有这两个阶段都予以完成了，才算得上是对于人类客观历史认识的完成，也才能算是完成了史学工作。因此，那种“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是只说了史学一半，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史学还不能够只是研究（即认识）人类的客观历史，还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描述、阐述出来，否则其成果便无从为人们所了解、知道，也就无从发挥这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便是史学论文的撰写工作与史书的编著工作。因此，那种史学即史书的意见，是有它一定合理性即道理的。当然，它并未能够很全面地将史学的概念阐释清楚。

归纳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史学，说到底就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和科学。它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二、史学的分科

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分出许多的门类，并已都能相对地成为独立的史学学科。这种史学的分科，反映了史学在其研究过程中的不断深入与细化，对于现实的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都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按照史学所研究历史的时间跨度，分有通史和断代史。

通史，指对历史作贯通古今，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作研究与阐述的学科和书著。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书，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现代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等。

断代史，原指中国史学中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其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后来的正史亦都是断代史，如，《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现在，可以泛指对某一历史时期历史的研究与阐述的学科和书著，如，原始社会史、中国近代史等；史书，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

第二，按照史学所研究历史的空间（地域）跨度，分有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和乡土史等。

世界史，指其研究、阐述内容涉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史学学科和书著。如，世界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的学科及相关史书。

国别史，凡其研究、阐述的内容只包揽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史学学科和书著都称国别史，如，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和中国史等的学科及有关史书。

地区史，指只涉及到世界上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研究和阐述的史学学科和书著。如，非洲史、拉丁美洲史、东南亚史等的学科及相关史书。

乡土史，一般指对我国某一地方（如省，自治区、市、地区、乡等）历史的研究及有关书著。如，东北史、西藏史、台湾史、北京史等的研究及书著。

第三，按照历史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与阐述，可以有各种不同学科的专史。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法制史、民族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战争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等的研究与相关史书。

第四，由对人类客观历史的研究与阐述转而对史学自身进行研究和阐述的一些学科和书著。如，以研究、阐明史学自身规律的史学理论；以研究、阐述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史学史；以研究史料及其搜集、整理方法为对象的史料学和研究历史书籍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编纂学等。

以上的史学分科并不是绝对的，常常是在一个分科或书著里兼有几类问题的研究与叙述，如断代的史料学、国别的专史等。

三、史学研究的内容

史学既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为其研究和阐述对象，它所要研究、阐述的内容就必定要涉及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性质。

如同前面所述及的，人类的历史，首要的条件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正是这些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发展，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

但是，当我们考察人们的实践活动时，立即就会发现它“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人类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清楚地带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要生存，要繁衍后代，于是便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要与自然界斗争，征服自然，从而产生了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的自然属性是人和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同时，人类从一产生便是社会性的，单个人不但不能生存，而且也发展不成人类社会，不能有如现在这样的发达进步；这就出现了人类的社会属性。社会性是人类与动物能够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

正是这样，由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关系，便有了“人们对自然的作用”，产生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便是生产力。同时，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

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便产生了生产关系。因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及其之间辩证统一的发展进程和规律，应该是史学研究及阐述的主要内容。

不仅如此，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及其之上的上层建筑，亦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史学研究、阐述的重要内容。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段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精辟阐述，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史学研究及阐述的内容，很有裨益。

生产力包括历代劳动者、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部门以及某些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有密切关系的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生产关系进一步可扩大为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历代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阶层、家庭、婚姻等等；上层建筑则包括历史上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各种观念形态的东西。

凡此种种，就构成成为史学所要研究与阐述的内容。

四、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处理好几个关系

1. 史论结合

史料是认识历史和史学研究的前提

史料，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说，“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这个表述意见是正确的，它说清楚了史料的本质特征。

史料的种类很多。一般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史迹遗存。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尚存的实物性质的遗迹。一类是历史遗址，中国的，如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北京元、明、清三朝的宫殿、园苑、居住宅院等的遗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陕西西安的汉、唐陵墓，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河北省境内的清东、西帝陵，五台、普陀、九华、峨嵋等名山的佛寺古刹群，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历代的长城遗址，以及像上海、延安、西柏坡等地的许多革命遗址，等等。世界的，如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城遗址（公元前 2350 年至公元前 1750 年），埃及尼罗河下游的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古希腊迈锡尼文化的王宫狮子门遗址，雅典卫城遗址，法国的凡尔赛宫，等等，这些有的是经过地下考古发掘才使之再现的；有的是一直在地上保存下来的。一类是历史文物，即历史上遗留保存的实物，如历史上人们生产劳动用的工具（石器、铜器、铁器等）、生活用品（陶瓷、衣物、饰品等）、武器（青铜的、铁质的）、货币，等等。史迹遗存带有更大的直观性，可以帮助人们更真实地感受到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8—9 页。

1983 年 7 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学概论》第 4 页。

史发展的某些原貌，尤其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历史，除了依靠后世记载的部分传说史料外，主要是要依赖于史迹遗存这部分史料加以认识。如，对原始社会历史的了解、研究，即是如此。即便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史迹遗存仍然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认识来源。如，关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从过去传统的“蔡伦造纸”（蔡伦对改进纸有重大贡献）所界划的东汉时代，向前推到了西汉的文景时代，就主要是由于甘肃天水放马滩麻纤维纸实物的发现。宋代瓷窑遗址的被发掘和数量、品种众多的瓷器的存在，成为我们认识、研究宋代瓷器手工艺的重要依据。

2. 历史文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书中“史部”所列书目为历史文献；显然，这种意见把历史文献的外延、范畴限制得过于狭窄了。我同意白寿彝先生的看法，即“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都可称作历史文献。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叙》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乘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由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他在这里把传流的历史文献种类大体上作了概括。从中可见，历史文献包括有经、史、子、集诸部的古代典籍，其中尤其是史部之书，有“臣僚之奏疏”，应该亦有帝王之诏令等的档案文书。前者如《十三经》、《诸子集成》、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左传》、《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通典》、《文献通考》，以及《王荆公集》、《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后者如《唐大诏令》、《宋会要辑稿》、《明经世文编》等。以上主要列举了关于中国史上的历史文献。此外世界史方面的文献也很多，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史学家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李维的《自建城以来》（包括传说中罗马城的兴建到公元前9世纪的罗马史），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和《日耳曼尼亚志》等。档案在世界史研究中从近代以来亦被更加广泛地应用。我们知道，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问题，就曾经最广泛地翻阅、利用过大英博物馆里所收藏的载有工厂视察员报告的兰皮书档案资料。

必须看到，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地下考古发掘的成果。从1899年，清政府京官王懿荣在审视药材时，发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开始，到1979年《甲骨文合集》出版问世，其间80年，人们发现了载字甲骨大约10万片，已经整理出的甲骨文单字（除去重复的字和异体字）约有4500个左右，其中能够准确识读的约有1000多字。另外，刻或铸在大量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亦称“钟鼎文”、“铭文”），其数量也不算少，有的一件器物上的金文即达几百字，俨然是一篇短文。其实，通过地下发掘而发现古文献资料的历史，在我国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战国时魏地，今河南汲县）有人盗魏襄王墓，发现竹简数十车，后整理成《竹书纪年》，有关我国古史记载甚丰。新中国成立后，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老子》；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兵书，其中尤以《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更为珍贵，

它澄清了从隋唐以来关于这二部兵书的许多疑点和混乱。1975 年底至 1976 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出土了 1155 支秦简（另有 80 片残片）。这批秦简以秦隶书书写，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两种等 10 部分，是研究秦史的重要资料。解放前后，重大考古发现的文献还有在甘肃敦煌和酒泉、内蒙额济纳河两岸及黑城东南、新疆罗布泊等地汉代边塞、烽隧屯戍地遗址发现的汉代木简 3 万多枚；在甘肃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主要是唐代的有关户籍、土地制度的大量古文书，等等。

近代学者王国维（1877 年—1927 年）将以上两种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在他的“古史新证”研究中，广泛地利用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被他自己称作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以旧的原有的文献材料解释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同时又用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印证旧的原有的文献材料，从而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其间，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书（各 1 卷），是这种研究方法的著名力作。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甲骨学家罗振玉发现甲骨文中“王亥”一名的基础上，依据《山海经》、《竹书纪年》以及《世本》、《楚辞》、《吕氏春秋》等原有文献材料，加以考据，证明王亥为殷商之先公，即《世本》中的“胲”和“核”、《楚辞·天问》中的“该”、《吕氏春秋》中的“王冰”、《史记·殷本纪》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接着，他以此为线索思路，继续深究，终于证明了甲骨文所见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及世系，基本上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合。这就用新文献实证了《史记·殷本纪》，把我国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上推到了先商时代。这两部著作还从甲骨文中考据出殷商王室的兄终弟及继承制度及其与周制度的差异。此外，王国维对于金文、汉简、敦煌写卷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卓越之功。

应该说明，历史文献在整个史料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首先，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历史文献部分是最为丰富的。以中国的历史文献为例，它简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仅纪传体的“正史”（“二十四史”），就有 3229 卷，约 4500 余万字；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有 294 卷、《明实录》为 2909 卷、《清实录》为 4355 卷；清乾隆时编的《四库全书》所收图书达 79070 卷。档案的资料更是惊人。据统计，清代的原始档案，从清入关前的天命九年（1607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朝廷和一些地方机关的官文书，以至清亡后溥仪暂居故宫和天津张园、静园时期的文件，尚收存的，计约九百余万件册。”“其文字则大多数是汉文或满汉合璧，一部分是满文，并有一些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俄、日、拉丁等外国文字。”

他在晚年于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取名即叫《古史新证》；并撰是文。

他还考出殷代先公先王在上甲以后，依次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王癸，而《史记·殷本纪》却是先报丁、后报乙、报丙，是次序的疏误。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 84 页。

《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

同时，历史文献通过文字的记述，可以更加具体甚至更为形象、逼真、生动地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各个侧面。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常常是靠了文献记载，我们才可以知其详。唐代的均田制，现见到的有关记载共有唐政府颁布的三次“均田令”（分别是唐武德七年 624 年、开元七年<719 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通过这些“均田令”，便可以得知一般民户永业田、口分田的授田具体情况以及贵戚和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请受田亩的限数、按勋级请受“勋田”的规定等等。至于这些均田令是否在实际中得以实施与否，以及实施的程度，我们则可以从解放前后发现的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如，从开天对历三年（700 年）的敦煌县效谷乡户籍残卷中邯郸寿、张玄钧等户的户籍便能够看到，户籍上登记的应授田数符合均田令的规定。但是，其实际授与的田地却远远不足规定的数额。根据这些文书资料，我们清楚了唐朝前期确实推行了均田制。但是，就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实际上的授田也是严重不足的。

尽管历代人口的情况和变化比较复杂，但是，历史文献中却往往有着详细的统计记载。如，《汉书·地理志》就十分具体地记录了西汉全国京畿地区、80 个郡和 20 个封国各自所拥有的户数和人口数。其他历代的史书也往往都有如是的统计与记录。

尤其是历史上一些人物、事件的具体、逼真情况，更是只有依靠历史文献所提供的记述，我们今天才能得以见其“庐山真面目”。如，关于楚汉之争的序幕“鸿门宴”，《史记》的记载就非常生动，因而脍炙人口。

“沛公（刘邦）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项羽），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张。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

现在，西安市郊今人修有鸿门宴仿古遗址，有泥塑的项羽、刘邦、樊哙等人形象，很逼真，其根据即如上《史记》之记载。试想，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史料，多少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叱咤风云的历史事件，如何能够呼之欲出地“再现”于今人面前！

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它还是使其它史料得以保存或者能够恢复其历史面貌的唯一手段。如，史迹遗存，地上的部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我们今天就很难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当时的具体情景。象北京的郊祀天坛、地坛，今天其建筑遗址完好地保存着，吸引不少游人。但是，要想了解它们怎么由明初的“天地坛合祀”而变化成后来的“分祀”，就要查阅《明实录·嘉靖九年》。那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嘉靖与群臣就此问题讨论、争辨的具体情况。而要详细地了解明、清两朝皇帝在天坛、地坛祭祀的具体情景及其仪式，则要查阅《明会典》和《清会典》及其它史籍。史迹遗存的地下部分，是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再现于世的。可是能够直接参加考古工作的人终究是少数，且一旦发掘工作完毕，现场往往很难原样不动地保存下来，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某一地下发掘的当时现场、情景以及出土文物，只有依靠于考古报告这种考古文献资料。由此可见，史迹遗存部分最后也是主要地要通过历史文献而呈现给史学工作者。下边我们要讲到口碑史料和民族调查资料，它们也都是只有通过文字记录才能够得以保存下来，而最后“转化”为历史文献。

3. 口碑史料。一些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亲历者、目击者或者历史人物的亲朋好友，在他们心中保存着不少当时历史的事实情景，都不同程度地有一本历史“陈年旧帐”。这些往往都还停留在人们口头的追忆与传述。我们称之为口碑史料。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50 年代曾组织师生去河北廊坊调查访问当年义和团尚健在的团民，获得了许多实物资料（如义和团使用过的武器等）和口头资料，十分珍贵。中央和各地的文史馆也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组织一些老人把他们知道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并出版成《文史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大型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所收，亦都是由一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回忆录，内容丰富、真实，足以弥补某些正式史书之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老人逐渐地要谢世作古，能够及时地“抢救”这部分口碑史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们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

4. 民族调查资料。这里指对仍然处于社会历史发展比较落后阶段的民族的调查资料。如，美国的杰出民族学家摩尔根长期生活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里，调查并记录了大量的印第安人处于原始社会历史阶段的材料，最后写成《古代社会》一书。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曾经组织一大批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时刚刚从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如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云南苦聪族，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刚刚脱离奴隶社会的云南凉山的彝族和作伥族；刚刚脱离封建领主制社会的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等等，并且陆续地写出了一大批民族调查报告、研究专著和民族志。应该说，民族调查的资料，所包括的方面也很多，其中有文物、遗址，有口碑（如口头流传的史诗、传说），更有这些民族生产、生活的实际现实情况与形态，等等。

《史记》卷 7《项羽本纪》。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第 261 页统计，这批“调查报告和资料”的字数有 2 万万。

关于民族的调查资料对历史研究有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一些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民族，往往保留着人类一些先进地区早已消逝乃至绝迹了的事实和材料，从而为我们研究、认识以往历史，提供无法寻求的宝贵参考与借鉴。正如有的同志所比喻的那样：“如果说，考古学也能提供现代人所不知的很多材料，那末，它所提供的只是古代的遗物，或者说是古代社会的‘遗骸’，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社会的活体。而民族学所能提供的却是我们的古代社会的活生生的模型。”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的资料，加上其它的研究，从而对于人类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马克思的《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便是他们这些研究和认识的很好体现。恩格斯在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时说得分外精辟：“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氏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我国不少学者在研究古史时也十分重视民族调查的资料，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史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研究上，都曾大量地征引关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调查的资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叙述到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死者“尸骨上布有赤铁矿的粉粒”时，就征引“一些近代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部落”的资料，推测“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从而得出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观念”的结论。该书在讲到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墓葬方式时，也征引了民族调查资料，说：“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拆洛歧部落和绰克托部落都有曝尸、收骨存放的习俗，参阅莫尔根：《古代社会》，87—88页，1957年版。我国鄂温克人也曾有类似的习俗。据此推测，仰韶文化的人骨在迁葬之前也可能经过类似的处理过程。”郭沫若在其所著《奴隶制时代》一书的“改版书后”（1953年10月20日写）中还专门讲述了他自己在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形态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时，是如何地重视民族调查资料的。他说：“要阐明我国的古代社会自当尽力找寻和占有直接的史料。但因时代远隔，直接的史料很有限，因而必须采取权宜的办法——用间接的资料来作比较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自然可资比较，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国内的兄弟民族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很丰富的资料。我曾经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过，在本书中也曾提到，但我所依据的资料是已经陈旧了（作者注：我所依据的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见《青铜时代》所收《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很可庆幸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彝族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接着，郭沫若还就新的彝族地区调查材料如黑彝、白彝问题，白彝中的“锅庄娃子”（彝名“格式洛洛”）、“安家”、“曲诺”等人的身份问题，以及黑彝为控制“曲诺”而制定的种种不成文法，做了介绍，并将其与西周社会加以比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第25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以上均引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31和46页。

较，得出“西周的社会制度，比起彝族社会的情形来自自然进步得多，但在基本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看法。

关于史料的基本情况，大致介绍如此。下边我们讨论一下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意义。

我们应该看到，史料尽管如此之丰富浩瀚，但是与人类漫长的发展史相比，仍然显现出它的很大不足。一百多万年的原始社会由于还没有文字，只能依靠地下考古发掘材料、后世的传说和间接的民族调查资料，来予以认识。这三种资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能保留下来的部分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还往往遭到严重的破坏（如某些遗址、遗物或古人类遗骸），或者掺杂进去许多其它方面的因素。如，大凡经调查的尚处于落后形态的民族，往往已经接受了先进民族的影响，其所保留的一切已经很难是“原封不动”的；同时，时至近现代，一些民族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将其与人类“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完全相比较，亦往往容易犯简单化的弊端。这些都不能不成为使用民族调查资料研究古史的局限。古史传说部分的资料，同样地有它的弊病和局限。顾颉刚先生“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就比较集中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意见，将其归纳起来是：第一，就传说的古史而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作为古之圣贤，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了孔子时便出现了尧、舜；战国时期又有了黄帝、神农；秦时出现了三皇，汉以后便又有了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可是到了《尧典》中便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再到战国时的孟子那，就成了一个儒家所宣扬的孝道的典范了。第三，人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因此，顾颉刚先生认为，所谓古史的传说不过是后人编造的，并且带有“累层”的特点，是越造越多，越造越大。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有偏颇之处，但是，却也识破了一个道理，即古史传说中确实掺杂进了不少后人的意识和想像的成份，尤其是儒家的观点。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时，对之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开始有了历史记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就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这些历史方面的局限也都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人类发明造纸术、印刷术与文字的历史相比，毕竟是比较晚的。例如，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较为成熟、能够识读的文字，而造纸术以考古发现最早麻纤维纸计算，当在西汉的文、景之时（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西汉文、景时的纸，纸上还绘有地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物麻纤维纸），其间相隔一千多年；印刷术的发明更晚，现在较多的意见是在隋唐之际，那不用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事实上，虽然有了文字，但由于受纸张、印刷的限制，在一千五百多年（欧洲当更晚）中，人们书写与保存、传播文献资料并不方便，这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关于古史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到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对于历史文献的使用。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如兵乱战火、统治阶级人为地禁锢、破坏（象秦始皇的“焚书”、历代封建统治者有意地禁止一些书籍流行、保存等），都使本来有了的历史文献，减少了许多，不少在今天已经亡佚。例如，《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古书，今天有许多就已经见不到了；《隋书·经籍志》还专门注明某书何时还有，而到隋时已经亡佚，等等。

第三，由于历史文献的记录者、撰述者的阶级偏见或者囿于时代所限，尽管他们大都以“秉笔直书”自诩，但是他们对历史活动的记述必然有孰重孰轻，甚至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有的则视野窄狭，挂一漏万。例如，孔子的《春秋》，由于受孔子自然观（人世的变迁与自然变化有关，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乃人世盛衰之“征兆”）和春秋时期时代特点的制约，它主要记叙的是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和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之事（包括朝聘、会盟、战争等），所谓“唯祭与戎”，同时关于天文自然现象的记录也甚详。如，日月食、星象、地震、水灾、旱灾、虫灾等，其中一部分记录便成了后来《汉书·天文志》编写的根据。从科技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观察记录，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详细的，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但是，同样由于受孔子轻视经济，重视政治，更不屑于去管生产的观念支配，《春秋》中关于经济史的资料就实在太少了。再如，我国封建时代的史书，尤其是其“正史”，几乎清一色地详帝王将相，而忽视劳动人民的活动，对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抹煞、掩盖，语焉不详，就是横加污蔑。可以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如，由于“天朝大国”观念的影响和古代世界各国彼此联系相对地少、大多处于“隔绝”状况的局限，我国史书上涉及周边国家的记叙还有些，而涉及整个世界的记载就少得十分可怜了。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人东来，《明史》才开始有《佛朗机传》（西班牙），而到了近代，西方侵略者以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先进的中国人才更多地了解世界，于是魏源的《海国图志》、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法国志略》等研究世界史的书著才相继问世。

即便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其所记述的材料也很难说没有局限和问题。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说：“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尽管史料有着如此多的局限性，可是它仍然是我们能够认识、研究人类历史的唯一源泉。正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史料是由客观历史到史学的“中介”。如果缺少了这个“中介”，史学便无从谈起了。

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地位，是由前边讲过的人类历史所具有的一度性即一去不复返的特点所决定的。正是客观的人类历史具有不能重复、不能靠观察、实验使之“重演”、“重现”的特点，所以要想认识客观存在的历史，就只能依赖于它给我们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史料。

李宗邨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统计说：“如以百分比来分析《春秋》所记的史实，其中征伐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灾异（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陨石）占百分之十，杂项（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占百分之十。”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本第17—18页。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时，从来是十分重视占有最广泛的史料的。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形态的发展规律，就曾经花费了不下 25 年的时间，翻阅、钻研了 1500 种以上的书，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历史资料。正象列宁说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

我国古代的著名史学家和史学巨著，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都是十分重视拥有并使用足够的翔实史料。

孔子就很注意历史文献问题。他曾不无惋惜地感叹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姒姓封国，禹之后代；宋，周初封纣兄微子而建，让其承殷祀。这两个封国没有能够保留更多的夏、商文献，故孔子在研究夏、商两代的礼时，就感觉遇到了困难；倘若他们保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孔子则很有信心地认为：“吾能征之矣。”可是，当孔子编写《春秋》时就不同了。他除去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编著的《鲁春秋》外，大量地参考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们的记述及有关资料。

《史记》这部史学宏著之所以能够传诸万世，同样地是因为它据有十分翔实的史料。史学家柴德赓先生所著《史籍举要》（1982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于此就有十分细致、认真地考据、叙述。他在该书讲到“《史记》的史料来源”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包括书籍（有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档案（如汉初的诏令、记功册等）、见闻（象在《项羽本纪》中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在《李将军列传》中说：“吾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在《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游历（如，在《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在《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在《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

再看看我国编年史书中包含时间最长（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 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959 年] 止，共记 1362 年的史事）传中的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它在史料的运用与考究上，更是独具特色的。一是丰富，但凡宋代以前和宋代时期司马光所能见到的历史文献资料，他几乎都予以使用了。仅宋神宗所赐原神宗为颍王时府邸的藏书就有 2402 卷，当时皇家藏书馆崇文院所藏书籍，他亦都能参看使用。这在当时就史料之详而言确是空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宋人高似孙撰写的《纬略》记载，《资治通鉴》的引书当有 322 种之多。二是其所用文献书籍现在一些已经亡佚，多赖该书予以收录才能被后人见到、使用。三是《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审查、鉴别上十分认真，下的功夫很深。司马光对所收集到的各种史料，都是采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的方法，进行一一考据，务使其精确无误。与《资治通鉴》成书的同时，司马光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共 30 卷，将其考据诸书异同，辨证谬误的情况，一一记下。《考异》正是司马光对待史料严谨，终于成就一代史学巨著的很好见证。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史学研究发生的困难，看到史料对史学研究工作的重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论语·八佾》。

要作用。从 50 年代一直到 80 年代，史学界一直在讨论北宋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的最后结局归宿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内容的真实依托和小说作者的思想，因此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一说宋江最后投降了宋王朝，受了招安，甚至也随宋军征过方腊农民起义；一说他是被俘后被北宋王朝杀害的。其实，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史料问题。因为《宋史》的《徽宗本纪》与《张叔夜传》的记载和其他记载就往往大相径庭，相互抵触。《宋史·徽宗本纪》说：“（宣和三年二月）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军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说：“宋江犯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闲者覘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这里，都说宋江是被宋朝招降了。然而，现存北京大学的陕西《折可存墓志铭》中却又有“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等文字；《东都事略·徽宗纪》中也说：“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再加上《三朝北盟会编》曾在北宋政府征讨方腊农民起义的军队将帅名单中，列有宋江的名字，就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地疑窦丛生了。

再看一下关于《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的长期讨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权谋家”（兵家之一）的书目中提到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唐·颜师古注说，前者为“孙武也，臣于阖庐”；后者为“孙臆”。显然，当时既有孙武的《孙子兵法》，也有孙臆的《孙臆兵法》，是两部兵书。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就只著录有《孙子兵法》，而不见了《孙臆兵法》。从那以后，人们便围绕着是否有过《孙臆兵法》，众说纷纭。有人则认为，根本没有过这部兵书，同时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开始，非一人完成，直到孙臆才陆续成书的。这个问题直到 1972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现了《孙武兵法》和《孙臆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才得以解决。很清楚，这个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是史料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精辟的论述，来总结关于史料之于史学研究重要地位这一认识。马克思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还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

《三朝北盟会编》卷 141 载：“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贯至浙，率诸将擒腊，献于京师，加太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8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

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理论是史学研究的指导

在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必须充分地认识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人们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因此在史学的研究中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客体和主体的问题。客体是我们要认识的对象即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历史；主体则是对这个客体的认识者即史学研究者 and 史学工作者。客体的人类社会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已经消逝了的过程，正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论是东去的大江，也无论是随之被“浪淘尽”的风流历史人物，都是客观曾经存在过的人们不能予以改变的过程与事实。但是，作为认识这个客体的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主体，对其认识却可以也必然会有千差万别。这其中因素很多，如主体研究者、工作者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知识基础、生活环境与经历、乃至个人的品德、性格、情操等等。应该说，在这其中史学研究者与工作者的哲学观点（具体到史学认识上即史学观点或称历史观、史观）是经常的事实上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史观不仅决定着史家对于历史进程的总的认识、看法，而且决定着他的选材取舍、编纂史书的体裁、体例，以至于用词的褒贬。

孟子在谈到孔子作《春秋》及当时流行的各诸侯国史书时就说过：“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事”即是齐桓、晋文争霸、盟会之事，这是客观存在于春秋时代的事实，但是“义”即观点却是史学工作者所“窃取之矣”，存在于研究者主体自身的。孔子作《春秋》的“义”是众所周知的，即在那个“周道衰废”、“礼崩乐坏”的时代，“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寓褒贬，存善恶，使乱臣贼子惧”。并且，他的用词还包含了自己的观点，如所用的“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不同的词，都体现了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春秋笔法”。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同样一件史事、一个历史人物，当世和后世的人由于史观不同，结果就得出不同的甚至可能完全相反的评价与结论。例如，我国历史上秦王朝灭亡后，从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前 202 年，刘邦和项羽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开始，项羽强大，兵 40 万，刘邦相对地弱小，兵 10 万。但是，最后垓下一战，刘邦却终于胜利，项羽被迫自刎于乌江。对于这场战争的“刘胜项败”结局及连带的对项羽、刘邦的评价，当世和后世是众说纷纭，很不一致的。项羽兵败自刎前曾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及到乌江，当乌江亭长欲渡项羽、并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时，项羽不肯渡，且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司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8 页。

《孟子·离娄下》。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孔子世家》。

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太史公曰”中也说，项羽至死仍然十分地笃信此战之败乃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刘邦就不这样看。他在战败项羽后曾“置酒雒阳南宫”，与群臣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当高起、王陵认为是由于“陛下谩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时，刘邦并不以为然，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显然，项羽是从天命观看问题，而刘邦则是从人事（用人）上来加以解释成败之因。

唐代诗人杜牧曾以诗词寓项羽的失败，在《乌江亭》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含羞忍辱是男儿，八百子弟今犹在，卷土重来未可知？”北宋王安石也有一首《乌江亭》诗，却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八百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这里，杜牧更多地是从项羽个人的性格上去寻求其失败原因，而王安石却是从客观的形势上分析项羽已不可复胜。前者过于看重个人（英雄）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从时势上论成败了。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偏重于对某些具体的零碎的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的话，那么在史学研究者、工作者那里，则往往具有更加系统、全面、抽象和更带有哲学意义的对于历史总体的认识与观点。这种历史观带有一般的普遍的性质，它常常是当人们对许多具体的历史问题有了认识和观点以后而形成起来的，而一经形成以后就又反过来指导、支配着人们去观察、分析一个个的具体历史问题。

一般说，这种更高层次的历史观所包含的问题有：历史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运动、发展的？是什么决定着历史的运动、发展？即历史运动、发展的动力或决定因素问题；历史的创造者是谁？等等。

应该说，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着差异、不同，乃至于根本对立的看法，正象李大钊说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如“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

但是归纳起来却不外乎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辩证地看待历史或形而上学地看待历史的历史观。这期间也有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历史观，等等。

例如，在我国古代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与“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静止的或循环论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也有象韩非那样认为从“上古之世”到“中古之世”，再到“近古之世”，人类历史始终是在向前发展、不断进步的社会进化历史观；有绝对信奉天意，认为人

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均见《汉书·高帝纪》。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高祖本纪》。

世历史都由上天决定，动辄都要占卜吉凶的殷商统治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和“天道远，人道迩”的近乎人、神并重，二元论而实则更重于人的多少带有反天命唯物成分的历史观。同时，也出现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着眼分析历史问题的唯物史观因素。在我国近代，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人们在历史观上经历了极大的变革。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开始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孙中山还进一步突破了封建传统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而强调在历史上是时势造出英雄。他讨论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指出：“华盛顿与拿破仑”二人之于美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抗英之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之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在世界历史上，各种各样唯物的与唯心的历史观也是始终存在的。例如，在古希腊，以写作《历史》（亦称《希波战争史》）而闻名的希罗多德，其著述视野宽阔、取材丰富、治学态度严谨，曾被后人称为“史之父”，但是其历史观却充满宿命论。他总认为人世间的历史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甚至于对“神谕”也笃信不疑。可是，另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以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著名的修昔底德却否认“神谕”等宗教思想，认为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人间吉凶的征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明显地带有唯物史观的合理成分。到了世界中古时代，基督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不言而喻，中古时代欧洲的史学同样被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严重地笼罩着。那时，一些宗教的史学家公开地把人间的历史视作为只不过是上帝意旨的一种体现，是上帝精神的一个舞台。不用说，在他们的史书中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史观。如，当时德意志最著名的史学家鄂图本身就是佛里沁的主教。他写的《编年史》（亦称《双城史》）就以《圣经》中所说的“创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八年。

《论语·颜渊》。

《史记·货殖列传》。

《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

世纪”作为人类历史的开端，并且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恶魔撒旦的信徒彼此之间的斗争史。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壮大，资产阶级的文化兴起了。那时，史学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天上”降到了“人世”，从以神为中心，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这时期的史学家认为历史应当是“人事”的历史，而不是上帝和“天国”的历史，要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为资产阶级借鉴。他们的历史观点无疑地是带有反神学的唯物主义色彩。但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局限，这时期的史学家大多抱有英雄史观。如，意大利的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在其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就污蔑 1378 年爆发的梳毛工人起义是“无知群氓的暴动”，而横加指责。

可见，古今中外的任何史学研究者、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要么是这样的历史观，要么是那样的历史观，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如何使自己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首先需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历史理论来做指导，要有一个科学的哲学意义的世界观。

如前所述，事实上在历史上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不论其自觉与否，都是有着自己关于历史的一定理论认识，甚至建立起了自己一定的历史理论体系。其中，也不乏具有唯物的或辩证的合理成分，闪烁过某些智慧的火花。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精辟指出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我们知道，真正地使历史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使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经过列宁、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得“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列宁曾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曾经有一段话，被列宁称作是“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作的“周密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260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0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6 页。

说明”；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最基本的理论和观点。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告诉我们：

第一，人们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里总是要结成不以他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需要同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合。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这个社会法律、政治、宗教以及一切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正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生变革、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在以上经济形态的演进、发展中，人类社会大体上说依次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既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同时，由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牢固地建立在了唯物的和辩证的基础上，很好地解答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等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从而破天荒地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

列宁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上述这段话时，指出，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经济上的对抗在阶级社会里则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即阶级斗争。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又说：“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指《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引者注）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恩格斯曾经十分精确地评价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它是马克思的两个最伟大的发现（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讲过这样一个重要的道理：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才能完成。而要具有这种抽象的思维力，就只有依靠于理论。当然，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做指导。

具体地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的研究，就可以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升华，由感性达于理性，在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第一，它可以使人们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它们其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往往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与一切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中介”，唯此才能从统一的整体上认识人类历史，而不至于陷入只见树林而不见森林，只能够局限于一个个历史现象的了解，而不能认识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而要想联系地看待历史，并能把各种历史现象正确地联系在一起，就只有借助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于理论的功力，尤其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

大的历史问题，例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中间不知有过多少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或活动；在前一个社会形态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往往已经孕育了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最后则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或改革，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随之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便取代了原来的较低级的社会。这里，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我们如何能够把那么多的看似偶然的的历史现象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正确地联系起来，并且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这个依次更替的发展规律？！

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亦是如此。例如，就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来看，可能是零碎的、分散的，今年有这样一件事，明年又有另一件事，但是如果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理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有机的生活脉络，看出这一件件事情往往看似都是偶然的，其实又都带有必然的性质；同时，还要和他前代人做的事情、当代别人做的事情，以及后代人做的事情联系起来，然后才能够揭示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规律，直到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拿历史上一个思想家来看，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的形成就往往与前代人的思想密切关联，有个继承的关系，也即是人们所说的“流”，同时也和同代的其它思想家有关，或是互相吸收，彼此渗透的关系，或是相互对立，在争鸣或交互批判中各自发展。这一点在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中，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更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更不能够脱离他生活的当时的历史环境。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他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结局有关。这即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时势造英雄”。前边引述的恩格斯关于拿破仑的一段话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已经“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时代，须要一个军事独裁者，从而使得这个科西嘉岛人拿破仑被由一个普通军官推上了法国的最高执政者、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史记·李将军列传》讲了李广一生。他先是在汉文帝的朝中做郎，无所事事，后来在汉武帝时则成了一位抗击匈奴的重要将领，与匈奴先后接仗70余次，威震北边，被匈奴称之为“汉之飞将军”。传中记有一段令人回味的話：“李将军广者，……为汉中郎……秩八百石。尝从（文帝）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今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司马迁用了两个“时”字，前者是指文帝时，休养生息、黄老无为是其特点，因而李广的勇猛才干用不上，“子不遇时”；后者则是指汉高祖刘邦楚汉战争之时，正是谋臣武

将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建功立业的时候，若在那时，象李广这样的猛将“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时势与英雄的关系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自然，历史人物个人的活动，还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作用。当时，人民群众的意向、参与历史事变的程度等等，都会决定着个人在历史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制约着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

第二，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这也即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历史现象只是这个过程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阶段需要在广大的现象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形成概念，经过严谨的判断、推理，才能完成，而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我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毛泽东说得十分好：“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例如，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国家，如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同时又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形式，如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寡头统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法西斯专政等等。如何透过各个方面的历史现象，深刻认识各种类型、各种形式国家的本质，我们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以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等精辟的理论。

第三，史料的鉴别、整理同样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史学研究宗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是由主体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它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例如，关于隋末李渊起兵和建立唐王朝这段史实，《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其主意出自李世民，后来统一群雄之功也主要归功于他。但是，唯《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迥异。该书作者温大雅在李渊起兵后“专掌文翰”，所撰当属亲见亲闻，材料比较真实。他记述说：李渊素

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8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

参见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

有大志，太原起兵一事乃李渊的主意，后来在反隋及统一大业中，李建成的战功并不亚于李世民，军中并呼为“大郎”、“二郎”。如，书中记载，当李渊进军长安途中，“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加之隋军拦阻，又有流言讲“突厥欲与刘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李渊为此“集大郎、二郎等”研讨对策，二人都坚决主张进军长安，不要回师太原，并表示由他们率兵抵挡隋军，若不能取胜，“儿等敢以死谢”。这些建议及功勋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都是完全归之于李世民一人的。所以有这些史料上的差异，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称帝太宗以前，而新旧唐书则是据贞观《实录》而成书的。《实录》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写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教义在这里显然起了作用，因此“实录”不实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鉴别这段史料，就须要具有理论思维，从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国家对于文化的统治制度等方面去加以认识，分辨真伪，寻根溯源。

再如，我们知道，清朝初年所修的一些有关明史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这些重要的史书，都竭力地回避明满关系，尤其是对于清军入关以前建州女真的情况及努尔哈赤先世对明的臣属、明满双方争执之症结等，更是讳莫如深而语焉不详，以至于我们要了解、研究这部分历史，需要更多地去借助于朝鲜人的《李朝实录》一书。朝鲜李朝太祖至仁祖十六朝（1392—1649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时期，卷数很大，全书分前、上、下三编，其中上编所收明代建州史料，对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吴晗专门辑录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显然，这部分史料所以出现如是问题，是与清初统治者文化上的高压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搜集、鉴别这段历史的史料，同样需要具备理论指导，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民族矛盾、国家职能，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等方面入手，予以分析。

至于封建史书中关于神化帝王的记载、天人感应的“事实”和对农民起义所作的什么“盗”、“贼”的种种污蔑，我们就更是要以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和鉴别，以去伪存真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和意义，我们在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人们常常用王国维和郭沫若两人的治学方法和史学成就加以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恰当的。

王国维，字从之，号观堂，是我国清末民国初年的杰出史学家、文学家。他于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他的著作宏丰，有《人间词话》、《戏曲考源》、《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宋元戏曲史》等著述问世。辛亥革命后，他专一研究古器物、汉简、甲骨金文、敦煌文书，创立“二重证据法”，最后辑成重要著作《观堂集林》20卷。其中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尤为令人瞩目，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等惊世力作。但是，他由于未能掌握正确的史学理论，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研究水平，在史学上最终只是考辨了一些重要史实，在新旧历史文献互证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郭沫若（1892—1978年）则不同。他从1928年旅居日本后，亦从事甲骨、金文和中国古史研究，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巨著。但是，他从20年代初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深刻研究了《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此后，他便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利用甲骨文和先秦其他文献资料，专治中国古代史，并于 1929 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第一次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形态，论证了原始社会转化而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后来又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

王国维和郭沫若两人都精通于甲骨金文和我国古代文献，都专一地治我国古史，同时亦都治学刻苦、认真严谨。但是，一个却仅仅限于考据清楚了某些史实，另一个却向人们揭示出了我国殷周整整一个时代，穷通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者如同树木，后者则是森林。他们所以有着如此的不同，其成就大小又如此之悬殊，究其缘由，就是在于有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南。

其他的如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等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治史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亦都是绝好的证明。这里就不再一一予以赘述了。

史论结合

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好史料与理论的关系，即人们常说的史论关系，应该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界在“史料学即史学”的思想影响下，轻视理论指导，尤其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解放以后，在 50 年代，仍然有些人把专事考据的史学文章、著述，捧得极高，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而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史料的文章，贬为“流感”（即流行性感冒，一阵子即消失的意思），不是“真学问”。于是，针对这种倾向，史学界一些同志提出了历史研究应该“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强调了史学研究工作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当时对于克服旧的史学研究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有其片面性，因为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只要是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带动”起史料，而成就历史研究了。后来，这个口号更被史学界“左”的倾向所发展，在一些史学论文或著作中，只要引上一些经典著作的词句，然后据此摘录剪裁几条史料，便算是史学研究了。这种情况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穿靴戴帽”或“以论代史”。

显然，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也应该指导其它学科（包括历史学科）的研究，但是，它却不能够代替一切学科自身的研究工作。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后来，为了纠正史学研究的这种不良倾向，史学界有的同志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任何理论都要从研究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够上升、归纳出来，假如这样理解，并不无道理。但是，这个口号的提出却有意无意地反对了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如，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就不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为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诞生。也有人在讲到历史人物时，不同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分析，作出评价，而主张“以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作为评论的标准和尺度，等等。

显而易见，以上我国史学界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史与论的两个口号，就口号提出的背景看，都是有它的合理性一面，而且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们又都带有片面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者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后者则有着经验主义的弊端，以其来指导史学研究工作，都曾经带来一定的问题，产生过某些消极的作用。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两个口号了。

经过历史的反复，史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史与论关系，还是提史论结合比较确切、比较好。

史论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既要重视占有翔实的史实，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并且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过的科学的学风：“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人类历史的实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矢”来“射”（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实际这个“的”。“实事”指客观的人类历史，“求”是去研究、认识，“是”是历史内部的固有联系，即其规律，“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地研究客观的人类历史，并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一段话是指的任何研究工作，当然也适用于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把他作为是对史论结合，对历史研究中史与论关系的十分精辟的说明和阐述。

2. 史与现实

史学研究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史学的时代性、时代感问题。

时间，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的历史与人类的现实再与人类的未来本来是一脉相承、彼此衔接而不可分开的。正如李大钊说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撇开“未来”不说，过去与现在，即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实在的不可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史学研究中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历史总是吸引着现实的人们。现实的人们不但不忘记历史，而且总要从历史当中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现实的人注意自己的历史，我们可以追述到人类的远古时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就记录了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易洛魁人，每逢新首领授职和部落的哀悼会议上，都要由一位专司巫职的首领，拿一种由紫色和白色的贝珠串起来的带子，用贝珠带上的各种图案给大家讲授一遍本部落的历史。我国商、周王朝后代每逢祭祀先祖时，也都要回顾一次本部落的历史。

《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所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和“帝立子生商”，“武王（指成汤）载旆，……如火烈烈，……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是先商的一部小史；而《生民》、《公刘》等篇，如果再加上《大雅》、《鲁颂》等，则成了从后稷到公刘再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822页。

《李大钊选集》第94页。

参见《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7—138页。

到古公亶父和文王的先周小史。

大家都熟悉，我国古代有不少“秉笔直书”的故事，如晋国太史董狐书史：“赵盾弑其君”，之后，赵盾便十分恐慌，辩解晋灵公是被赵穿所杀，并不是自己所为；董狐坚持直书，并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于是哑口无言了。孔子十分称赞董狐，说其“书法不隐”。再如，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庄公被崔杼杀死，另立新君；齐太史即书之于史说：“崔杼弑其君”；结果，齐太史被崔杼所杀，他的两个弟弟仍坚持书之，又先后被杀，南史氏闻之，抱简奔来，坚持原书。这些故事无疑地都说明在我国古代史学上有着“直书”而不“曲笔”的优良传统，但是这些故事不是也说明了无论是董狐、齐太史兄弟、南史氏，还是赵盾、崔杼，都是对于历史敬之畏之，充分地注意历史记载吗？！

在现实生活的人们，还总是要从历史上寻求对现实有用的东西，如借鉴、垂训，以致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这些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有详叙，此处从略。甚至有时会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现实的人“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其二，现实又总是要为历史的认识、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供给其新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

任何一个史学家总是生活在现实中，立足现实，而去认识、研究历史。因此，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就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影响与制约，这样或那样地打着现实的“烙印”。

首先，现实所关心、敏感的问题，常常要人们去重温历史，从而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就不能不为人们研究历史提出一些新的课题。正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前现实所发生的“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例如，在中国，春秋时期那种天子衰微，诸侯争霸，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实，就向史学提出了如何在当时维持统治者正常秩序的问题，于是乎以“正名”为宗旨的孔子《春秋》便问世了。西汉初年，鉴于秦之速亡的现实，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一时都以总结“秦所以亡，汉所以兴”作为研究的重大课题，先有陆贾的《新语》，后有贾谊的《过秦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可以看到，就是汉武帝时，董仲舒的一些言论也仍然以此作为话题。如，他曾在针对时弊劝戒武帝时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颍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参见《左传》宣公二年。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正是在现实的这种需要下，我国古代的史学巨著《史记》问世了。司马迁特别选用了通史的体例，目的是要把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自己生活的当代）的历史，作一个叙述，借以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是认真地总结历史上天与人之间和人世间自身内部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因，即规律性。《史记》于秦王朝的兴亡和秦汉之际乃至从刘邦到文、景这段历史，记之尤详。我们处处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希望从这段历史中，给现实的人们以一些启迪的！其中，有关本纪和列传的“太史公曰”，今日读来仍然觉得兴味醇厚，闪烁着历史经验、教训的光辉。如，《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写得特别长，从秦之变法，“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富强而兼并六国，“振长策而御海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到由于始皇施暴虐，二世又“重之以无道，……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终于导致秦朝速亡，都予以归纳概述；并且深刻地说：“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再如，在《高祖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吕太后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在《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又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这正是把从汉初高祖“承敝易变”到惠帝、吕后继续这个政策，“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再到汉文帝一共坚持“休养生息”已达40余年，终于“胜残去杀”，获得天下大治的事实，作了再好不过的总结。这里，既包含了汉初鼎旧革新的经验、教训，也包含了一个正确政策要有延续性、坚持一定时间然后可以有治有成的深刻规律。

唐代，政书体（又称典制体）史书的出现和杜佑《通典》的问世，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隋唐时代是继秦汉之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各种制度上做出又一次较大革新和创建的时期。无论是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考试制度等方面，都十分地突出。这就必然地要求能够从历史上得到借鉴，从而使得这些革新更加的合理与完善。可是，恰恰从《后汉书》以后，诸纪传体史书于书志上很不完备。《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均只有本纪、列传，而并无书、志；《宋书》、《南齐书》虽然有“志”，但却缺乏重要的食货、刑法等志。正是在这种现实需要与史学发展矛盾的情况下，政书体的《通典》才应运产生了。

在西方历史上，现实发展向史学提出新课题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令》，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取得合法地位；公元392年，塞奥多修斯大帝更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在统治者的提倡、支持下，伴随着基督教政治地位的巩固、发展，在西方产生了“基督教史学”。他们把历史说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同时也就是上帝存在的见证；于是，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都有上帝在主宰着人世的活动。他们还把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代替人间的信史，以《圣经》所载作为表示历

史事实的史料；甚至把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做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认为人世间的世俗史只不过是基督教服务的，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基督教的胜利史。至于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更是发展成了封建领主们统治农奴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诚如前引恩格斯的话：“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和这种现实相一致，史学的神学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内容几乎全部成为基督教宣传所需要的课题。

可是，当十四、十五世纪，西欧（首先是意大利）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进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在政治上要冲击乃至取代封建统治制度，在文化上则兴起了一股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现实的巨大发展，同样反映到了史学，要求史学也摆脱基督教神学的羁绊，从研究“天国”转到研究人世，赞美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夺权斗争制造根据。这一时期，产生的《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英、法诸国的编年史》，以及以资产阶级新教观点解释基督教的教会史（如佛拉西斯的《马格德堡世纪史》），都是其中著名的。后来，更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史》等名著。这在史学史上被称作为“理性史学”，其特点是要求以理性和科学观点解释历史，反对用基督教的蒙昧、迷信思想说明历史；同时，通过历史宣扬历史进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像以上这样的现实启迪人们去研究历史，向历史不断地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使史学与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的事例，我们从古今中外还能够举出许许多多。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史学的内容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它总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史学尽管是研究人类过去已经消逝了的社会，但是它永远具有时代性，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

其三，现实还能够给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认识条件、能力和方法，推动史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人们研究历史也和人类认识其他事物一样，要经历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们与历史认识上的绝对主义，即自信自己已经或者行将掌握绝对真理、永恒真理，达到了对历史认识的穷极者不同，也和那些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不同，而认为人们在一个时期内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地完善无误，但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又一定会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发展，它会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后浪推前浪”这个过程是经由一代一代的史学家去完成的。其中，后世史学家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他们所生活的新的现实时代，提供给他们条件，则是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许多历史资料在当时或前代还不能够或者没有被披露出来，只有

在后世才得以让史学家见到、搜集起来，加以使用。在这里，时间是重要的，现实往往要胜过于历史的当时。恩格斯在讲到当着历史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对它产生明确认识时，说：“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因素还处在“潜在活动状态”，“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对其明确的历史认识。我们还可以举前边说过的甲骨文等的发现与殷商史研究关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尽管史书中早就记载商朝已经“有册有典”，但是，在孔子时恐怕也没有见到这些资料，以致于他在研究殷礼时不得不叹息地说：“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事实上，即便就在商代当时，这些资料也只是被控制在“巫”一类的史官手里，更多的人也是见不到的。所以，在很长时期里，商史仍处于传说时代。直到上世纪末发现了甲骨文和抗战前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小屯大规模地进行殷墟考古发掘以后，商史研究才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大大充实了内容，一跃而成为信史。当代史的研究亦然。有的同志说得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文革”史是绝对写不好的。这不仅有个认识的问题，也有个资料问题。只有在“文革”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才被揭露出来，公诸于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蒙受的迫害和他们进行抗争的事实也才得以为大家知道。这时候，我们来认识、研究或者撰写“文革”史，其条件可能就要充分得多了。

过去，我国史学界有的同志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史料的角度讲，越是当时的记载越可靠，后世或哪怕只是稍后的记载其价值都不如当时。如，北宋发生的事情，北宋人的记载是准确的，而南宋人的有关记载则准确性远不及北宋。如果以上面的道理看，这种意见显然就有些失于偏颇、绝对化了。因为在古代限于各种信息传递的局限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北宋人记载当时的事未必能够就是全面的、准确的，传说之处在所难免，而南宋人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资料或口传倒许充分了些，其所载未必较北宋就不为准确、全面。史料绝对地以时代即当时或后世来定其优劣，恐怕是不能被视作为一条考据的标准的。

其次，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及其影响、后果，往往在当时还在进行，或者尚未能够发展得很充分，其所包含的许多矛盾，往往也还不能够充分地得以展开。这一切的解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只有后世的史学家对于其前世的历史，才有可能相对地认识清楚，而当时人却常常相对地“糊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马克思说：人们“对人类生活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隋朝覆亡这段历史为例。隋炀帝统治的荒暴肆虐是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由此最终导致改朝换代，建立唐王朝。当时，起义的农民军和乘机起兵反隋的“群雄”，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隋炀帝的，认为他是这场事变的祸首。如，瓦岗军的领导人李密在发布的那篇著名的《讨隋檄文》中，就一一地列出了隋炀帝的罪恶，指出这些罪恶之重“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要求对之讨伐。这篇檄文是当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旧唐书·李密传》。

各地反隋力量的共识，一时极富号召力。这可以被看成是当时人对隋末形势的看法。但是，到了唐初，人们对于这段历史就又有新的认识。他们既看到了炀帝之恶，同时更深层次地考察隋亡的原因，追根到了隋文帝。唐太宗就曾指出：“隋文爱府库而不恤百姓”；魏征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祸起于炀帝而根于隋文。”当着事变“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已经出来以后，人们的“思索”的确是更加深入地“开始”了。唐初对隋亡原因的认识，无疑地要比隋末当时人的看法，是更加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国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后朝编前朝的历史。如，东汉的班固编西汉的历史，写成《汉书》；陈寿在西晋时撰写《三国志》；五代和北宋时而成《旧唐书》与《新唐书》；元朝顺帝时才诏修《宋史》、《辽史》、《金史》；明朝洪武年间编成《元史》；清朝顺治下诏修《明史》，至雍正时始成，刻版则在乾隆时了。这里，固然有个资料的完整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只有到了后朝，前朝的历史发展过程才算是真正地“完成”而有了“结果”，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才可能得以“思索”和“开始”。再次，现实还往往为人们的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提供出新的更高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一是，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能力总是要不断地提高的。后代人们由于其实践丰富于前代，随之而来的认识问题的能力，也一定较前代有所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段话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人们。他们也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其间的区别只是在于自觉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司马迁所生活的现实条件与孔子生活的条件就不同，其被“改造”了的“客观世界”，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一个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西汉，一个是虽有周天子但实际上全国处于诸侯割据状态的春秋时期，因此，两个人的史学视野、史学认识能力就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写的《春秋》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史事，旁及新发展起来的楚及吴、越等江南地区，对少数民族也只是很笼统地以华夏与夷狄来区分，其记事亦很少经济，多“唯祭与戎”，司马迁则不同，不仅是写了当时更广大地区的历史，而且十分注意各个地区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谷、纆、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又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廩、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犍、犍僮。西近工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于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些都是《史记》关于各地物产及彼此沟通的记载，说明其经济视野已是十分广阔。这一切不能不说与西汉统一局面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同一书中，司马迁就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欲。”《史记》中还专门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专一地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这无疑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向前发展的现实对司马迁史学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显然，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较之于孔子，不知有了多少发展与提高！

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迫使一些先进人士抛弃或部分抛弃原有的封建传统观念，转而向西方学习，于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传入中国，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如，当时，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就较大。康有为为维新变法寻求的理论根据，便是社会进化论。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到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入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其在当时所著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中，对由孔子“三世说”所推演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又都反复地进行了阐发。与康有为同时的夏曾佑不仅在其与严复合办的报纸中，宣传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且写了我国第一部运用进化史观划分历史阶段的中国历史著作——《中国古代史》。

历史在发展。人们随着新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我国近代人们运用社会进化论思想认识历史，较之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凝固论（“天不变，道亦不变”）、循环论来说，是不知要进步了多少的。

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著的《实践的历史》（1982年）中有一段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后来的历史家的巨大有利条件是他所描述的事情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有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分清什么是关系重大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时间的间隔能使人们冷静地判断事物，作出比古代更为公正的评价。”

再者，由于在更高级的社会里仍然保留着较低级社会的某些东西，有的反而有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因此，在更高级社会的“现实”中，反而对于以往的低级社会历史能够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实有时会赋予人们对于历史以更高认识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深入地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以前诸形态的历史，对以往的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算，从而揭示出了这些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东汉何休注《公羊传》，将孔子《春秋》所分十二世、西汉公羊学家董仲舒解释成的“三世”（“有见”、“有闻”、“有传闻”），演变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康有为在这里据“三世说”，阐发他的历史进化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第一卷[一]追溯到历史）、由马克思写作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其中第二十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都追溯到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共产主义原理》、《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法兰克时代》、《马尔克》、《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等许许多多的经典著作，就都是径直用科学的观点研究古代历史或者在论述资本主义时追溯到古代历史，发现、阐述其历史发展规律，并进一步地确立起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

关于现实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出新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一部史学史上看到许多生动的实例。前面谈及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近代考古学技术发展起来以后而产生的新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现代，从生物学开始并推广到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已经形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当代，电子计算机也已经被研究领域引入使用，进行历史资料的数据处理，而形成新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会不断地更新、变化，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也一定会日新月异地不断进步、向前发展。

3. 宏观与微观的认识

作为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自始至终存在着宏观的认识与微观的认识。它们同样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和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最先源于自然科学和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考察。这二者之间是相对而存在的。

宏观，源出于希腊文 *makro*，意为“大”；后来转化为前缀 *macro*，是宏观物体和宏观现象的总称，又叫宏观世界。在物理学中，宏观物体一般指空间线度大于 10^6 的负 6 次方至 10^4 的负 4 次方厘米的物体；宏观现象则一般指宏观物体与其场在宏观的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微观，源出于希腊文 *mikros*，“小”的意思；后成为前缀 *micro*，一般便译作了“微观”。在物理学中，它一般指空间线度小于 10^7 的负 7 次方至 10^6 的负 6 次方厘米的分子、原子和各种粒子；微观现象则一般指微观粒子和其场在极其微小的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微观粒子和微观现象总称作微观世界。

宏观与微观的概念和用以考察问题的角度，现在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其含义上看，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宏观带有全局、整体的意思，而微观则指的是局部和个别。

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宏观与微观的认识是与人类客观历史现象的特点，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部性和整体性、个别性和联系性等，紧密地联系的。具体地说：宏观认识历史，应该是从总体上、联系上、多侧面、全方位和发展的角度去对历史进行考察，而后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人类历史现象的统一性。微观认识历史，则主要是限制于考察人类历史的局部或个别现象，而且常常是孤立地、静止地对历史进行观察。它所要认识的往往只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和历史现象的多样性方面。

做为系统地提出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在近代，但是宏观或微观地去观察、认识历史，却是古已有之的。宏观的认识，如我国古代儒家把传说及其后一段时间的历史，概括地划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时代。《礼记·礼运》中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今天看，这个关于“大同”和“小康”的划分，虽然并不能够完全精确地反映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的历史面貌和历史本质，但是它却是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从总体上和发展上的观察，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伦理意识等的状况和变化，并且作出了质的划分。显然，象儒家的“大同”、“小康”说，是属于对历史的一种宏观考察与宏观认识。

从史书上看，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可以说是着眼于宏观历史认识的两部巨著。从时间跨度说，《史记》所记的历史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年左右；《资治通鉴》则囊括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北宋建立前，共记1362年的史事。从地域跨度说，两部巨著都是事涉全国的历史，而且记述了全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史事。更重要的是，两部史书都明确地是要总揽历史发展，把历史“通”起来，着眼于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规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该书的编写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汉书·司马迁传》记述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其中语有：“仆（指司马迁）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清晰地说出了《史记》的旨意和着眼点。它要通观历史，考察大凡历史上的盛衰成败，弄通其前因后果，认识“天人之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和“古今之变”，古往今来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资治通鉴》编写的宗旨，司马光在其《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十分清楚，是要对历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监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由于其编写的体裁为编年体，是按照了时间次序，缀史事于其下，因此在同一时间内的史事就“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间”。这样，历史的纵、横向联系便十分的清晰，易于显现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历史发展规律。通鉴的内容和通鉴的体裁可谓是相得而益彰。

《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史书的宏观意识，是清清楚楚的。

在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史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的指导下，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与研究得到加强，提高到自觉的地步，比之于过去完全呈现出了质的变化。例如，人们关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古代民族关系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问题，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的研究、讨论，就都是属于宏观的历史认识与历史研究的课题。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论集》等重要的涉及中国通史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史著，也都属于了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并且阐述中国历史的范畴。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努力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总体上，贯通而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历史上某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形态，并且着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

对于历史的微观认识，例如，中国古代史学一直重视的史书辨伪、文字校勘、史实考据等工作；考一个字、一个年代、一个地名、一个人物和一个事实等等，就都属于这个认识范畴。前边提到过的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是他在编书过程中，将其收集的史料“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然后决定取舍的一步重要工作，亦是属于这种对于历史史实考辨的微观认识。清朝初年兴起的“乾嘉学派”，考经、考史，直到考证诸子等书，穷索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提出“无证不信”口号，更是集考据工作这种对历史微观认识于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同样地需要注意从微观的角度去对历史现象进行考察和认识。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恩格斯在其所写的《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三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自己也十分注意历史的微观考察，强调构成历史的每一事实都要准确无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恩格斯说：“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人们对于历史的宏观考察和微观考察是两个既相区别，同时又彼此联系的认识思维过程。它们的区别除了如同前述的各自所要考察、认识的对象、任务有着差异外，在其认识方法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宏观认识历史，所用方法偏重于抽象的逻辑思维。如，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等。尤其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思维的方法。对于历史的微观认识，则偏重于计量、辨伪、校勘、考据等的方法，其中也有思维，但是更多地还是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思维。如，对历史上一场战争的考据，可以做出数量的统计，看看双方各自所投入的兵力、装备、武器，等等。对于一个历史事实的有无，有时则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来加以判断，非有即无，非无即有，排除了“无”也就说明了“有”；反之，排除了“有”则便证明其“无”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79页。

对于历史的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二者之间的密不可分、彼此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作为史学界和某一位史学家，可以有所分工，有所偏重，一部分人多做些微观的认识工作，更侧重于从事辨伪、校勘、考据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另一部分人则多做些宏观的认识工作，纵通古今，比较中外，总揽历史全局的发展，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允许的，也是事实上存在的情况。但是，作为史学研究整体，这二者却必须结合起来，既不能只是考据史料，只讲微观认识一些个别的历史现象，走入“史料即史学”的泥潭，也不能只是着眼于宏观考察历史，象范文澜曾经批评的“放空炮”。只有把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对此，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有过一段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畛域，则有两伤之弊。”可以说，这里说的“独断之学”大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认识，而“考索之功”说的则是今天意义上的微观认识，只有二者结合，史学才能够获得“相需之益”的“岁功”，倘若各自“自封畛域”，就会有“两伤之弊”。

第二，从认识过程来看，对历史的微观考察属于感性的认识阶段，是要弄清楚一个个的历史现象，而对历史的宏观考察则属于认识的理性阶段，结果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微观考察是这个认识历史过程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仅只有微观考察，只是弄清一个个的历史现象，还不能说已经真正地认识了历史，只有通过宏观考察，才能够使历史的表面现象得到升华、深化，才算是真正地认识了历史。我们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

一般说，研究中国哲学史都要做如下几个步骤或几个层次的工作。

1. 辨别哲学著作的时间和作者。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做的第一步工作。如《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52篇，现在仅存晋人郭象注本保留下来的33篇。全书分作《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到底哪一部分出自庄子之手，哪些部分为他人或后来人所撰？学者们认真地进行了考辨。现在，大多数人认定，《内篇》的7篇为庄子所著，《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另一说，内、外、杂诸篇都反映了庄子的思想。这一步工作做好了，我们才可以正确无误地利用《庄子》一书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范畴。

2. 研究历史上每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确定其在哲学范畴中究竟是属于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是属于形而上学，还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 最后把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家连贯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分辨出其当时哲学思想的“源”（社会存在）和“流”（前后继承关系），然后总结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如果再与外国哲学史进行比较研究，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特点及与外国哲学史一样所体现的哲学史上的共同规律。

其中，第一步显然是属于对中国哲学史认识的微观范畴，而第三步则是属于了宏观地认识中国哲学史。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第一步是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只有第三步才能算作是真正地对其有了完整的认识。这三个步骤

既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微观与宏观的认识历史之外，有的同志提出还有中观认识历史的问题。所谓中观认识，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认为它是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结合，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典章制度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属于这种中观认识的范畴。以明末李自成农民战争的研究为例，它既要有微观的考察，如李自成起事时间、荥阳大会有无、是否焚烧凤阳皇陵是高迎祥和李自成“分兵定向”的结果、究竟焚烧者是谁、李自成从何处进入的河南、李岩有无其人、关于李自成的死（时间、地点、是否被害）……，这些都需要而且也已经有人在那里进行详细的考据，至今还有不少的分歧意见。同时，它更是需要从宏观上进行研究和把握，要把李自成起义与明末当时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要把它的逐渐发展壮大与其它起义军的兴起或败灭、明王朝的腐朽以及东北的满洲兴起联系起来；还要把它的“均田”、“免粮”口号与历代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加以比较；更要从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局限性的角度分析这次起义的一些特点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等等。这样才能认清这次农民战争的起因、发展、推翻明王朝，直到失败的历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某些规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微观地考察历史与宏观地考察历史二者始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关于李自成农民战争的中观认识。二是，中观考察历史也被看作是人们认识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步骤。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等同志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在“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一章中，就专门地讲了“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问题。书中说：“历史认识按照认识范围的不同，大体形成微观、中观、宏观等几种类型。一般说来，微观研究将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就事论事弄清事实真相为自己的任务；中观研究将一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根据时间、空间、内容等弄清它们之间的外部联系为自己的任务；宏观研究将历史发展的全局与整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为自己的任务。三种类型近似于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理性三个不同的阶段”。又说：“事实充分表明，微观、中观、宏观的历史考察，代表了历史认识、历史思维发展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它们也正是历史实际自身不同特征逐一被用不同方式加以认识的客观需要的产物。”显然，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历史的中观考察，不是把它看成一般的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的结合，而是从客观历史的特点出发，从考察的对象、任务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将其与宏观考察、微观考察并列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一种类型，是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一个“层次”和一个“阶段”。

第二章 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人类需要史学——史学的社会地位

众所周知，前些年有一种“史学危机”的说法。这种说法包含的一个很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史学对社会的意义越来越小，或说它的研究并不能够“直接”地作用于社会、为社会服务，因此社会就越来越不那么需要史学，史学的存在已经出现了“危机”。显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对于问题的看法太近视，太浮浅，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由于人类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界，产生了自然科学，也由于人类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所以便产生了社会科学。前者要服务于征服自然，后者则要服务于改造社会。很显然，一些学科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它对于社会、人类有着自己的功能和价值。如果这种功能、价值一旦消失，这门学科便会失掉存在的意义，便会或迟或早地枯萎，直至被社会取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盛行，选官依照于“九品中正制”，特重门第，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因此，谱学一时极盛。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子孙相传，号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因贾氏旧本，改撰《十八州谱》等书，号为王氏谱学。这种风气后来虽然渐衰，但是仍然一直地延续到唐初。当时，路敬淳、柳冲、韦述等都讲授谱学；唐太宗和武则天也都修订《氏族志》。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的《通志》著录的谱系就有6种170部。那时候，谱学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社会上部分人的需要，能够为当时的政治制度服务。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特别是科举制的发展，选官已经不再凭借门第，于是谱学也就失去了其依托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到了清代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谱学所存者已不过数家。现在，它更不能成为什么“学科”而立足于社会了。

堪輿学的盛衰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堪輿，即“风水”；堪輿学实际上是专一相宅、相坟墓，察看其“风水”的一门学科。它主要以迷信为内容，但是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清代雍正时编的《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型类书中保存了不少堪輿学的书目及其内容。一些搞堪輿的“风水先生”，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享有较高地位的。他们以其所“学”下为一般达官贵人以及民人相宅、相墓，上为帝王相宫殿、陵墓等建筑，能够做官。其官，明、清时隶属于礼部钦天监，也可谓盛极一时。显然，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与我国封建时代的科学不发达及特有的阶级关系和制度密不可分的。但是，同样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科学意识的不断加强，这门堪輿学也早已无复存在了。现在，某些落后地区仍然有搞风水迷信的人在欺骗群众，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与地位。

可是，史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门学科。它从人类在原始社会时开始萌芽，直到今天，古今中外，是一直做为——门重要的学科存在着而且常盛不衰。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史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总是以研究人类的过去，而最后归宿于服务现实；它始终对于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当然，各门学科的社会功能由于自己学科的内容与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不能要求它们都千篇一律或无所不包。假如是这样，各门学科的区别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类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科学领域了。历史学科亦然。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门学科，我们不能要求它对于自然界或者说对于

生产力，也像自然科学那样起着直接的作用。史学的功能主要地是表现在作用于人类社会，即作用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只要是人类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这样的“双重关系”不改变，历史学科就会永远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永葆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史学危机”论，认为史学不能够直接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此便缺乏社会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的说法，显然是很片面的和不公正的。

抓住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点，并从这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十分地重视史学这门学科的。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同志更是反复地强调了解历史和研究史学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批评有些干部“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深刻地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谆谆地教诲说：“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全党“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要求人们要重视历史。1953年，他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托他将《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六条印成单张一二千份，发给参加中央组织会议的同志和中央有关领导人及北京市的干部，要他们“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1958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全党面临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时，为了提高全党和全民族的素质，更好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他再次明确地提出了要“学点历史”的号召；为此，他还早在1954年便指示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组织力量校点《资治通鉴》，接着又提出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任务。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赞成和支持下，我国史学界最终完成了整理、标校《二十五史》的宏大工程。这对于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学点历史”的重大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上，还以身作则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一点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史学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01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页。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60页。

意义，是很有启发、帮助的。毛泽东同志历史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而且他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张贻久著的《毛泽东读史》一书作过一个统计，说：“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五卷，在这130多万字的著作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礼记》、《易经》、《论语》、《孟子》、《老子》、《列子》、《山海经》等等。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学者、诗人，如曹操、孙武、司马迁、韩愈、朱熹等；又有佞臣奸相，如魏忠贤、李林甫、刘谨、秦桧等。既有在中国被尊为‘圣人’的孔夫子、‘亚圣’的孟夫子；又有外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哥白尼、达尔文等等。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毛泽东则倾注着更大的热情关注。对于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楚汉的成皋之战、新汉的昆阳之战、袁曹的官渡之战、吴蜀的彝陵之战、秦晋的淝水之战等成败得失的评述，也都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在《毛泽东诗词选》中，同样可以读到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评论；读到他不忘记曹操的碣石遗篇；读到他歌颂共工为胜利的英雄；读到他要人们记取项羽失败的教训，穷寇宜追，把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该书接着引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于毛泽东同志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这一点与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国际事务做出的伟大业绩、贡献关系的赞叹和评论。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英国前首相希思说：“他（注：指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来考虑问题。”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颇有影响的学者、《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教授也曾比较客观地评价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史学功能的论述和他们的实践活动，都有力地证明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是对于“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等等的无稽之谈和错误论调，做出的最好驳斥。

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一些史学概论之类的书归纳得并不完全一样，大体看来，可以说包含有以下三个方面：1. 历史学对于人类认识活动的积极作用。2. 历史认识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如，史学对于国家统治者或领导者的重大决策的参与；对于社会成员中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某一群体变革现实社会的要求的参与。3. 史学的巨大教育功能。

总之，史学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应有地位是肯定的，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一定要加强史学研究工作，造福于中国，泽及于人类。

以上均见该书第1—2页、10—11页。

参看《史学导论》第42—63页。

参看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383页。

第二节 史学的社会功能

一、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类的现实，即自己国家的国情和世界的今天，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投身到人类进步事业中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非常深刻、著名的话。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包括生产力、资金、环境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即“创造环境”这正是人类历史不断地前进和发展的一面。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个时代总比前一个时代进步。第二，人们在创造历史不断前进的时候，又必然总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也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脱离这个基础而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基础即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也即是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也创造人。”第三，史学正就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这个基础，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更有效果地依据这些条件和环境即今天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现状，来从事改造环境的历史创造活动。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反复地教导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研究历史，要懂得今天（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的继续，要从中国昨天和前天历史的发展中，认清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国情，并据此确定党的政策，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现状。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调查中国的现状，深谙中国的历史，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国情，反对教条主义，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创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党和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一些通晓国际事务的外国政治家也懂得这个道理。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就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通晓历史背景，那么对外交事物的研究，即对整体国家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为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与其说存在于空间，倒不如说存在于时间。”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现实（国情和世界现状）当中，实际上是包含着历史的。历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在现实当中。孔子就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虽然反映了孔子历史观中的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一面，但是，他却看到了现实之中包含着历史的事实。殷礼里有夏礼，周礼里又有殷礼。西汉初年，刘邦“承敝易变”，“汉承秦制”，“校秦之弊”，也是说明现实与历史之间是既有变化，同时也是有包容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懂得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那两段话，就会深信立足于现实的人，要创造历史和新的环境，改造社会，首先就必须了解自己今天一切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就要研究历史，尊重史学。

二、帮助人们认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展望 未来，更自觉更有信心地投身到当前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

规律，亦称法则，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带有普遍性和重复性等特点。正因如此，人们通过研究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般说，同样地可以适用于认识现实。尤其是按照人类历史规律的层次性特点，有些社会规律能够适用于几个乃至所有的社会形态或者整个的人类社会，带有时间和空间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研究历史，加深对现实社会规律的认识，这是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通过研究历史，利用历史规律，考虑当前的治政，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的。殷商一味地崇天，以为只要有上帝的支持，它的统治就可以永固。所谓“我其祀^正（祭名）作（则）帝降若（顺、幸福），我勿祀^正，作帝降不若。”但是，它终究还是为周所代而灭亡了。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就从中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历史的这一规律，明白只靠上帝是不行的，还要有民的支持。周公旦执政时，就在继续强调“天命”的同时，进一步地提出了“敬德”和“保民”的概念，认为统治者只有一面尊天，一面修德、顺平民意才能够巩固统治。战国时，荀子是很注意认识历史规律的一位思想家。他曾经就齐湣王身死国亡的事件，总结规律，阐述治国必须要言行一致，讲求信誉，说：“刑责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褻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里说的“信立而霸”应该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他还就卫国、齐国、郑国的治乱事实，总结了“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的治国之道，也即是历史规律。唐太宗更是十分地注意历史规律。他针对着隋亡之事实及前代的治乱兴衰，认识到即便在封建社会里，民心的归向仍然

基辛格：《重建世界》。

《论语·为政》。

《殷虚书契前编》（罗氏印本）7.38.1。

《资治通鉴》卷4，周赧王三十一年。

是统治稳固的必要因素，反复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更注意于帝王创业与守成的历史规律，寻求江山永固之理。贞观十二年（638年），他一次询问群臣们创业与守业何者更难时，魏征回答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很以为然。他自己也得出结论说：“（房）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创业难，守业更难，因此要“居安思危”，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治政规律。

但是，真正全面深刻地发现人类社会历史根本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些规律的发现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结，同时也是他们研究了人类历史后的概括。这些历史规律不仅适用于历史，同样地也适用于现实。如，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的规律，就适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正是遵循这一规律，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改革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自我完善。

事实证明，懂得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能够更加自觉地治国安邦，参加现实的变革，改造社会，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史学在这里是能够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的。

研究历史，揭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于认清社会的未来、人类的前途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前苏联历史学家茹科夫曾经指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存在，开辟着对历史过程进行有根据的预测的前景。……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便有可能越出把它和现实隔开的禁区线，在这样一些学科中间取得自己的地位；这些学科的使命是帮助加强社会积极性，促使人们不仅对今天的，而且对明天的任务有所了解。”这和我国古代史学家们历来所强调的研究历史可以“述往事，思来者”，“彰往考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等等的意思大体上是一样的，都讲的是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因此史学与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于是通过研究历史，预测未来，也就更加地真实可靠。正像列宁所说的，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这样的预见显然不是孔子所谓的“虽百世可知也”的空言，而是完全科学的预见。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论断，就是完全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上得出的。它既符合于历史，也符合于现实，同样亦适合于人类的未来。正是

《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苏]E.M.茹科夫著，王瑾译：《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存在着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它必然被人类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

能够预测未来，展示人类最美好的前途，那么就会不管人类历史出现了什么样的曲折，我们都会坚定信心，如国际歌中所说的那样，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努力奋斗。“英特那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

三、对现实的借鉴作用

鉴，本是古代一种盆样的青铜器，盛水后可以像镜子以照人影。后来，又引伸作儆戒、教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借鉴，即是拿来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以之为镜，照出自己的得失，然后吸取其经验、教训，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由于其一度性的特点，是一经消逝以后即不可以再重演的。但是，历史上非常酷似的现象却又是经常存在的。人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这个意思。前车与后车虽然不同，它们的“覆”也不会是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之覆”的现象却是可以非常相似的。这就为人们寻求历史的借鉴，找到了必要的根据。

其实，现实能够供鉴于历史的道理，人们是一直懂得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治政方面的借鉴，如西周初年，统治者们面对夏朝、殷商的败亡，反复地告诫周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要周人以夏朝、殷商作为借鉴，不要重蹈其覆亡之辙。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李斯矫诏即位，欲杀掉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以自固，他的侄子子婴就以战国一些国君的教训为鉴，对他加以劝诫，说：“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西汉初年，战乱已弥，刘邦仍不思文治，津津乐道于“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以古为鉴，力劝刘邦：“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成）汤武（周武王）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他的话对刘邦很有启示，“高帝（刘邦）不恚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件事成了汉初统治者政策的转折点。东汉末年，曹操正是鉴于历史上“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而在建安元年（196年）于许下募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最后统一了北方。唐朝接隋之弊，其开国之君臣，更是一直地注意治政宜鉴之于史。还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君臣们即经常地

《诗经·大雅·荡》。

《尚书·召诰》。

《资治通鉴》卷7，秦始皇三十七年。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从隋亡这段历史中汲取营养。武德元年（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即上表李渊，陈述治国之道。表从隋朝说起：“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

武德九年（626年），太宗李世民刚刚即皇帝位，即邀请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为其讲述为君之道。张玄素也是先从隋朝的历史讲起，他说：“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谏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唐太宗是一位比较能够纳谏的君主，“兼听则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座右铭。这不能不与他注意借鉴历史是有关系的。还在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即位不久，便与魏征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上（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不要象隋炀帝那样“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而应“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便是唐太宗的“吾属之师”，也可以看成正是“前事”启发了太宗，纳谏而至治。进谏最多的是魏征。他先后向太宗提过二百余条的意见和建议，今日细审之，不少都是以隋亡教训，来告诫太宗的。如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欲建飞山宫，魏征反对，向太宗进谏说：“（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辟，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直到死前，唐太宗在总结自己为政二十二年，在用人、纳谏、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时，也仍然不忘历史，处处体现了他鉴古而知今的思想。贞观二十一年（648年），他对臣下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正是据此进一步地对治政需鉴史作了带总结性的概括。他明确地说：

《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

《资治通鉴》卷192，唐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贞观二年。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今欲自观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说；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借鉴历史，还有道德伦理、为人之道的一面。孟子就曾经以历史上“君子”对待错误的态度，作当时“君子”之借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南宋朱熹明确地讲：“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把伦理道德明确地和读史、鉴史联系起来。当然，关于道德、情操的史鉴作用，实质上也即是史学的教育功能，下边自当细述而详论之，此处不再多叙。

值得强调一下的是，我国和世界的史学，也是从来都把史鉴作为了自己撰史的重要目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然后以为今人、后人的鉴戒。唐代伊始即着手于官修前代史书，其目的《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对之做了说明：“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大业杂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最后，诸史皆陆续修成。令狐德棻说的“贻鉴今古”和李渊说的“穷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即是如上诸多史书的编写旨意。《资治通鉴》的编写更是突出的例子。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地说他编写是书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史鉴，即将冗长的中国历史“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使帝王于日理万机之暇，取而披览，以“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原书名为《通志》，宋神宗取阅部分后，认为其书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明末清初，王夫之读《资治通鉴》后深有感触地说，一部历史“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在西方，编写史书以为今人借鉴的事例同样是很的。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在他写的《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中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

《册府元龟》卷550，《国史部·恩奖》。

《贞观政要·文史》。

《贞观政要·任贤》。

《资治通鉴》卷3，周赧王元年。

《朱子语类》卷11。

《读通鉴论·叙论二》。

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

另一位罗马著名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约生于公元55年，卒于120年）也说过：“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被恩格斯誉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和“近代军事著作家”的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曾专心潜读李维的《罗马史》，然后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事，一一地与当时佛罗伦萨的现实情况，加以对比，并写成《论李维》一书。他的用意即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古罗马的历史中寻求对于当前政治改革的启示和借鉴。和这一思想一致的是他写的另一部十分著名的史书——《佛罗伦萨史》。这部书里，他把古罗马与十四、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作了对比，努力探求使佛罗伦萨借鉴古罗马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

在借鉴历史，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但始终十分地关注，而且做出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对以“鉴”为其宗旨的《资治通鉴》十分喜爱，在他故居的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五十年代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些书里都有他圈点批划的手迹。他读《通鉴》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吸取历史的借鉴。1954年冬，毛泽东同志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算起，是由于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对于《通鉴》的体例、断限，毛泽东同志不仅有独到见解，而且从中取得历史的借鉴。对于许多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也都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借鉴，并借以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斗争。例如，他对秦始皇，一方面指出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一方面则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由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以致于激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秦亡的经验教训。关于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以“二误”作了总结：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望风披靡，锐不可挡，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二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Canon Roberts）的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年伦敦版，第1卷，第2页。
《塔西佗全集》，丘奇（A.J.Church）与勃罗德里布（W.J.Brodribb）的英译本，1942年纽约版，第137页。

据《新创造》第1期讲，毛泽东对《资治通鉴》总共读了17遍。

以上引自《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页。

《新创造》第1期。

误”的经验教训，于古于今，都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在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蒋介石反动政府即将覆灭之际，蒋介石耍出了假“和平谈判”的阴谋，毛泽东同志一面戳穿反动派的阴谋，一面命令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占领反动政权的老巢南京，终使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及时地以楚汉战争时由于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宴上，不听谋士范增的劝告，放走刘邦，最后使刘邦养成势力，在垓下决战项羽，逼使其自刎乌江的故事为鉴，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此，毛泽东同志生动地写了《解放南京》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于历史上因为功成业就、骄傲自满，以致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一直十分注意。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由于一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导致起义军失败的过程及其教训。当时，延安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4月12日，毛泽东同志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希望郭沫若能写太平军的经验，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曾引历史的借鉴。1967年，他专门推荐大家读《战国策》一书中的《触誓说赵太后》，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个历史的借鉴对于教育子女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是有重要教益的。至于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指挥革命战争的例子就更多了。如，毛泽东同志曾批注孙臧“围魏救赵”战例，说它“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专门借鉴这一战例，指出：“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围点打援”战役，实际上也是对“围魏救赵”这一历史战例的一种借鉴和灵活运用。

四、教育功能

讲到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的教育功能，可以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43页。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47页。

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21页。

从广义来说，掌握、传播历史知识从而达到更好地认识现实、认识国情、面向世界，懂得历史规律，正确地展望未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历史借鉴，等等，都可以算是历史的教育。现在，一些同志提倡对全国人民开展历史教育，借以提高民族素质，其含义应该说，即是指的这一层意思。如果狭义地理解历史的教育功能，一般地则是指历史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伦理、品性情操等方面的影响和熏陶。广义的，在前面已经述及，本题目要讨论的是后者，也即是从狭义上看的历史教育。

关于历史能够给人以崇高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自古人们都是认识到了的。《易经》上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前言往行”指的是历史，“蓄德”即主要是指培养道德品质。《国语·楚语》中记载，楚国大夫申叔向楚庄王建议如何教育太子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诫劝其心”；《汉书·艺文志》中说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这里的“耸善抑恶”、“诫劝其心”也好，“慎言行”、“昭法式”也好，也都莫不是指的历史的教育功能。在西方，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史观上是宿命论。但是，他以这种史观，从因果报应的角度，着力于用历史事实向人们进行教育。在他的笔下，一些专横的帝王如克洛苏斯、大流士、薛西斯等最后结局都兵败身死，而一些曾经多少在历史上做过好事的人物，却让人们永远怀念。他的史书就是以这些史实，贬恶褒善，以让后世知所取舍，得到教育上的启示。古罗马的史学家塔西佗也十分注重历史的教育作用。前引他的《罗马编年史》一书中就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说，塔西佗的史著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希腊化时代”末期的杰出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年）也明确地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在其所著《通史》（亦称《罗马史》）中说：“从研究历史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历史能够教育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

其实，说到底人们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接受教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继承有关民族的和革命的思想情操、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历史遗产中十分珍贵的一个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

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我们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和“酷爱自由”、“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等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都是对子孙万代进行教育的绝好遗产宝藏。这种教育不仅能够使我们的青少年懂得自己是怎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子孙，为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鄙视形形色色的崇洋媚外，而且决心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立志建设好社会主义祖国，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巨人般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是这种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侮面前，中国人民便激发出了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正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说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以岳飞为例，他曾经抗击金人，后被奸佞秦桧与宋高宗杀害，死时 39 岁。他的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事迹和精神，世世代代受到传颂、敬仰。浙江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下，有座岳王庙和岳飞墓。庙中有忠烈祠、启忠祠两部，殿内有岳飞着盔甲、披紫蟒袍、按剑而坐的塑像。其上方悬仿岳飞手书“还我山河”匾，两侧壁上嵌有后人手书的“尽忠报国”四字，围护墓坟的石栏望柱上刻有“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墓门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绑双手，面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秦桧、桧妻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跪像背后墓门上有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庙一墓，无不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和爱憎情感。抗日战争时，尽管日寇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当年南宋人民与金人贵族矛盾的性质有根本不同，但是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爱国人士都缅怀岳飞的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以岳飞为榜样，到处挂着仿岳飞手书的“还我山河”字迹，唱着岳飞《满江红》的歌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奔赴抗日前方，反击侵略者，捍卫祖国的尺寸领土和尊严。人们还仿照岳王墓的样子，铸了两个反绑双手、跪于地上的铁人——卖国贼、汉奸汪精卫和汪妻陈璧君，以供世人唾骂。

除了以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外，还有许多民族的美德，也足以教育后代，垂训子孙。例如：

1. 勤于政事，奉公尽职。

后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了报刘备“三顾”知遇之恩和匡扶汉室的大业，为丞相后，勤政尽职，“事必躬亲”。“先是，（诸葛）亮使至，帝（司马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指出钱赎罪）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刘备死前托孤刘禅给他时，他激动地答应刘备说：自己将“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后来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惟知君嗣之当辅，而不复知有其躬”。“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3 页；1991 年 6 月第 2 版。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2 页；1991 年 6 月第二版。

诸葛亮：《前出师表》。

《晋书》卷 1《高祖宣帝纪》。

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成为后世人们对待国家、对待事业竭心尽责的高尚道德尺标。同样，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军事家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先国家、民族、社会，而后自己的奉公尽职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景仰。

2. 兼听纳谏，刚正不阿。

西汉文帝时，张释之执法不阿和文帝虚己纳谏的故事，始终受到后人的赞颂。“上（汉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辚，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辚，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曲，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与此相同，东汉“强项令”董宣也十分著名。“（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公）主家，吏不能得。及（公）主出行，而以（杀人）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即还宫诉帝（光武帝刘秀），帝大怒，召宣，欲捶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捶，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公）主曰：‘文叔（刘秀）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桴鼓不鸣董少平。’”

本书前面已经述及唐初贞观年间，太宗虚心纳谏，魏征等大臣敢于犯颜直谏的事例，更是十分地突出。唐太宗即位伊始，即以隋炀帝荒淫无度，不守君道，而又令“臣下钳口”，以致于“不闻其过”，终至败亡的事实引为莫大的教训；认为国君必须“虚己以受人”，让臣下进谏，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才能使国家得治。他在位期间，臣下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敢于向他直谏的事例层出不穷。尤其是谏议大夫魏征，更是先后犯颜向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包括要太宗以隋亡为鉴、应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薄赋敛，轻租税”，“任贤受谏”等等。魏征认为，大臣们应当是皇帝的“股肱”，“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他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话，曾一直受到太宗的赞赏并且被奉作为自己治政的座右铭。

3. 廉洁俭朴，淡泊明志。

东汉安帝时的涿郡太守杨震一向为官清廉。他先前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时，曾“道经昌邑，故所（荐）举（过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

《史记》卷102《张释之传》。

《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

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后来，有人劝他乘着为官治些产业，杨震坚拒之。（杨震）“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孙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三国时，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武乡侯，但是在为官廉洁和生活俭朴上同样地堪称是后世楷模。他在生前曾经上表后主刘禅谈到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史书称诸葛亮死后，“如其所言！”他在54岁时死于五丈原军中，临死时，还留下遗嘱，要求自己丧事从简，就近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著名的《诫子篇》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这方面的节操。他在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如果再联系到他在《诫外生书》中说的“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等话，其在个人生活上的廉俭以及养志的性情就更为昭著了。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蜀汉一代官吏的思想作风。他的继承者之一费祎，不但“宽济而博爱”，而且同样地是“家不积财”，其子弟“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姜维也是“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褻，后庭无声乐之娱”，生活一直“清素节约”。另一蜀汉政治家邓芝作将军20余年，一直是衣食“资仰于官”，非常俭朴，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免饥寒”，同样地在他死时“家无余财”。杨震、诸葛亮、费祎等人的事迹和精神，是始终为后人所景仰的！

4. 克己爱人，舍利取义。

在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是有自己的美德和准绳的。孔子就强调过，“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先达人；己欲立，先立人”。孟子更是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清楚地提出了为人的标准。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的；这就是人类所以应当具备“仁”、“义”、“礼”、“智”品德的根据。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一个人应该是舍利而取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对于当时杨朱学派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非常厌恶，指出他们一切“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禽兽”之言，最后会导

《资治通鉴》卷49《汉纪》。

《诸葛亮集》文集卷1《自表后主》。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集》文集卷2《诫子书》。

《三国志·蜀志·费祎传》裴注引《费祎别传》。

《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三国志·蜀志·邓芝传》。

《孟子·告子》。

致社会上“率兽食人”乃至“人将相食”。他进一步主张，人人必须“与人为善”、“舍己从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

正是在这样的利他、利社会、克制自我膨胀的人生观与道德情操熏陶下，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生命或者个人与他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中华民族许多优秀人物都是表现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要情、要义而不为利之所动的高尚情操。如，反元兵败被俘的南宋将领文天祥，被囚禁在元大都三年，在百般威胁利诱下不为所屈，最后被害。他死前作赞收于衣带中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是把仁和义看作比利禄乃至于个人的生命更高的！在处理家庭生活，同样地也是不乏其例的。东汉时，大臣宋弘被光武帝刘秀的妹妹看中，欲嫁之；光武帝亲为说媒，劝宋弘“富贵宜易妻”。宋弘不慕虚荣，不畏权贵，严肃地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一个钉子把皇室贵戚顶了回去。从此，后世便把“居富贵者不易糟糠”作为衡量一个人精神世界、道德情操高下的重要标志。

5. 执着无畏，图强革新。

这种品德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永远奋进，不可战胜的重要精神底蕴之一。

为了追求某种事业的成功，百折不挠，艰险无阻的事例，在我国历史上举不胜举。如，传说中的大禹在接替因治水无功而被杀的父亲继续治水后，手执韦锸，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十三年，终于征服了洪水，完成了远古时代的一项伟业。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被匈奴虏押十几年，逃出后毅然继续西行，到达西域，回来途中再度被扣年余，仍逃出后回长安以“复命”。东汉时的班超则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在西域经营了30多年，极大地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唐时，玄奘为去天竺取经，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而不悔，终于到达目的地，取回佛经，并在长安大雁塔日夜翻译，直至逝世，以成宏愿；鉴真同样经历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六渡茫茫大海，终于按照誓约完成了赴日传律授戒的任务，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他们有的为了“俗世”，有的则为了“宗教”，但是，其执着的追求，遇百难而仍向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是一致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人们都知道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休养，十年生息”的自强不息事迹和象屈原、司马迁等许许多多身处逆境反而更加激奋，终于有大成就于世的光辉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上同样都深深地烙记着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一部中国历史上，锐意改革，以促使社会进步，乃至殉身于改革事业而不悔的故事，层出不穷。从春秋时郑子产“铸刑鼎”为了“救世”，到战国时的李悝、吴起、商鞅的改变社会性质的变法运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滕文公下》。

《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后汉书·宋弘传》。

《东坡志林》卷三。

射”，再到南北朝时的孝文帝“汉化”、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以至于近代的康、梁“戊戌变法”，等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些事例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励精图强，鼎旧革新的民族；先人们为变法、革新而表现出的锐气和不畏一切困难的勇于牺牲精神，同样是我们民族的一种骄傲。

应该说明，以上所列的事实远不全面，所举的事例更是挂一漏万。但是，从中也是不难看出，在人类的历史中所蕴含的有关思想品德、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是何等地丰富而且沁人肺腑，感人至深！“历史无情亦有情”。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用以陶冶青少年乃至全民族的情操，无疑地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三章 史学研究的方法

史学研究方法，是人类认识历史的工具。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离开了史学研究方法，人类认识历史即历史研究的任务就不能够完成。

由于史学内容极其丰富，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史学研究的方法也就不可能单一化，而应该是丰富多样的。目前，诸多的史学研究方法越来越构成一个日臻完善的科学化系统，并且不断地升到理论的高度。本章着重介绍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的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参见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和姜义华等：《史学导论》。

第一节 搜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的方法

历史文献资料的数量巨大，来源十分繁杂，必须通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才能使其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目录的利用

1. 目录的涵义

“目录”一词始出自《七略》，其中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此词一直为后人所沿用。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书名或一书中的篇、卷的名称。录是对目的说明介绍，亦称叙录，即把一书的内容，作者事迹、书的评价和存佚、流传情况以及校勘经过等写成简明扼要的文字。把一批书名或篇卷名与说明介绍编次在一起就称为目录，也称书目。

目录对于读史书和治史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说过：“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作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目录学就好象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我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容易地找到了。”因此，欲读古代典籍，掌握、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必须要了解、掌握一定的目录知识，并把它作为治学的入门工具。

目录在我国起源较早，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是最早的比较完备的目录专书，但是该书已经佚失，庆幸的是，《汉书·艺文志》基本上保留了《七略》的内容，因此，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目录。

2. 目录和目录书分类

有了目录和目录书，就有了目录和目录书分类。有了分类的目录和目录书，人们在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才可以分门别类地去查寻相关的资料。因此，要想正确地使用目录并使之为学习和研究工作服务，就必须先要了解一些目录和目录书的分类情况。

《七略》采用了六分法，将所辑书目依照学术性质分类编目。它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保存并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即把图书分作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每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其中，六艺类9种，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类10种，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类5种，为赋（屈原等），赋（贾谊等）、赋（孙卿等）、杂赋、诗歌；兵书类4种，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术数类6种，为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刑法；方技类4种，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由于当时史学还不够发达，史籍数量尚少，六分法中没有独立

《昭明文选》卷38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用语。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

陈垣：《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

的“史部”，史书类是附属于“六艺·春秋”类之后的。

魏晋时期，晋秘书监荀勖依据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编著目录书《中经新簿》。书中改六分法为甲、乙、丙、丁的四分法。此后，几经因革，到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以经、史、子、集替代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曾说：“四部之体，不始于本志（按，指《隋书·经籍志》），而四部之书之存于世者，则惟本志为最古矣。”可见，《隋书·经籍志》是现存最早的采用四分法编目的目录专章。

自《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后，历代很多目录书都根据这一分类法进行编目。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就仍然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其编目为：

经部 10 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 15 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 14 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集部 5 类：楚辞、别集、总结、诗文评、词曲。

可以说，目录的四部分类法自隋唐以来，一直被长期沿用，它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目分类的最主要方法。应该看到，其间也有不少学者对之加以损益改动，但是，始终未能超越规范，另辟门径。

除目录分类外，还有目录书的分类。

关于目录书的分类，清代学者汤纪尚明确指出：“目录之书，权舆中垒（刘向曾任中垒校尉，汤意即始于刘向《别录》）。流派有三：“曰朝庭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所谓朝庭官簿，即指国家图书目录或官修目录；所谓私家解题，是指私家编修的目录；所谓史家著录，是专指史志目录，即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国史目录（如北宋分编的《国史艺文志》等）、专史目录（如郑樵的《通志·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等）。这是从纂集工作体制的角度来区分的。

如果从目录的内容和用途范围的角度来看，又可以分为综合目录书和专门目录书。

综合目录，是将包含各科问题的书目汇集、编排成一部目录书，因此又称群书目录。综合目录是读书和历史研究中使用最多、用途最广的书目。如刘向所编的《别录》和刘歆编撰的《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

专门目录，是将一书中各篇目录、某一专科领域的书目或与某一专书有关的书目汇集编排成一部目录书。前者如《史记》的目录（《太史公自序》）就是由 130 篇篇目组成的。其篇目与说明如：秦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中者如《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这是专门的史籍目录；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

汤纪尚：《槃藻文乙集下·周郑堂别传》。

《晚清戏曲小说目》，这是专门的文艺目录等等。后者如《三国志注引书目》、《世说新语注引书目》、《续汉书八志补注所引书目》，这三部目录合称《古书目三种》，是把某一书所引的各种书籍编目，借以考察该书所用资料的范围、来源，从中还可以看出其引书的存佚情况。《史记书录》则是把与《史记》有关的参考书汇集编成目录。

3. 目录的使用

在学习和研究历史过程中为了获得史料，要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这就需要利用目录书。下面介绍几种经常使用的目录书。

《四库全书总目》。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昀（1724—1805，字晓岚）实际主持撰修，成书于乾隆年间。该书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 346 种，79309 卷以及《四库全书》存目书 67938 种，93550 卷。全书共 200 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编排，部下又分为若干小类；每部前有总序，类前有小序，分别概述部、类所收著作源流及分类的原因；书目提要一般包括该书的卷数、源流、作者生平、内容要旨、书中得失及文字校勘等。《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以后，因卷帙浩繁，翻检不便，纪昀等人又对《总目》删繁就简，只录书名、卷数、作者等项，并去掉存目、共得 20 卷，名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空前的目录巨著，它大量收入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著作的书目，是我们研读古代书籍的最为方便的重要检索工具之一。清人张之洞说：“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但是，《四库全书总目》也有许多谬误。近人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辩证》24 卷，对《总目》作了较为全面、系统、慎密的考辨，检阅《总目》时，可作参考之用。

《书目答问》。该书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回答“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而编写的，1876 年（光绪二年）由张之洞署名刊行问世。该书收入古籍书目 2200 多种，其中，“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所列书目基本按照四类法编排，但于经、史、子、集之外增加了“丛书目”。《答问》所收入的每一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标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撰者认为重要的书加有简明的按语。

《书目答问》传世后，近人范希曾为纠正原著书中的错误，并补其不足，于 1931 年出版了《书目答问补正》5 卷。《补正》纠正了原著书中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内容等方面出现的一些讹误；补收了《答问》问世后“五十年间所著新雕未及收入”的书著。

《书目答问》及《书目答问补正》将《四库全书总目》成书后 150 余年来新出的书目，择要注录，并注明各书版本，便于查阅，是两部很有参考价值的目录书。

《贩书偶记》。本书为近人孙殿起在数十年古书贩卖事业中所目睹经手古籍的记录。初刊于 1936 年；1959 年由中华书局排版重印。这部书“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以来的著作总目”，但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该书一概不收，如有所收，必是卷数、版本有所不同的，因此，“其作用相当于‘四

张之洞：《轺轩语·语学》。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库全书目录’的续编。”《贩书偶记》初刊以后，孙殿起又继续于贩售书的过程中积配书目资料1万余条。后由他的助手雷梦水整理编次，题名《贩书偶记续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亦是实用参考价值较高的目录书。

《中国丛书综录》。本书由上海图书馆编，1959—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分3册，收录全国41所图书馆馆藏丛书2797种，其中包括古籍书目38800多种。第一册“总目”，是对所收入书目进行分类编次，并对每种丛书的书名、分类、编者均做了简要的介绍，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便于读者检阅。第二册“子目”，是将丛书所包括的古籍，按经、史、子、集编排起来的子目分类目录，便于读者按子目类别查寻古籍及所属丛书。第三册“索引”，包括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可供读者检阅第二册使用。

《中国丛书综录》收录古代丛书比较丰富，编排方法也较科学，是目前最便于读者的丛书目录，对阅读古籍，研究问题，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本书为一部专门性目录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1900—1975年间出版的史学著作9000多种。全书分作上、下编。上编包括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法，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和物质文化史、综合参考等5部分，每个部分下又分若干子目；下编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农民战争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学术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教育史、图书馆及其他、文学史、语言文字史、科学技术史、地方史和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附华侨史）、史学史和史料学等15部分，每个部分都大体包括中、外两个方面的著作。书后附有著者索引。本书为读者了解20世纪以来有关史学的撰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中国地方志综录》。本书亦是一部专门性目录书，朱士嘉编，1935年出版。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增订本。本书根据全国41所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编成，收录地方志7413种，109143卷。70年代中期，该书又修订、增补改名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地方志增至8500多种，反映馆藏单位180多个。本书是我国现有地方志目录书中比较完善的一种。书中所收志书按行政区域编次排列；介绍了所录志书的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书藏于何处；书后还附有“补遗”和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查找。

附：索引

索引，又名引得，旧称“通检”。是将书刊中的编目、语词、主题、人名、地名、事件及其他事物的名称，分类编次，并注明出处的一种检索工具书。索引的种类有很多，按其所揭示的对象划分，可分为书籍索引，如《尚书通检》、《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报刊索引，如《光明日报索引》、《历史研究索引》、《全国报刊索引》等。按所取材的范围划分，可分为综合性索引，如《全国报刊索引》等；专题性索引，如《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等。

通过索引不仅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专题研究文章篇目与出处，还可以从中看出有关学术发展的状况及趋势，这些都给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

二、版本的利用

1. 版本的涵义

版本二字联用，成为固定的名称，始于宋初。在此之前，人们把手抄的书籍称为“本”。刘向在谈到他校理图书的工作时，就说：“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南北朝时，北宋学者颜之推在所著的《颜氏家训》中，提到了河北本、江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俗本等名称。可见书称为本由来已久。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把雕版印刷的书称为“版”，即“雕版谓之版，藏本（写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

版本成为固定名称之初，是为了区别写本。后来，随着印版书的日益增多，各书印版各异，图书收藏家便对不同印版的书，分别予以著录。这样，版本的涵义就扩大了。再后来，版本的涵义进一步发展，包括了抄本、拓本（石经摹拓本）、刻本及石印本、影印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

掌握一些版本的知识是历史工作者搜集历史文献资料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历代史家、学者对此非常重视，他们在读书时，注意搜寻一书的不同版本，相互校读，订证了不少谬误；刻印某书时，也利用版本知识以求得较好的底本。

版本和目录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刘向在校书过程中就曾经广搜异本，并在编撰《别录》时把书籍的各种版本情况写入了书录。从现存的《别录》几篇书录中，可以看到他所校的书有中书（宫中藏本）、外书（社会传本）、太史书（太史令藏本）、太常书（太常寺藏本）、臣某书（私家藏本）等异本。宋代学者尤袤编撰了《遂初堂书目》，书中采用了把一种书的异本作为目录专项的方法，创制了专门的版本目录，从而在实践中把版本和目录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其后，许多目录书的书录都列有版本专项，这就为阅读古籍提供了很大方便。

2. 版本的区分和评价

古书的版本有两大类，即抄本和刻本。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抄本的分类情况因年代久远只能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中，搜集到片断的材料。如，从刘向《别录》所留存的几篇书录中见到的中书、太史书、太常书、臣某书等，就是按藏书者不同区分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说：“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素书即帛书。这段记载就是按书写材料不同区分的；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则是按传抄者不同或传抄地方不同区分的。按书写方法的不同区分，还可分为手写本和拓本等。

刻本，即雕版印刷的书。按雕刻、印版材料的不同区分，有木刻本、活字本（又分为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锡活字等）；按刻本时代的不同区分，有宋本（又分为北宋本、南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清本及新刻本等。再细分，如北宋淳化本、咸平本；元大德本、至正本；明永乐本、成化本，嘉靖本；清康熙本、乾隆本、同治本等。按刻书机构和刻书人的不同区分，有官刻本，即由政府机构主持编校刊行的书籍，如监本、经厂本、内府本、殿本、官书局本等；坊刻本，即书商以书坊名义刊刻的书籍，如明富春堂本、文林阁本等；家刻本、又称私刻本，即私人在家中刻印的书籍，家刻本有用刊刻人姓名称呼的，如黄善夫本（宋）、毛晋本（明）、凌

刻本（明，凌蒙初）、阮刻本（清，阮元）等；有用书斋、书堂命名的，如宋廖莹中的世彩堂本、明毛晋本又称汲古阁本、清黄丕烈的士礼居本等。按刻书地点的不同区分，国内宋元时期主要有浙本，即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各地刻印的书的统称；蜀本，即四川刻印的书；福建本，即以建宁府和建阳县麻沙镇为主的福建各地刻印的书的统称。明清时期，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又继起刻印书籍。国外主要有朝鲜本、日本本、越南本等。按同一书刻版的先后区分，主要有初刻本，又称原刻本、重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按书的内容增删和评点等区分，主要有增订本、删节本、足本、残本、注解本（又分为单注本和集注本）、评点本、批校本、标点本等。

了解和掌握了有关版本的情况，就为读书和搜集资料时选用好的书本准备了条件。但是，要真正能从众多的版本中择出好的版本，还需要掌握一些有关版本优劣评价的知识。在这方面，历代学者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后人参考。

对于版本的优劣，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评价，从治史、搜集史料的角度讲，应主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从书版的年代看，一般说年代久远的为好。清末以来的藏书家大都推崇宋元旧刻。清人叶德辉的见识颇具代表性。他说：“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他还认为：“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

因此，明本问题最多。宋本之所以极受人们的重视，其原因是：第一，除当时人著作外，宋版书大多根据古代写本而来，是为旧本。第二，宋代刻官，非常注重精校细勘。因此，宋版书错误较少。第三，宋版书的纸张优良，刻印精美。元刻多出于宋本，在宋本传世甚少的情况下，元本的文献价值亦很高。但是，宋元版本也有优劣之分，不能一概而论。明刻本中，虽然问题较多，但明初刻本较好，万历以后较差。清代乾嘉时期，校勘学名家辈出，其时所刻之书，精校精勘，不乏佳刻。

（2）从刻书机构看，官刻本较好。由于刻书的机构不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的质量有所不同。官府刻书，由于其财力雄厚，人力充足，校审慎密，刊刻工艺水平较高，一般胜过其它。但私人所刻之书，往往是刻书人珍爱收藏并深入研究过的书，在校对上，有时比官刻本还好。坊刻本为书商售书谋利而做，为了赚钱，他们往往不惜粗制滥造。因此，坊刻之书大多纸墨刻工粗糙，校对不详，与官刻本、家刻本相比，一般质量较差。

（3）从刻书地点看，宋版中浙本为好。宋代学者叶梦得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这是宋人评价宋版书。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叶梦得亦做了分析。他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个评语是符合事实的。宋代雕版印书业空前发达，杭州（浙江）、四川、福建是当时主要的刻书的地区，所刻印之书流传最广。其中，杭州是宋代印书的中心，所刻之书，又称浙本。浙本书版字体方正，刀法圆润，是宋版中最好的一种。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7。

叶梦得：《石林燕语》。

宋代监本大多是在这里刻印的。四川刻印的蜀本，不如浙本，但其雕版特点是字体较大，又称蜀大字本。福建所刻书版，称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这是因为闽本多是在建宁府和建阳麻沙镇雕版成书的。麻沙镇附近盛产一种木质松软的榕树，书商为易成速售而谋取丰利，多以它为材料，雕印图书，一时“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但其中讹误百出，一般说，在宋版书中质量最差。

(4) 善本为好。善本即好的版本。历代学者都主张读书要讲求善本。什么是善本？清人张之洞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旧本。”足本，即指无缺卷、未删削之本；精本，即指精校、精审、精注之本；旧本，即指旧刻本、旧钞本。从治史的角度来看，能得到古书的善本，是从众多古籍中搜集到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前面所述，古籍版本在其形成及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如，从刻书年代看，宋版为最佳，但宋版中也有劣版，明版较差，但明版里面也有佳作；从刻书机构看，官刻为好，但官刻也有劣品，坊刻最差，可是坊刻亦有珍品；从刻书地点看，宋本中浙本最好，但浙本中也有滥本，闽本最差，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亦有佳版。同时，即便是古籍善本，里面也不免存在讹误之处。因此，在评价版本优劣、审别版本好坏时，要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详密的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好的版本。

3. 几种较好的版本和关于版本研究的书著

自宋以来，古籍的版本繁杂。特别是学者经常碰到的众多的明、清版本中，有哪些版本较好呢？此非一言两语说得清的，现在，只能就一般人的意见，介绍几种给大家。(1) 汲古阁本。又称毛晋本，为明代常熟学者汲古阁主人毛晋所刻群书的总称。从明万历末年至清顺治初年的四十余年间，毛晋在对自己所藏之书精校细勘的基础上，先后刻印600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影钞宋版书。流传较广的汲古阁本有《十三经》、《十七史》等书，其刻印精良，被清以来的学者视为善本。(2) 殿本。是指康熙、乾隆年间在武英殿设修书处所刻印之书。至乾隆十二年(1747)，共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明史》、《大清一统志》、《三通》、《旧唐书》等。这些书校勘详密，写刻工精，纸张优良，墨色颇佳，深为后来学者所倚重，均可称为善本。(3) 局本。同治年间在江宁(今江苏南京)设立金陵官书局，之后，江西、浙江、福建、两广、两湖等地也相继设立官书局，其所刻印的书，均称“局本”。其中，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5个书局，合刻一部《二十四史》，称“五局合刻本”。这部《二十四史》主要用汲古阁本和殿本作为底本刻印，也可列入善本。(4) 百纳本。是指采用断碎不全的各种版本，拼凑而成一部书，就像僧人的百纳衣一样。清初学者宋荦、集宋版2种、元版3种，合成一部80卷的百纳本《史记》。近人傅增湘用收集到的各120种卷数不同的宋版，合成一部百纳本《资治通鉴》。后来，商务印书馆又把不同版本汇集起来，影印了一部百纳本《二十四史》，其中保存了不少宋元刻本的原貌。该书问世后，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张舜徽先生曾用这部百纳本《二十四史》和殿本《二十四史》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了殿本中的讹、

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

张之洞：《輶轩语·语学》。

衍、缺、脱现象较为严重。由此可见，百纳本是善本。

除上述外，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由一批著名学者、专家校勘、标点的《二十四史》。该本中的各史所依版本不同，原则是择善本而用之。书中搜集了历代各家注，并附有校勘记。因此，可以说这部《二十四史》是目前正史中最好的版本。

利用版本，除要了解都有哪些较好的版本外，还要掌握并充分使用版本目录书。下面介绍几种版本目录书。（1）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邵懿辰撰，其孙邵章续录。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标注》中每书的著录分标注、附录和续录3个部分。“标注”为邵懿辰所记古籍版本，原收在1911年刊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内。“附录”是邵友诚根据王懿荣家传抄本《四库书目邵注》的邵章手录本，校补订正了诸家有关版本的批注。附录下均注明批注者姓名，便于读者了解批注的情况。“续录”是邵章仿标注的体例编成的，专录咸丰以后刊出的各本，并加以评注，可补标注及附录所未提及的版本。书后还附有《善本书跋及其它》、《四库未传本书目》、《东国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记载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著录的各书版本，是一部实用价值很高的查考古籍版本的书目。（2）《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清莫友芝撰，莫绳孙编。1923年由上海扫叶山房石印出版。全书共分16卷，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所收书不限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中详细记载了所收书目的版本，何本为善，亦间有注明。可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互相参考、印证。（3）《四库目略》。杨立诚编。1929年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本书是作者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邵亭知见传本书目》3书改编而成的。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每书著录包括：书名、著者、卷数、版本、内容提要等。可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互参使用。

除上述版本目录书外，《书目答问》及《补正》对所著录书目的版本十分考究；《贩书偶记》在著录书目的同时，对一些书的版本也有记载。上述二书可为查寻古籍版本之用。

三、史书的辨伪

1. 伪书的出现

辨伪，即辨别古书的真伪。大凡古书，都有个真伪问题。近代学者张心澂编撰了一部《伪书通考》，所列举的伪书，经部有73部、史部有93部、子部有317部、集部有129部之多。由此可见，在辨别了古书的真伪之前，就轻率盲目地读它、运用它，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我国，伪书伪事的出现较早，战国时期，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孟柯等“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揭露了他们编造五行学说，并依托古人以欺世人。这是文献中所见较早作伪及辨伪的事例之一。

古代为什么会产生伪书？其原因有很多，并且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受“尊古卑今”观念的影响，借托古人之名，以使自

参见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第1编第2章第4节。

新标点的《二十四史》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

己的作品受到世人的重视。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修务篇》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而诵之”。这段文字中所谈到的盲目崇古之风在汉代以前就很严重，汉代以后仍然存在与发展，并流行至明、清。在这种思想和风气的影响下，不少人便托古写书，以取得世人的重视。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都是后人托名之作。（2）为牟利炫名作伪。每当统治者下诏求书，并且说明献书有赏时，一些投机取巧者便借机大造伪书。汉初，先秦文献典籍《尚书》残缺不全，只流传 28 篇。汉成帝时，曾诏求天下遗书。山东东莱的张霸便趁机伪造《尚书》102 篇，献于朝廷。但该书是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并且“篇或数简，文意浅陋”。因此，很快就被识破了。隋文帝时，“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当时的有名学者刘炫，也竟然伪造《连山》、《归藏》两部易经，“录上送官，取赏而去”。（3）出于学派之争的需要作伪。学术之争历来有之。但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和“文人相轻”杂融在一起。学者之间互相轻视，彼此攻讦的事，屡见不鲜。王肃和郑玄都是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王肃年辈稍晚于郑玄，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那时郑玄经学已取得支配地位，盛行于世，王肃为了在经学方面别树一帜，便自己伪造了一部所谓《孔子家语》，并亲自为其作注。他还在自序中堂而皇之的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后世之君子。”王肃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家语》实出于孔子后人，而与己说暗合，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郑玄正确。后来，通过历代学者的辨证，《孔子家语》是伪作，已成定案。（4）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伪。封建社会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经常发生，为了打击对手，派别之间不惜用制造伪书的卑劣手段，彼此诬陷。唐代有牛、李党争之事件。官僚李德裕和牛僧儒为了争夺朝权，各纠集门徒，互相攻毁，前后斗争近 40 年。李德裕的门人韦瓘为了达到诬陷牛僧儒的目的，自编了一部《周秦行纪》，但其内容是牛僧儒“自叙所遇异事”，并题名牛僧儒撰，“以此诬僧儒”。

伪书产生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伪书的种类和造伪情况亦多而复杂，现择其主要叙述如下：

从造伪的程度上看：（1）全部伪造。如《孔子家语》系王肃伪作，根本不能用来研究孔子及其思想。（2）部分伪造。这类伪书里，有的是真书中杂有伪的内容，如《庄子》的内篇 7 篇是真书，外篇 5 篇和杂篇 11 篇为其弟子及后人的作品，是伪作。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然而今本《史记》10 篇都在，应为后人所作。再如，《管子》、《论语》、《左传》等书中，都有后人附会增益的内容。有的是伪书中杂有真的内容，如今本《竹书纪年》为唐宋之后的伪作，但其中有抄自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当为真书。

《汉书·儒林传》。

王肃：《孔子家语》自序。

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从造伪内容的不同看：

(1) 伪造年代的。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而神农、黄帝都是早于商代的传说中的人物，一般认为当时并无文字，没有文字那来的书？因此，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一类的书，必为后世之作。

(2) 伪造作者的。如《管子》、《商君书》，虽均为先秦古籍，但绝非管仲、商鞅之作，系后人所托；今本《列子》为东晋人张湛所作，但他托名于列御寇，是伪造作者。

(3) 伪造史实的。如唐人韦瓘以牛僧儒名义作《周秦行纪》，就是伪造史实的典型一例。

2. 辨伪的方法

有了伪书，就有了辨伪工作。历代史家和学者对书的辨伪工作非常重视。刘向、刘歆校书时，就曾考定过不少古书的真伪及其时代问题，《汉书·艺文志》的作者班固将其融入自己的看法中保留了下来。《志》中从事实、文辞、时代等各方面对所录群书予以了大量详密的考察，并用“作托”、“似依托”、“后世所加”、“似皆非”等语，注明其中的伪作。宋代学者朱熹在总结前人辨别伪作的基础上，提出：“精思明辨以求真是”的思想和主张，是正确的，这对后代学者的辨伪工作，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明代学者胡应麟通过实践，写出一部辨伪专书《四部正讹》，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八种方法，即“辨伪八法”。这八种方法是：

(1)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是说凡西汉以前的可疑之书，可用《汉书·艺文志》（因《七略》的大部分著录保留在其中）来辨证。

(2)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是通过核对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可知道某书何时见于著录，何时无存，以考察其流传的线索。

(3)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通过核对与某书作者同一时代人的著作，查看有无谈到或引用该书的地方。该书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称与同时代著述是否相同。(4) “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核对后世的著作，查检其中有无引用或发挥该书的言论或观点。

(5) “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是从文体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吻合。

(6) “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从内容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史事相符合。

(7)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是核对作者，看其是否出于托古。

(8) “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是核对传播者，查明首先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在胡应麟“辨伪八法”的基础上，又提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即“辨伪十二法”。现录于下：

(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如“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梲机》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2)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如缪荃孙所藏明钞本《慎子》，篇数与诸旧本“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3)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如“晋梅賾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因来历不明，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

(4)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绝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殆可断言，“其书不惟出神农”。(5)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绝非汲冢之旧也。”

(6)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绝非管、商自撰。”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如司马迁撰《史记》，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

(8)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如今本《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9)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而“《入楞伽经》佛说：‘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10) “各时代之文体，善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要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语》、《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绝非三代以上之文。”

(11)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如《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其中有“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这种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汉书·艺文志》“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

(12)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此明是墨翟、宋钐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

以上胡应麟的“辨伪八法”和梁启超的“辨伪十二法”即是前人辨伪经验的总结，又是其本人在多年辨伪实践中的至深体会。可供我们读古书、鉴别史料时借鉴使用，并根据新的情况和需要加以发展。

3. 辨伪成果の利用

历代学者在辨伪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如何利用这些成果来为我们今天治史服务呢？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辨明的伪书。辨别伪书的目的是为了摒弃之，而是要正确地利用它。近代学者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主要能在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误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一书中也说：“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年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贗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如辨清楚《内经》不是黄帝所作，而是秦汉时成书的一部总结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的著作，其学术、史料价值就会极高了；《列子》为晋人张湛伪作，用它来研究先秦思想是不行的，但辨明其伪托者及年代后，它便可成为研究晋人思想的重要资料了。再如，《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但其中《孔传》作用在于解释经文，经文本来是人人都是可以解释的，人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伪《孔传》，是因为作伪者伪托孔安国所作。辨明了这一点，《孔传》仍不失为有用的注解。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尚书》，还要用它作为重要参考，它对词义、文义的解释，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材料。

二是要掌握并使用一些前人重要的辨伪著作。前人辨伪的书著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书辨伪的：如《古文尚书疏证》，清代学者闫若璩著，全书共有8卷。该书引经据典，把《古文尚书》和《孔传》的作伪证据详密地罗列出来，析为128条，极有说服力地论断《古文尚书》及《孔传》是伪作。这部书是研读《尚书》的重要资料。《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近代学者王国维撰著。全书分上、下两卷。作者对《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该书可作读《竹书纪年》的重要参考书。《列子伪书考》，近人马叙伦撰著。该书“举证二十事”，说明“其书必出伪造”，是辨别《列子》真伪的一部力作。

一类是群书辨伪的：《四部正讹》，明胡应麟撰。收入中华书局铅印《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1955年出版。本书所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辨别伪书70余种，将所辨伪书按性质分为20类，并提出“辨伪八法”。该书是一部重要的群书辨伪专书。《古今伪书考》，清姚际恒撰著。收入中华书局印行的《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1955年出版。本书分经、史、子三部，辨别伪书90余种，每书多采前人成说，间有自己的见解。后来，黄云眉又撰《古今伪书考补证》，195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姚书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补证，使用时，二书可互相参考。《伪书通考》，张心澂撰著。1957年由商印书馆出版。本书将《诸子辨》、《四部正讹》和《古今伪书考》三书拼合起来，以书名为纲，对前人的考辨全录或节录，遇到不同说法，也分别收录，并注明出处，最后以按语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本书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共辨书1105种。全书后附书名著者索引，便于查阅。

四、史书的校勘

1. 为什么校勘

校勘，又称校订，更通俗的说法叫校对。是指用古书的原本或定本及有关资料进行核对，比较文字篇章的异同，订正其错误。即主要看其文字是否有脱、衍、讹、倒等情况。古代又称校勘为“校讎”。刘向曾对校讎下过定义。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

古籍中文字的脱、衍、讹、倒十分严重。清代学者齐召南在谈到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书籍的刊印情况时说：“版本印染，日传万纸，于人甚便，人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袭，校讎稍疏，辗转失真，‘乌’、‘焉’成‘马’。故书有版本，而读者甚易；亦自有版本，而校者转难；固其势然也”；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或传抄或口授，其中的脱误也很多。上述情况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如，沈刻本《元典章》的《新纲目》中，有“颁行四方已有年矣”的话，在元刻本中“颁行”则为“板行”。“颁行”应指朝廷颁行，而“板行”则是地方上刻版印行。这一字之错，竟然关系到《元典章》的法律地位。再如，《汉书·楚元王传》谈到《古文尚书》出现时的情况，指出：“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而孔安国在天汉元年之前已经死去。以时代上的破绽为起点，后代学者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纷争不已。直到清初阎若璩据荀悦《汉记·成帝纪》“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之文，“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这才使争论平息下去。因此，清末学者叶德辉曾发出感慨“书不校勘，不如不读”。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也说：“校勘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

书籍的校勘起源很早，先秦典籍中，记载了不少有关校勘的事例。如《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二十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是关于孔子先祖正考父校订《诗经·商颂》的情况。大规模系统的校书工作则是从刘向整理皇家图书开始的。刘向在整理图书过程中，曾以“中古文”，即宫中所藏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经发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刘向以后，历代学者都很注重书籍的校勘工作，到了清代校勘典籍达到鼎盛，出现了一批校勘名家，其成绩斐然。

2、校勘的方法

前人在实践中，由于学识、角度的不同，总结出了许多校勘的方法，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式。”清人吴承志在《校管子书后》中提出了校书五例：“有可据善本校改者，有可据古本校刊者，有可据注文校改者，有

《昭明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

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3。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叶德辉：《藏书十约》。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

《师石出房丛书》本《七略别录佚文》。

可据本书校改者，有可据文义校改者。”近人蒋元卿又曾概括清代学者的校勘方法为四点：（1）用两本对照，或据前人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2）根据本书或他书之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之讹误。（3）根据发现著书人之原体例刊正全部通有之讹误。（4）根据别的材料校正原著之错漏。

张舜徽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中，针对初学校者的情况，提出了校书中常见的十种情况和不同的记注方式，即十种比较机械的基本校书法：“一、凡文字有不同者，可注云：‘某，一本作某。（或具体写明版本名称）’二、凡脱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字’。三、凡脱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四、凡文字明知已误者，可注云：‘某当作某’。五、凡文字不能定其误者，可注云：‘某疑当作某’。六、凡衍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无某字’。七、凡衍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字下无某某几字’。八、字倒而可通者，可注云：‘某本某某二字互乙’。九、字倒而不可通者，可注云：‘某本作某某’。十、文句前后倒置者，可注云：‘某本某句在某句下’。”

陈垣先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校勘《元典章》时，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提出了“校法四则”即校勘的四种方法，又称“四校法”。这是清代以来校勘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校勘方法日臻成熟的标志。“校法四例”是：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数法。”下举两例：其一，有的书非对校不知其误者，因为从文义表面上看无误可疑。如“吏三十六 元关本钱二十定 元作一千定”；“刑一七 大德三年三月 元作五月”。其二，有的书知道是一误处，但不用对校就无从知道是什么误处。“户七十二 每月五十五日 元作每五月十五日。”“兵三七 该六十二日奏 元作六月十二日奏”。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决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句字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例：“吏六十四 未几月不许预告迁转上下文均作九十个月。”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例：“吏一廿七 荨麻林纳尖尖元刻亦作纳尖尖”，“吏一三四 荨麻林纳失失元刻亦作纳失失。”“纳尖尖”对还是“纳失失”对，用对校

吴承志：《逊斋文集》卷6。

见蒋元卿：《校讎学史》。

见于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

法和本校法都不能解决。用《元史·祭祀志》校之，“则元典章纳失失之名不误，而纳尖尖之名为元刻与沈刻所同误也。”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搀入正文，惟闽本不独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生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例：“户六二赤银每两入库价钞一十四两八钱赤银当作赤金。”

古书的脱误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在使用上述校勘方法时，不可机械行事，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运用之。

3. 校勘成果的利用

除前人创造总结的校勘方法可以利用外，我们还可以将他们长期积累的具体校书成果拿来为读书和整理史料服务。

前人校书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校勘知识的专书。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帮助后学者，尽快掌握校勘的学问和技能。如《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垣撰，全书共6卷，1931年出版，1959年更名《校勘学释例》重印。该书在作者用5种版本校补沈刻本《元典章》的基础上，就校勘的基本方法及各种例证阐述详密。这是一部把大量校勘知识条理化的重要书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张舜徽著。全书共分“通论——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分论上——关于校书，分论下——关于读书，附论——辨伪和辑佚4编。其中，前3编，主要讲述古籍的校读，论证博实，深入浅出，对于初学者很有参考价值。该书于1962年出版，1986年重印。（2）校勘的古籍。历代学者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古籍进行了校勘。我们可以在读书过程中予以充分的利用。反映古籍校勘内容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定本附校勘记。即在经过校勘，确认为定本的书后或书中卷后附校勘记。如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影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等。二是书的校勘与注释混合在一起，附于章节或段落之后。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颜师古的《汉书》注等。三是汇集成书的载于笔记或札记中的校勘记。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3）有关校勘的论文。除上述有关校勘的书著外，校勘方面的论文也有许多，可供参考。如《“汉书”点校商榷》（四则）、《“新唐书·藩镇列传”考校记》；《郑樵“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校补》等。

五、史事的考证

1. 考证的重要性

考证，又称考据。是研究历史文献或历史问题时，依据资料对其进行考核、证实和说明，是指考订一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假对错问题。考证是整理、鉴别史料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和重要方法。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序录》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

必是也”。这是说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及我们对它应取的态度。顾颉刚先生总结自己多年考证古史的经验说：“校勘、训诂（对古书字句的解释）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这是说考证在史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我国史书浩如烟海，所包括的史事材料极其丰富，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记录人的见闻、认识范围有限等等各种复杂的原因，文献中所记述下来的史事材料，往往谬误百出。因此，欲对历史某事作出论断，必先搞清楚史事的真相及来龙去脉。如关于北宋末年河朔、山东一带农民起义领袖宋江是否投降问题，史籍及其它文献材料中的记载差异甚大：《宋史·徽宗本纪》说：“淮南盗宋江等……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也说：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等史籍的记载与宋史相同，均为宋江接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但是，1939年在陕西府谷县出土北宋末范圭撰写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么墓志铭》却记载：折可存率军俘虏方腊之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愈月，继获”。元代徐植之撰《忠义彦通方公（庚）传》也说：“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宋江到底是投降还是被擒，这是关系到对宋江评价的一件大事，但是，从目前来看，要把其基本事实弄清楚，还需要花费巨大的功夫，进行大量艰苦、细密的考证工作。否则就不可能对宋江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史事的考证工作是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方面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其意义是：第一，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各种方法和各项工作中，如目录、版本、辨伪、校勘等已包含有考证的成份及内容；第二，如果没有目录、版本、辨伪、校勘等，也就没有考证。如我们研读上古史，一定要利用《尚书》。但是《尚书》的情况很复杂，首先就要利用目录版本，搞清楚什么是《今文尚书》，什么是《古文尚书》。其次要利用辨伪的知识，了解《古文尚书》为什么不可靠。同时对《尚书》的文字进行校勘、训释，正其讹误，阐释原义。在此基础上，对《尚书》所记史事进行考证。由此可见，考证不是单一、独立的一种方法，而是与整理、搜集史料的其它方法密切相连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目录版本、辨伪、校勘等诸方法的综合运用。

此外，考证还需要有较强的逻辑素养，和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字学及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如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荥阳大会”曾一度被认为是标志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其召开时间为1635年（崇祯八年）。但是，有的学者运用逻辑推理，从大量零杂的材料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关于记载“荥阳大会”的资料来源《绥寇纪略》，是作者根据所见到的明末农民战争的公私记载整理而成的，即不是第一手材料；与《绥寇纪略》同时的两部书，《豫变纪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其一曾参加过农民军，但两部书中都没有关于“荥阳大会”的记载。同时，《绥寇纪略》中所列当时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及其活动情况与当时其他记载不符，疑点更为加重。荥阳大会的核心关键人物是李自成，要解决疑难，必须搞清楚李自成的活动。通过进一步查阅当时各地官僚给明廷的奏疏，发现李自成从崇祯七年入陕后，一直在陕、甘一带活动，到崇祯十一年冬以前这段时间里没有入关，因此，不可能在崇祯八年初到了河南和安徽。同时，查得各家起义军当时多被阻于各地，正与

官军作战。据此，而定论明末农民战争中从未有过“荥阳大会”。

2. 考证的方法

历代史家、学者对考证的方法各有所长，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1）本证。本证又称内证，即是指利用某一书内部的资料发现问题，求得证据，以达到考订史事的目的。如《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了商鞅变法中发生的这样一件事：“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变法是得秦孝公大力支持的，太子犯法是无视君父，在古代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太子继位后，“公子虔之徒”又告商鞅阴谋谋反，结果，商鞅竟被车裂而死。因此，这件事非常重要。

但是，《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是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出生。（献公）二十四年，献公死，孝公继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商鞅变法的时间，大约是在秦孝公三年至四年间，孝公年龄约为二十四、五岁，即使古人早婚，孝公这时也不可能有达到足以犯法年龄的太子。秦太子，名驪，即后来的秦惠王。《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记载：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秦惠王即位第三年“王冠”。按史记，秦制行冠礼一说二十岁；一说二十二岁。由此算来，秦惠王当生于孝公七年或孝公五年。如按此说，商鞅变法开始时，太子驪还没有出生。未出生之人如何犯法？因此，《史记》中关于商鞅于变法过程中刑于太子师这件事的记载，前后矛盾，其可靠性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用本书考证本书的一个例证。

（2）旁证。又称他证或补证。即是指用本书以外的资料作为证据，考订本书的问题。由于取证来源与证据形态的不同，旁证又可分为书证和物证。

书证，是指用图书文献资料作为证据。如前述关于明末农民战争中“荥阳大会”的有无，就需要用当时的各种图书文献资料里的有关记载作为证据，说明问题。一般说，在考证史事过程中，书证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提供大量有用的资料。

物证，是指用图书文献资料以外的实物、遗迹作为证据。对于利用物证考史，近代学者王国维曾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为我们作出了范例。他发明了“二重证据”法，即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古书文献中的材料。对于这种方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使用这种方法，充分利用甲骨文提供的史料，查阅了有关文献材料，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继考》，印证了《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物表》中的垓，即是殷先公先王亥，并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知卜辞中所见殷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基本相同，从而确认了《史记·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再如，古代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葬制的记载，其中有“黄肠题凑”，即黄心柏木累于棺外，称“黄肠”，木的头向内称“题凑”。但这种说法，主要见于书。1974—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丰台大葆台发掘了一座西汉墓葬，为了解古籍中记载的“黄肠题凑”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3) 理证。即是指在找不到任何证据或现有证据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情况下，以义理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从而达到考订史事的目的。如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在李岩其人的有无、牛金星在起义失败后的下落等史事的考辨上，由于材料所限，一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有些学者就结合现有材料，大胆运用理证的方法，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断。

考证的工作是极其艰苦和复杂的。有时为了取得证据，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查阅大量的各种资料，同时从不同角度对所得资料进行缜密的分析、思考。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考证的方法，要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轻视考证，偏重理论。认为考证微不足道，只有用理论去解释、说明历史，才是真正研究历史。因此，不愿意或不屑于去做艰苦的考证工作，而只凭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论教条，去写文章，搞所谓的“历史研究”，结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种是片面强调考证，轻视理论。认为考证即史学，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使历史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带有明显的封闭保守倾向。上述两种倾向都带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把考证与理论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使二者对立起来。其实，考证方法与理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提倡在理论的指导下正确运用考证方法，即在辨明史料的真假对错以后，用理论作为指导，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

3. 前人考证成果的利用

我国古代学者治史非常注重考证。但在清以前，考证是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融合在一起，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史学方法。如始于汉代的古书注释，除注校字词义音、补充事实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考订史事。《汉书·高帝纪》记载，项梁在定陶战死后，刘邦、项羽等人徙楚怀王都彭城。不久，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武安侯；项羽为鲁公、长安侯；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令尹”是什么官爵，为何设立？应劭（东汉）注：“天子曰师尹，诸侯曰令尹。时去六国尚近，故置令尹。”但是王赞（晋）注却说：“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其余称相。时立楚之后（指立原楚国楚怀王之孙心为楚怀王事），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二人看法不同。颜师古（唐）注说：“赞说得之。”这是关于官制的考证。司马光等在编撰《资治通鉴》过程中，对众多史事做了大量考证工作。他还把这些考订成果整理成《通鉴考异》30卷，附于书后。

清代考据学空前发达，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同时，清代考据学也有其问题的一面，但是其成绩斐然，成果累累也是为世人所共睹的。特别是一批乾嘉学者，在考证史料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清代考辨史料的著述甚多，大至可分为通辨诸史的和专辨一史的。现介绍几部如下。

《考信录》，崔述（号东壁）撰著。本书分前录、正录、后录3个部分，共36卷。所考内容，涉及上古史的许多材料。推翻了不少伪史，订正了不少上古史的史事、史实，还揭示了许多有关上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该书是学习研究上古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日知录》，顾炎武撰著。本书以读书札记形式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汇集成书，全书共32卷。该书作者每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块古碑或一处古迹，都要考证一番，然后记录下来。顾颉刚先生称顾炎武的这种治学方法，“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

《十七史商榷》，王鸣盛撰著。全书共 100 卷。其内容除校勘文字，补正讹误外，大量考证史事，详于地理沿革、职官及典章制度。本书所考上起《史记》，下迄“五代”。书名十七史是沿用宋人旧称，书中虽论及《旧唐书》、《旧五代史》，但没有列入数内。

《廿二史考异》，钱大昕撰著。全书共 100 卷。所考廿二史，即从廿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本书对各史记载出入、矛盾、讹误之处，以及年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和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方面，作了大量考订。

《廿二史劄记》，赵翼撰著。全书共 36 卷。所考实为廿四史，因其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看成是分别反映同一时代的史书，不予分开考证，故称廿二史。作者意图在总贯群史，故对每一部史书，先叙述著作沿革，评介其得失；然后提出一系列问题，再以原书排比史事，考证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认识。

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被称为乾嘉考据学三大家。他们的上述 3 部著作，体例略同，方法及内容则各有侧重，为乾嘉时期考证群史的代表作。是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史记志疑》，梁玉绳撰著。全书共 36 卷。该书为作者用功 20 年，五易其稿而成。本书根据经、子、史部群书，专考司马迁以前史事和人物，论证缜密、全面，对问题多有新的见解，是研读《史记》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此外专考一史还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陆心源的《宋史翼》、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摭逸》等等。

第二节 历史分析的方法

通过搜集和整理获得了史料，并不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终结，而是这一工作步入一个新阶段起点的标志。在新阶段工作中，人们将通过对所获史料的分析研究，得出能够揭示历史过程、本质及规律的认识。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其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等。

一、阶级分析方法

1. 什么是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在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欧洲的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才明确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问题。马克思曾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至少包括两点：一是说明了在他以前，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二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予以了肯定。马克思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发展。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结晶。

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研究一些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2. 阶级分析方法的作用

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有以下两个方面。

（1）阶级分析法可以使我們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更正补充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333 页。

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阶级社会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又应从哪里入手呢？列宁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十分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把握历史进程的线索这一点，也为资产阶级学者所使用。列宁在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后，指出：“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因此，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独有的，但是也不可因此而否认将这一方法系统化、最后定型以及在实践中充分运用，要归功于马克思经典作家。

（2）阶级分析方法在史料的鉴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在阶级社会里，人又是划分为阶级的。毛泽东在名篇《实践论》里说：“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不能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所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的史料，大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程度、或深或浅的阶级印迹，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史料的鉴别，只能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辨其真伪，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从史料的思想性上鉴别其对错。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战报”是研究战争史的最可靠材料。因为战报大都是前线指挥官给朝廷的战况报告，所报大多为亲身经历之事。应该说“战报”中确有许多真实的记录，是研究某一问题的重要材料。但是，也应看到前线将官由于个人腐败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往往在战报中篡改基本事实，如不察，则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歧途。如对1864年清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后的活动情况，当时在曾国荃身边参与军事的赵烈文在日记里记录说：“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大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又说：“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贓物，各藏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30年后，谭嗣同在写给自己的教师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阳中鹄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由此可见，赵烈文所记为清军在攻破南京后活动的真实记录。但是在曾国藩递送朝廷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所述情节，截然相反，变成湘军将士如何竭力杀“贼”，屡建大功；而他本人对城中死于“疾疫者”和“战阵者”是何等“悲涕”，并正忙于“安置难民妇女，料理善后事宜。”再如，有关古代农民战争史的各种材料记载，大都出于统治阶级人物之手，他们出于同意于本阶级，恶意于敌对阶级的感情和需要，往往对有些内容任意夸大或缩小，乃至篡改删削。对此种种情况的史料，不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鉴别，是很难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

3.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 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这一点是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述很清楚的问题。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无阶级社会阶段，并且随其发展，阶级也最终会消亡。因此，我们说阶级分析方法很重要，但是，在运用时不能超出它的适用范围。如研究原始社会史就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那种把阶级分析方法说成是历史研究唯一方法的认识及实践都是错误的。

(2)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可以从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其发展线索，但是却不能对任何历史现象都给予圆满的解释。因此，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简单化。在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无一例外都始终贯穿着几对最基本的阶级矛盾。从历史整体上看，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任何阶级，都留下了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轨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阶级总是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而必然能够取代阻碍历史进步的守旧落后的阶级。在同一制度下的社会，正是通过其内部存在的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其逐步走向繁荣和消亡。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不可能探索出这样一条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但是，决定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有些历史现象又不是用阶级分析都能说清楚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里，反复出现宦官当政、外戚专权的现象；在历代众多的皇帝中，有的精明强干、有的却昏庸无能。这些现象的出现、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及皇帝个人的能力、品行、乃至性格有关，在研究中，要给予具体分析，而不能笼而统之地归结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又如中国封建社会里，民族问题一直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但在封建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除阶级矛盾外，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绪、民族感情都是导致民族矛盾的因素。因此，在分析说明历代民族矛盾的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也应作出具体分析。再如中国历代都存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有时这一矛盾和斗争呈现出极端尖锐和白热化。秦统一六国之初，在全国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那一场争论，竟导致了“焚书”；唐朝初年，李渊的几个儿子为争夺最高权力，竟演出了一场充满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单纯用阶级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还有在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中，起义军内部的矛盾斗争，用阶

级分析也是讲不通的。象那种武断地为秦朝初年主张在全国实行分封制的人冠以“奴隶主阶级残余的代表”的论点；简单地说某某人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代言人”、是“蜕化变质分子”等等。都是僵化教条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所得出的完全歪曲了客观历史的结果。

(3)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时，其目的不是为了判明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而是为了揭示其活动的环境中的阶级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历史人物的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判明历史人物在其活动中，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的运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如简单化地把封建社会的历代皇帝统称为地主阶级总头目、封建官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对历代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冠以封建文人的称号，然后给予否定、批判。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他们所作的历史贡献无法公正地恰如其分地予以肯定。对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也曾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或过分抬高，或笼统地用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一带而过，缺乏对其局限性的具体分析。

其实，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历史上的人物是千姿百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袁世凯称帝前后，为其摇旗呐喊的筹安会会长杨度，在1922年投向孙中山，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曾为营救李大钊出过力；1929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秘密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陈独秀曾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21年前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失败。后来，组织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活动，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对杨、陈二人的评价，便不能是通过简单判明其阶级属性就作结论的，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具体细密的分析，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4) 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曾为我们做出过范例。他在1926年撰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各阶级中的不同阶层的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如文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阶层、民族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他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极大动摇性的阶层，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跑到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营垒里去，这一点为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所证明。再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土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这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要探明这一问题，就要运用阶层分析，对不同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状况进行全面具体的考察，而不能笼统地因其同属地主阶级而作出简单化的全面否定。

二、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1. 什么是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又称“比较史学”。到目前为止，给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下一个确切而公认的定义还很难。但是，在中国学者的表述中，大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

人类在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比较，可以说由来已久。在中国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已经使用比较方法研究并说明问题。他在《史记》的《列传》部分，有意地将一些具有可比性人物合传，如《韩信卢绾列传》。司马迁还在这篇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进一步点明了这两个人物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和遭遇上的共性。“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疆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也曾使用过比较方法。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非常重视比较分析方法，认为它是理解各种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他们主张：“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在具体地研究工作中，他们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如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恩格斯说：“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在研究德国历史时，恩格斯同样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更是出色地运用了比较方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通过大量实践，比较分析方法与史学研究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倍受推崇。英国历史学家杰·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

2. 历史比较方法的作用及其类型划分

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方法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由于角度不同，认识不同，对其作用的理解、表达亦不同，就一般说来，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历史现象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历史上的各种现象极为复杂多变，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要探讨和认识这些历史现象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就需要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发现其本质和规律。

(2) 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当今世界“正在愈来愈甚地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转，其中各个不同部分被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民族和国家、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但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民族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信仰的陌生感，以及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的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民族偏见，是这种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阻碍。系统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在加强各族人民相互之间了解的基础上，为逐渐淡化和消除这种偏见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8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3卷第1期。

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3) 系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这是因为系统化历史比较方法，不是以对各种历史现象作出简单排比为目的的。它要在对各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异同点进行分类排比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造成那些异同点的原因及影响，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这样，就必然要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从而推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工作向全面化、纵深化的方向发展。

历史比较的类型划分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把可以进行比较的各种历史现象，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以便于个体运用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其价值观、理论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体系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国外学者对历史比较类型的划分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将其划分为：历史类型性比较，即具有同类特征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比如西欧奴隶社会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的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中、日近代文化及近代化进程比较等。历史“渊源”上的比较。如英国人与美洲英裔移民之间的比较；香港人与台湾人的比较等。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即确有联系、有相互影响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如中日两国历史上相互影响的比较；东西方文化交流比较等。

另一种是将其划分为：作为理论的并行论证的历史比较。在这种类型中，历史比较是作为理论证明的一种辅助方式，通过对比历史实例来证明理论观点。如艾森塔斯特在《帝国政治制度——历史上官僚社会的兴衰》一书中，列举了古今许多帝国的事实，并用这些史实来论证历史上中央集权帝国的兴起、延续和衰落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杰弗里·佩奇则在《土地革命》一书中，引用一些国家的典型材料，来证明这样一个理论，即农村阶级关系和参加耕种、不参加耕种的潜在的政治行为，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作为历史现象源流的历史比较。这种比较类型的运用，旨在说明所探讨的具体实例的特点，并揭示这些特点对社会进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克利夫德·琪尔茨的《伊斯兰世界综览》、詹姆士·兰格的《征服和贸易》等著作中都运用了这种历史比较类型。作为宏观因果分析的历史比较。运用这种比较类型的前提是：作出关于宏观意义的结构和过程的因果推论，在此基础上，依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分析构想进行比较。如弗兰西斯·V·莫尔德的《日本、中国与世界经济》、罗伯特·布伦尼尔的《工业革命前欧洲农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等书都运用了这种比较类型。

中国有些学者将历史比较类型划分为：第一、横向比较。即主要是从空间角度出发，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如周谷城先生的《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型。这是目前在中国学者中，经常运用的比较类型之一。第二、纵向比较。即主要是从时间角度出发，对同一民族，同一地域，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恩格斯对德国 1825 年农民起义和 1848 年革命所做的比较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宏观比较。即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其目的在于：在系统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本质发现历史规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即是运用这一比较类型的典型著作。第四、微观比较。即不论从时间角度或者空间角度出发，都是站在历史的特定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

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如对两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比较；对两项制度或措施的比较，都属于运用这种比较类型。

3、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历史比较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首先是无论它的体系化程度有多么高，它都将受到使用它的人的价值观、理论思维模式及其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的制约。也就是说它的成败取决于来自后者的指导是否正确，而决不是相反的。那种把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任意拔高的认识和作法，是很危险的。

(2) 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始终要受到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可比性的制约。这一点，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不是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拿来就可以进行比较，它们之间要有一定的可比性，如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汉武帝和唐太宗，中日近代文化等。反之，如人物和事件就不能比较。二是，即使对比双方具有可比性，这也不是说双方的一切方面都能对比，在一个局部或一个以上的局部，仍然可以具有不可比性。如1931年12月，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有过一次谈话。当那位德国作家对斯大林说：“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当即明确地回答道：“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俄文原文是：亦可译为比较）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德国作家接下来讲：“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斯大林说：“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亲爱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接下来，斯大林还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无论谈话人自己是否认识到，这段谈话实际上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可比的事物中，也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和内容。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必须首先要弄清哪些方面可比，哪些方面不可比。否则，历史比较当然是“冒险”的和“毫无意义”的了。这就犹如比较两次战争时，将一方指挥官制定的战略战术去和另一方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做简单的比较一样，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

(3) 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和孤立化。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它自身的完善程度如何；二是，在实践中，它和其它方法能否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过分夸大历史比较分析方法的运用，是非常不恰当，并十分有害的。

三、历史计量分析方法

1. 什么是历史计量分析方法

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又称计量史学或历史定量分析方法。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揭示和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

在我国古代，就有人用计量的方法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

《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不少用数字说明问题的事例。《汉书·食货志》对魏文侯时李悝变法的记述更是集中使用了大量统计数字：“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伞到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伞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在饥三古石。故大孰则上伞三而舍一，中孰则伞二，下孰则伞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近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运用数字统计方法收集历史资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不仅收录了对我国历史上户口、田地、田赋这些重要内容的原始记载，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考订、统计分析、数据生成、制作图表等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人口、土地和赋税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

在国外，存留到今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城邦土地和人口数字的记载。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数量统计方法的运用，一批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英国学者丁·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及价格史》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研究及著作中，也成功地运用了统计方法和数学分析方法。特别是马克思在当时讲过的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其内涵极其深刻。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大量新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历史计量统计的手段不断更新，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史学中一种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并先后在欧、美、原苏联、日本等国传播。进入80年代后，这种系统化的现代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引入了我国。

2. 计量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现代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作为手段。如电子计算机这种高科技手段的加入，使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可以迅速地处理和利用在过去历史研究中，用传统方法和手段无法处理的大量史料。如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批史学工作者以计算机为辅助手段，使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整理出大量长期被搁置不用的各级各类的选举、表决结果、报告、唱名册、传记等包含的大量统计数字资料，然后用于美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2) 可以使一些模糊不清，不够确定的问题，得到较为可靠的数据证明。如1960年，美国学者R·P·麦考密克，通过对选举资料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后，发现1824年美国18个州的投票率没有一个超过历史水平，从而证明了

过去公认的“大普选”只是一个“神话”。日本学者岩下德藏运用统计学手段，根据对日本平安朝时代的《和名抄》所记载的当时水田面积的推算，证明日本发祥地邪马台国位于九州熊本县北部明海沿岸，系中国江南移民所建，解开了百余年来日本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邪马台之国”之谜。

(3) 开拓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如人口史、社会结构史、心态史、家庭史、地方史、城市史、妇女史、种族史，以及工厂、监狱、城镇、医院等社会组织的历史，都为当代史学工作者所关注，并取了明显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小山修山在《绳文时代的食物与人口》一文中，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对日本各府县市镇的大量数据的处理、计算，比较精确地推算出日本史前时代和上古时代的人口规模和地区分布状况，填补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空白。同时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应用，也使一些古老的分支学科发生了新的变化，如计量文献学、书目计量学的出现；把计量方法用于农业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史等研究领域。

3. 运用历史计量分析方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 历史计量分析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离不开价值观和理论的指导。如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的研究，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美国史学家菲利普斯在 1918 年出版了《美国黑人奴隶制：种植园制度下黑人劳力的供应、使用和控制的研究》一书。书中以大量奴隶主的家庭帐本、日记、奴隶交易和棉花买卖记录为数据，得出内战前夕南部奴隶主已无利可图的结论，认为奴隶制将自行消亡，南北战争完全是不必要的自相残杀。同时通过计量方法还得出了一个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要比一个北方工人好的荒谬结论。到了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另一批美国史学家，通过用电脑处理大批数据，却得出了与菲利普斯相反的结论，即在内战爆发前南方奴隶主从使用奴隶劳动中仍然获得了高额利润。因此，奴隶主不可能自愿解放他们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个历史学家在使用计量方法分析问题，不可能不受其思想、立场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模式的制约。美国著名计量史学家福格尔承认“新计量方法强烈地依靠理论”。原苏联历史学者柯瓦尔钦科也认为：历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学术成果，依赖于历史理论与方法的性质。

(2) 在运用历史计量方法时，要处理好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历史的定性分析往往是以定量分析为前提条件的。英国学者罗德里克·弗拉特在《历史学家的计量法导论》中说：“没有从数量方面作出回答的知识，我们便不能够解释‘重要’问题上的证据。例如我们能够弄清楚某一个人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那么，较之我们对这一收入毫无了解，就更容易解释他不断增长的幸福。”可见，定量分析的运用对于探明历史问题的内在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无论定量分析怎样重要，它仍然属于微观分析方法，即在确定局部或个体历史现象上，能起到较为准确的证据作用。在正确估价它的作用时，还应看到它自身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种认为计量分析方法是可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唯一方法的认识，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单纯依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确定历史的性质，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定量分析的结果只有经过定性分析的处理、加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3) 历史计量分析方法与其它历史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同其他任何一种历史学方法一样，计量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总是和其他方法联系在一

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起运用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某一朝代社会上各阶层的状况，即需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学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分析工作，社会阶层的划分就无法科学地确定；还需要对所能收集到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类，进行定量分析，没有定量分析对社会各阶层就无法给予必要的量的说明，而使定性模糊不清；必要时，对整理出来的数据材料还需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少片面性、随意性，才更坚实、可靠。

四、历史心理分析方法

1. 什么是历史心理分析方法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又称心理史学、心态史学。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对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和研究的方法。

在古代，中外的许多历史学家就已经发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心理活动，会对历史的发展及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揭示并说明这种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纪、传篇中，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进行过一定的心理分析。如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揭示了秦始皇身上所表现的傲慢专横、刻薄寡恩的心理因素，他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因而平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并认为这是秦推行暴政的原因之一。再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少年项羽有一段描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意学。”一次，项羽与项梁一起夹杂在人群中，观看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的仪仗队伍，他竟说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话，着实令项梁出了一身冷汗。这段描写，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少年项羽心理活动的深刻揭示，少年项羽的这种心理状态及活动正是影响他后来在事业上成功与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国外，从 19 世纪开始，一批史学家把近代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在考察个人或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借助于心理分析。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的一批学者倡导下，系统的现代心理学原理、方法被广泛地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进入 60 年代后，“心理史学”这一专门术语出现在西方史学中，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最后定型。60~70 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发展很快，一批专书和专业杂志陆续出版，如 1971 年，B·梅兹什利编辑出版了《心理分析和历史》一书；1973 年，出版了《童年史季刊，心理历史学杂志》和《心理历史学评论》两份心理史学专业杂志；1974 年，美国心理史学派的几位主要代表 R·利夫顿、E·埃里克森、R·赖夫、B·梅兹什里等合作撰写了一部力作《心理历史学研究》。该书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这一新兴学科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75 年，还出版了《心理历史学图书目录》，收集了美国出版的心理学历史学方面大部分论著。西方其它国家的不少史学家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心理历史学的研究。

由于西方心理历史学家对于心理因素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用的分

析方法和手段也不同，因而又分为不同流派。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精神分析学派、疾病学派、人文主义学派和社会学派等。它们分别强调要从童年的心理冲突、疾病的影响、性格、社会诸因素等不同角度的个人心理因素、个性和行为的特征去解释历史事件，阐明历史的动因。

2.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和资料收集

首先，由于自身的局限，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不是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领域的普遍方法，它主要是在分析历史人物时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在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既要有对个别人物的分析，也要有对群众、集体的分析。即个体心理分析和群体心理分析。关于这一点，西方一些著名心理历史学家已论及过。法国的吕西安·费弗尔在《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中说：“什么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呢？普遍意见的回答是：一方面，研究对历史的巨大业绩作出某种贡献的混乱的无名人群的活动；另一方面，研究浮现在这个灰色画面上的某些称为‘历史人物’的个人的指导行为。被了解的不多的是群众。在全部时期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群众的任何直接而详尽的证据。就以贵族政治的起因而言，经好多个世纪之久，历史就没有注意到，历史还是往往只着眼于国王们，王公贵人们、各个民族和军队的领袖们——那些‘创造历史的人’……这表明，心理学与历史关系的确定，按照一般的意见是十分简单的。怎样对待无名群众呢？他们将以研究现在可以领会的群众为基础的集体心理学去判定，而且可以无须费力地（人们至少可以这样假定）把那些研究的结论扩大应用于过去的群众、历史上的群众，至于卓越的人、‘历史人物’，他们仍然将认为属于个人心理学的范畴。”

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需要大量的资料。其主要来源有：

（1）历史文献中的“正史”里的“本纪”和“列传”保存有丰富的资料。如《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记录有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资料；《史记·陈涉世家》中还记载有关于秦末农民战争中群众斗争的心理活动资料，应注意收集整理。

（2）“传记”、“日记”、“回忆录”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著述等，往往能提供在“正史”中找不到的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应注意挖掘。

（3）“口传资料”和通过调查采访来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资料，也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重要资料来源。

3. 运用历史心理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1）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时，不能夸大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片面地用心理因素去解释历史的发展。那种把心理分析方法当作观察问题的历史观，因而脱离人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孤立地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把人的下意识的冲动，欲望和本能，视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的认识和作法是非常错误的。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基本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用这样的历史观去分析历史人物、解释历史过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必要的科学基础。

（2）现代心理学有众多的分支和学派，它们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历史人物心理活动时，简单地用心理学模式去套历

史和臆断史实，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弗洛伊德使用精神分析学说研究达·芬奇童年的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住历史的严格检验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形容马丁·路德生活历程时，虽然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弗洛伊德的局限，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精神分析学说的片面性束缚和用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论点去套历史的毛病。

(3) 由于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因此，它不能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不能替代其他方法。那种片面夸大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取的。

五、历史系统分析方法

1. 什么是历史系统分析方法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又称历史整体系统分析方法。它是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论原理，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加以分析研究的方法。

现代系统论又称普通系统论，它的奠基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在美国讲学时，公开阐述了“系统论”的内容、性质和任务。60—70年代，这一新的方法论理论普遍传播开来。1972年，贝塔朗菲在《普通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把作为生物学方法论的系统论原理推广应用于更加广泛的领域。

关于“系统”，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导论》一文中给它下过一个定义：即“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英国《牛津辞典》对“系统”一词的解释是：“由互相连接，或互相依存的成组事物或集聚的事物所形成的复杂统一体。”日本《世界大百科年鉴》中，也对“系统”一词做了说明：“系统通常是指作用于共同目的两个以上要素的集合体。”由上述表述中可见，“总体”、“统一体”、“集合体”实际就是整体，构成整体的，则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部分”、“事物”、“要素”，即局部。在系统这一概念中实际包含了一系列关系即：“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结构、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就是要求从历史整体观念出发，通过揭示整体与局部的各种方面复杂关系，认识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

系统论方法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我国，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其中，也包括历史领域。但是，由于将系统论这一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还有许多复杂的关系需要处理，因此，这方面研究不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

2.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

一般说，历史系统分析方法是由以下各项具体内容组成的。

第一，历史整体分析。贝塔朗菲在《普通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中说：“系统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根本区别于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只着重研究组成部分的概念。”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应该首先从历史的整体观念出发，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加以考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整体过程中局部以及整体过程与局部的内在的联系。在运

参见《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英文书名为：《Leonardo da Vinci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用历史整体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历史整体过程并不等于构成这一过程的各要素的简单相加，其功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力量的总和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历史研究中，局部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用它来替代历史整体过程的分析。

第二，历史层次分析。如果将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分成若干层次的。历史层次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历史整体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次递研究和对这些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考察，以达到揭示历史整体过程本质和规律的目的。

第三，历史结构分析。历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总是有某种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联系的，这种联系就是其内部结构。历史结构分析就是通过对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和作用的探讨，深刻认识社会历史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历史过程的关系，在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时，应注意既要重视历史整体结构和群体发展趋势，又要注意整体结构中的个体关系，个体特征。

第四，历史环境分析。贝塔朗菲认为：“系统的意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应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环境”和“平衡”是系统论中一对相互依存，联系密切的基本概念。系统论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随时要保持与环境的平衡作用，但是平衡又是暂时的，相对的，所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一种规律现象。历史环境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历史系统在环境中所维持的作用平衡，以及平衡被破坏和被恢复的多次反复过程，考查历史过程的多变性和方向性，以及社会的决策和运动的总趋势。

第五，历史动态分析。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社会历史总是与环境保持一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交换关系，因此，历史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我们只有用动态、开放的方法去研究分析历史过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深刻地认识历史，揭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

3. 运用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在考察问题时，只告诉我们应把考察的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从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结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中去认识对象。因此，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它强调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能排列主次顺序，因而这种方法只是在比较有限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之一。运用这种方法不能认识社会经济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不能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表现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因而单靠这种方法也就不能揭示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性。因此，它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

(2)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作用史学方法之一，必须与其它方法相结合。如研究一个历史系统整体与其要素和结构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一系统中诸要素和结构的本身进行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构成历史要素和结构的史料，要获得这些史料，就需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分析过程中，对某

些方面的内容还要借助于阶级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阐释。

(3) 将系统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要经过一个复杂而严密的转换过程，到目前，这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历史系统分析方法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在运用时，切忌不可以追求新意、赶时髦为目的，亦不可盲目套用。

第四章 史学的编纂

在第二章已经叙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表现出了多样性和多方面的特征。这里，自然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地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确实地转化成社会效益，使之能够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造福社会，泽及后代。

一般认为，史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社会效能，不外乎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研究或者学习历史，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和整体素质，然后把这一切运用到自己的事业、生活以及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达到更好地做人、做事的目的。这在许多人都是如此，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这方面的体验。它们是并不局限于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的。其二，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把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表述出来，使之能够对于社会发挥最大的效能。这往往便是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了。说到通过“一定的形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整理历史资料、写出研究课题成果，提供给有关决策机构做为制定政策时的依据或参考。如，涉及国家的外交谈判、边界问题、经济与政治改革、民族与宗教政策，乃到治河、备荒、救灾等等问题，往往都需要有一定的中国历史乃至外国历史的资料或研究成果以为参考甚至于依据。这应该是史学研究成果得以转化为社会效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成果可能不公开地发表，但是，它能够产生社会效能确是实实在在的。另一种则是以历史论文或历史书著的形式发表、出版，使之公诸于社会，发挥史学所应有的功能。这在现实中是史学研究成果表现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形式。本章所要讨论的即是这种途径和形式，即历史论文的撰写和历史书籍的编著。

在讲述历史论文与历史书籍的撰写与编著之前，有必要先行说一说史学研究成果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不同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历史论文与历史书著的共同点，最主要地是都要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去完成，没有扎实的研究工作和确实的心得体会，是不可能撰写、编著出优秀的历史论文和历史书籍的。这几乎是史学工作者的一般常识。同时，作者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述功力，否则也会有“心”中有而笔下写不出来的苦恼。

历史论文与历史书著的最大区别，如果从外延上说，前者要求窄，而后者要求宽。历史论文一般地都是集中在历史上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制度或一个现象的研究和论述，甚至于专一地考据一个年代、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字、一段文献记载；历史著作则不同；它一般地所要涉及到的方面要比一篇论文宽得多，假如是中国通史，那就是从古写到今，还要论述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就要不知涉及到多少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制度。即便是一本人物传记的历史书著，也绝不可能象一篇论文那样只是论述这个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如政绩、功过或者是其中的一点），而是必须涉及到这个人物的生卒，幼年、青年、老年，各个方面的生平活动，思想情操，以及他与时代、与他人的种种关系，等等。另外，从内涵看，历史论文要求要深，要在所论一点上达到十分深入，甚至应该要求达到前人所不及的深度；历史著作则不完全这样。它虽然也要求有一定的深度，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却不可能在整本著述中都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有时甚至还有不少地方允许吸取他人的研究成果，只是作者能够有

自己的立意、新颖结构、独到见解，然后组织编著，蔚然成书。当然，历史论文与历史书著的这个区别，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说历史书著不需要研究工作，甚至可以没有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只是抄抄编编而已。假如这样理解，便是误解了！

历史论文与历史书著又不是毫无关系的，它们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最根本的一点是，无论历史论文还是历史书著都是要建立在在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点并无二样。具体地说，历史论文常常可以为历史书著的完成，奠定基础。例如，有的专治明史的专家，在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论文后，随即编著了《洪武皇帝大传》的专著。前面论文的撰写为后面专著的完成，无论是从资料上，还是从思维上都起了铺路、打基础的作用。同样，在编著历史书著的过程中，常常又会发现一些问题，要求自己深入地予以研究，研究的成果既可以吸收入书著里，又往往可以专门写成论文以做更为深入的论述。这样，编写书著又能够为论文的撰写提出新的题目，引起作者新的研究与思考。

从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或者毕业以后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来看，无论撰写历史论文，还是编著历史书著都应该去做，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实践，二者不可偏废。这不仅是史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即有的研究成果宜于以论文形式发表，有的研究成果则以出版书著形式为宜，而且撰写论文与编著书著这两种写作形式，我们都应该学会，有一定锻炼，具备这方面的功力。这样，在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才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第一节 历史论文的撰写

一、历史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般说，历史论文系指专门讨论或研究某个历史问题的文章；属于文章中的议论文体。它要求具备有论点、论据和论述过程等基本要素。

论点，指这篇论文所要阐述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观点。一篇历史论文就总的论点看，一般只有一个。例如，关于王莽的评价，有的论文持否定态度，并把他和东汉开国之君刘秀进行比较，认为刘秀是“顺应民心”的进步势力代表，而王莽则是一个应当否定的人物，其“改制”，“不是一场有社会意义的改革，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王莽与刘秀》一文）但是，也有的论文认为，对他不能全盘否定，其“改制”中的实行“王田”、限制奴婢，均“无可厚非”，“五均”和“六莞”也“在客观上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王莽改制再评价》一文）以上两种论文的看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自己明确的论点，或是否定王莽，或是主张“不应当全盘否定王莽，其论点鲜明而且集中。

论据，是指围绕着论述其论点而持的依据、证明。它们或者是史实，或者是理论，所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史实而言，有的是征引大量的史实，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论点。有的是有新的史实发现，或虽则不新但却无人使用，以对于自己的论点提出前人所没有的新证据，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后，出了一批专以这个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订正旧的文献资料，从而对秦史不少问题提出新看法的论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这批新发现的秦简作为史料依据，推翻、重新探讨某些旧的论点或看法。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善于利用诗歌等文艺形式、作品研究历史，开辟了“以诗证史”的新局面。他用元稹、白居易的诗作为史料论证、佐证某些唐史问题，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在《柳如是别传》中，他以钱谦益和柳如是爱情、矛盾故事，考据了明末清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他写了《读东城父老传》，从这篇唐代传奇故事的内容，说明当时长安少年多胡化，社会风俗服装也渐染胡风的历史事实，等等。他独辟蹊径，以某些别人都知道的文艺作品作为史实之论据。有的史实并无新颖之处，别人亦有应用，但是，作者对之另有新解，以为论据，得出了别人所未曾得出的结论。如，同样是研究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口号，都很重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句记载，有人做如是标点：“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认为这次起义反映了农民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平等”的思想；有人标点不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得出了相反的看法；还有人提出“是法”并不是指的方腊起义部众大多信奉的摩尼教的教义，而是指的佛教，是一句批评佛教教义中“并无提倡平等主张”的意思，等等。

论述过程，指的则是为了以论据论证论点而采用的表述形式，实际是一种构成历史论文的思维方式。例如，有的论文以正面论述为主，兼及批驳他人的看法，像《论秦始皇》、《论康熙》以及正面论述历史上某一制度、某一事件或某一现象的历史论文。它们的共同论述特点，都是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然后运用论据一步步地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符合论点的结论和看法。其中，有的已经寓含着批驳别人的意思；有的则是专在文中或文尾顺便地驳斥几个或一个他人的意见或问题。但是，总体地看，它是以正面树立自己的

论点为主的。另一种历史论文却是以驳论为主的写作形式。这种论文往往一上来即明确地摆出别人的论点、看法，甚至别人借以立论的论据，然后象“剥笋”一样，逐一地将其驳倒，当驳倒对方后，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和意见。当然，也有的是边驳别人，边阐述自己的看法。总之，这种论文的论述过程是以鲜明地驳别人论点为主的，其中对于自己的意见亦是在“驳”中予以树立和阐述。

一般说，论述过程还有以下两种情况。

1. 偏于从“纵”的方面，进行论述。如，一篇论历史人物的论文，从他的前期论到他的后期，尤其注重于其中间的“转变”或“发展”，最后得出对于这个人物的公允评价。象关于梁启超前期和后期史学思想变化的论文，孙中山新旧三民主义发展的论文，刘邦、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转化”问题的论文等，都属于这一类。它的特点是一种属于历史地考察和论述的过程。

2. 偏于从“横”的方面，进行论述。仍以一篇论历史人物的论文为例，可以不必论述其由生到卒，前后发展，而是从其一生中几个方面的政绩或成就，加以论述，并评价其功过。象汉武帝，他的一生（尤其是其在位期间）几十年，政绩卓著，涉及到了削弱封国、设置十三部刺史、任用“酷吏”、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重农抑商、压抑富商大贾、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兴修水利、整治黄河、西北屯田、改良农业技术、发展生产；北击匈奴贵族以保障北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西域，加强西北尤其是新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经营西南地区，在那里设立行政机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我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等方面，如果写一篇《论汉武帝》的论文，就可以排列一些小的标题，从其在位期间政绩的各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勾勒出他的历史地位并对其功过作出评价。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历史论文用“某某某面面观”作为其题目。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从“横”的角度对一个历史问题加以论述的。无论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个历史制度、历史现象，只要冠上“面面观”几个字，其论述过程必然就是从其各个侧面给予深入地展开论述。先把一个历史问题分析成几个方面，然后分别进行讨论，最后再进行归纳，并得出结论，即是这种历史论文的最大特点。

二、历史论文的选题

历史论文的选题确定，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还要先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如资料的搜集、积累和有了初步的一定的看法、意见和心得。一般他说，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而又缺乏研究基础的论文选题，不要盲目地或简单地应人之约而去选择。

在这个前提下，一般人在确定自己的历史论文题目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和决定的。

第一，从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并结合着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特点。例如，过去曾经有些学者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写揭露历史上美帝国主义侵华和中朝人民在历史上共同抗击侵略者等的论文；有的学者在美国和前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和前苏联搞扩张主义时，写揭露历史上老沙皇向欧洲和亚洲扩张势力的论文；当西藏反动农奴主发动叛乱和国外反动势力妄图侵略

西藏、分裂祖国时，一些学者著文论述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成员；也有的学者结合我国在新疆等西北地区发展农垦事业，写了历史上西汉在西北地区首创屯田的论文，等等。

第二，着眼于史学自身的建设。有的是史学研究中的空白，如，50年代，史学界展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其时有不少论文发表，从而填补了此前关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空白。现在更多的历史论文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总是先认为史学领域中有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正好是自己研究的范围，于是下决心去研究它，然后将其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写出并发表。也有的历史论文是针对着别人论文中的观点、看法，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进行商榷。如，50年代和80年代初，关于历史上的宋江是否被宋王朝最后招降了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写过一些论文，彼此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方意见，阐发自己的观点。这种商榷论文有的还是直接对着史学界多少年的传统看法进行了“翻案”，其分量更重，如，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论文，就把人们从京剧中认识的大白脸曹操，由一个“奸雄”的形象还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确定自己历史论文的选题，还要事先了解有关史学界对于自己所定论文的研究信息、动态。这是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如果别人已经有了同样题目的论文发表，自己看后又感觉写不出什么新意来，就应该干脆放弃这个论文选题，另觅新的别人没有论及或虽有论及而自己能够再有新意的论文选题。一篇历史论文总要有新意。这样才能够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自己新的贡献，为史学的建设增添新的内容和建树。

一般说，历史论文的题目可大可小。大的选题，如，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文章，其内容往往涉及到了“有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系列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诸如，奴隶社会形成的条件、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基本区别，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如何起作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标志，中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具体途径，等等”，而其时间的跨度则又常常是从西周初年直到魏晋时期，前后可达一千多年。另外，像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等问题的讨论文章，亦莫不如此。小的选题，如论及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战争、人物、制度，乃至专门考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地点，某一条史料的真伪，以及甲骨文上的某一个字等的文章。

很显然，作为史学研究来说，大的或小的选题，都是需要的，都是构筑史学大厦所必不可缺的工作，但是，作为史学工作者来说有时却有分工，有些人更擅长于作大文章，有些人则写小文章顺手。这应该是允许的，也是实际存在的情况。

作为刚刚涉足史学研究的青年来说，一般地则以先写些所谓小的文章为好。这是因为无论是史学视野的开阔、史料的搜集，以及宏观的思考、心得，都需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方可完成。所谓小的文章写多了，便会为写大的文章自然而然地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如果打个比喻，就象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进程那样。早年，红军主要是打游击战，而到了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兵力、装备的壮大、发展等条件的出现和作战经验的丰富、军事指挥的娴熟，则自然而然地要发展到以打运动战乃至进攻城市的阵地战为主了。由写一些所谓小的历史论文开始，逐步地积累资料和研究成果，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能力和水平，然后写一些大的历史论文，直到在某一个史学领域里硕果累累，占据一席之地，而成一家之言，这实际上是不少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事史学研究所走过的比较实际的道路。

原则上说，历史论文的选题一经确定，即不应该再随便的变动，而要专心致志地将其写好。最怕定了选题以后，一遇困难就想另择新题，待再遇困难，又不能够坚持，换来变去，哪一篇也写不好，都半途而废，最后没有成果。但是，在定了选题以后，由于再整理资料或构思时发现了原定的选题过大或过小，在不放弃或超出原选题的情况下，还是允许对其作出一定的改动和变更的。例如，有的人原来定的选题是论某一个历史人物的，但是再整理资料和构思时却发现主要是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某一个方面的事迹或思想较有把握又确有新意，而于其它方面则并无什么新的更深入的意见，且资料亦显不足。那么，不妨就把原来的全面论述一个历史人物的选题，改成为集中地研究他的某一个方面的选题，这样写出来的历史论文较之原来，一定会更加地充实和深刻。反之，当再整理资料和构思时，发现远远超过了自己原先的选题，也是可以适当地将选题扩大，多写一些方面乃至论一下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

确定选题时，根据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方向，不是只定一个，而是定为一组，也是常有的事。如，有的人研究明太祖朱元璋，事先就定了“论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转化’”、“论明太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论明初的经济恢复发展与明太祖”、“论朱元璋民族政策”等等一组选题，然后在收集资料和构思时有意识地不局限于一篇论文的写作，而是着眼于对朱元璋的逐步全面论述，然后一篇篇地写作，直至最后完成《朱元璋研究》论文集和《洪武皇帝大传》两部专著。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写一篇论文时，心中先有围绕着自己有关研究范围与方向的全局，在搜集资料与构思时，同样地翻看一本或几本书，却不囿于一篇论文，而能够更广泛地注意其它几篇论文的需要，既节省时间和精力，又容易开阔思路，使得这个研究课题融汇贯通。同时，几个选题定下来，也会有利于引导着自己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更加地全面与深入。毋庸置疑，这种确定一组选题的做法，应该是值得历史论文撰写者借鉴和参考的好方法。

三、历史论文的写作和修改

大体上说，写作一篇历史论文，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 定题目。
2. 整理资料并且反复地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
3. 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即考虑如何通过论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述出来。
4. 拟定提纲。实际上是确定下论文的结构和论述层次。
5. 撰写。
6. 修改，定稿。

其中，定题目前边已经述及，一是选好题，一是在写作论文过程中根据

实际情况，还要对选题做适当地修正和调整。论文题目的文字也很有讲究，如有“论某某”、“试论某某”、“某某初探”、“某某刍议”和“谈谈某某”等等。关键是“文要对题”。首先，题目从外延到内涵上都要与文中的内容符合，要准确，不能够题目很大而内容却窄小，也不能够内容很宽，而题目却很小，更不能够文不对题。从题目的文字表述上也应如此考虑，要实事求是，切忌内容平平而题目文字的口气却很大，是论就写“论”，只是议不妨就写“浅谈”好了。题目的文字还要明确，不可含糊不清，让人看不清文中要说的内容。如，有过一篇历史论文的题目是“戎马生涯卅年”，就很不明确；乍一看，可能会以为是哪一位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的回忆录，其实这篇论文写的却是东汉时通西域的班超。如果把题目改成为“戎马生涯卅年”加一个副题目“——论班超通西域”，就会很明确而不致让人误解了。

关于构思论文的表述形式和方法，以及拟定论文的提纲，这是写好一篇论文的核心问题。在这里，写作者要考虑好这篇论文的开头即“前言”，定下它的结构即论述层次和逻辑，还要使之既展得开，又能时时围绕着论文的中心而不跑题，最后写好论文的结尾。人们常说一篇好的文章要“凤头、猪肚子，豹尾”，同样也适用于历史论文。一篇好的历史论文必须开头就点破主题、吸引读者，中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很有力量、结论鲜明、毫不含糊。

历史论文的具体动笔撰写和修改，是这篇论文最后实现和落实的阶段。由于各人的习惯不同，撰写与修改论文的方式亦各异。如，有人喜欢反复构思好了即所谓“打好腹稿”，然后才动笔写作，一气呵成，再作修改，最后定稿。有人喜欢构思一段即写出一段，认为光“空”构思不行，只有在写的过程中才能够完善自己的构思，而一经落实到文字上也才能发现自己原先构思的对错。有的人还必须写一段或一个小子目就行修改，待这段或这个子目修改得已经满意后再往下写，以为这样思路易顺而心中踏实。也有人非常重视一篇论文的开头，有时要写六七次才满意，然后下边就觉得笔很顺了，可一气呵成。还有的人重论文的间架结构，先写好开头、每个子目的各段论述以及各子目、各个段落间的衔接，再写好结尾，自己满意后，抄写时只须把使用的资料或引文“填”入即可了。尽管有如上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分重视自己在写作中的思维，要求始终思路通顺，得以贯通。写作论文固然有文字表达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个思维和思路的问题。认识了这一点，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就会始终地注意自己思维和思路的理顺和锤练，然后再去关注语言的通顺和是否有文采。

修改，是更重要的一环。论文水平的不断提高往往不是看一个人多写了几篇论文，而是看他是否对已写成的论文反复修改，直到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发表水平等。尤其是初学写作论文的人，切忌不要写了一篇即放下不管，或又去写另一篇，结果水平总是停留在原有的情况下，提高不上去；如果是写了一篇后，锲而不舍，征求别人意见再加上自己的琢磨，反复地修改，直到确实提高，达到了一定水平，然后再去写第二篇，就一定会在写作论文上不断地进步，而最后达到较为熟练、真正掌握写作技巧的程度。

第二节 历史书籍的编著

一、历史书籍编著的基本要求

当你准备着手编著一本历史书籍时，必然先要明确一些问题，这样才能动手编著，最后顺利完成，否则将会很难开始工作，或者写作过程中出现问题，难以进行下去而中途废止。

1. 明确书著的阅读对象

由于阅读的对象不同，编著出来的历史书籍就会完全迥异，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统治者尤其是帝王们阅读的，其目的是借以达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它的读者对象是帝王等统治者。无怪乎，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清代吴乘权编著的《纲鉴易知录》一书则明确地是为了“以科童子”，为青少年编写的。它的读者对象就是青少年，是为了让其初步地了解中国历史。我们看出由于两部史书的对象不同，从内容的详略取舍、分量轻重，乃至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上，都是有着很大的差异。

现在，一般地说编著历史书籍的对象主要有史学界的学者、高校历史系（包括成人大学、函授、电大等）的本科或大专学生、青少年和社会一般文化水准的人，以及阅读者可以兼顾几个方面的，等等。因此，在编写历史书籍时，首先就应该明确编写的史书是给谁看的，它的对象是什么人。例如，如果对象是史学界学者、历史系的本科或大专学生，那么所编著的史书就要强调学术性强、要有一定的深度，征引的史实不但要经过自己的考辨而且都应该一一注明其出处，最好还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当然，专著与大学历史系的教材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多地要注意学术性和成一家之言，后者则应该较多地考虑史学界的普遍意见和教学的需要、方便。有时也可以将二者“合二而一”，既是史学专著又可以用作大学历史系的教材。但是，如果读者对象是青少年和社会上一般文化水准的人，就要在注意科学性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书著的通俗性，无论是从内容上、原始资料的征引和文字上，乃至体裁、体例（如更多地是用史话体）等都要与史学专著和大学历史系的教材有所区别。其中，如果是专为中小学生学习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就更要注意其使用对象。由于它是中小学生学习完成历史课程学业的主要读本，编写这些教科书时就应该在注重历史学科科学性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中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认知规律和教学的特点，要使这些教科书好教好学，帮助历史老师顺利地完成中学历史课程的教学任务。现在，国家教委已经决定，中学历史教科书要在统一的要求下（即一个统一的历史教学计划和历史教学大纲）编出多样性来。几套各具特色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国家教委审定，在全国进行试用。历史教科书编纂学成为了一门方兴未艾、让人关注的新学科。

有些历史书籍，如有的历史人物传记、历史专题阐述或者以史为鉴的《中外治政纲鉴》、《国史镜鉴》一类的书著，既带有一定的学术性，甚至其中征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一般都加注或译成白话），同时又注意通俗易懂，作为向广大干部、青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好材料。它们的读者对象可以兼顾几个方面，比较广泛，因此，人们称这类历史书著为“雅俗共存”。

2. 弄清楚书著编写的任务、目的

古今中外，大凡史学家编著一部史书，都在事先有自己的明确目的，很清楚是书所要完成的任务。例如，古代希腊两位杰出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他们写作其历史宏著时都是抱着要把过去的历史真实地记述下来，为给后人以启示和垂训的明确目的。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希罗多德尤其注重要在自己的书中阐明雅典所以能够打败波斯，其主要原因是雅典为奴隶主民主制国家而波斯则是一个专制国家。他要对之做出褒贬，以宣扬奴隶主的民主制而鞭挞暴君。在该书第5卷第78节中，希罗多德就明确地说：“不仅这一个例子（指希波战争）可以证明，世界其他地区也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自由和权利的平等乃绝好之事。当雅典人蜷伏在暴君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一点也说不上有什么比其邻邦居民来得优越的地方；然而一旦挣脱了暴君的统治，他们就肯定地变得英勇盖世了。这些事实证明：当其在暴政压迫之下的时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主子，那时他们并不努力作战，而听任自己被击败；然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就人人竭其所能地争先效力，把国事当做自己的事了。”修昔底德在谈到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也清楚地对人们说：“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与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古代罗马的著名史学家们也都是在其著述史书时，就抱定自己的明确目的，希望完成一定任务的。凯撒写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任务明显地是带着宣扬他个人的赫赫战功、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在党同伐异的内部斗争中替自己辩护的色彩。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李维，正是在他写的《罗马史》中以多少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尽力地歌颂罗马人在历史上的爱国精神及其他优秀品德。他写道：“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罗马更伟大、更高尚、更有这样多的英雄模范人物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能像罗马这样长期地杜绝贪婪和奢侈，这样高度而持续地崇尚清贫和节俭，这样鲜明地显示出：财产愈少的人，愈不贪财。”另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塔西佗，由于本人对罗马共和制政体的追慕和对于他生活的帝国时代的反感，在他写作的史书中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赞美共和时期罗马人的英雄业绩和振作精神。同时，也时时流露出了对帝国时代世风日下、当权官僚们只会唯唯诺诺、奴颜卑膝的奉迎独裁者的憎恶。强调道德垂范成为了他写史的目的和任务。

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们更是如此，或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以总结历史上的规律，或是以借鉴历史以资治政（司马光），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隼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

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隼译本，第545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本，第17—18页。

李维：《罗马史》，罗伯茨（anon Roberts）英译本，《人人丛书》1926年伦敦版，第1卷，第2页。

或是为续一世、一朝一代的正统（《二十四》的一些断代史如《汉书》），总而言之，无的放矢的史书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现在要编著一本史书，无论如何首要的一点，就是先要明确自己即将写作的目的和任务，并且将其贯彻于编写史书的过程之始终。如，龚书铎同志主编的一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包括《当代爱国主义浅说》、《华侨爱国心》、《中国传统文化漫谈》、《近现代爱国诗词选注》、《现代爱国文选》、《当代军魂》、《他们为祖国拚搏》、《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旧中国》和《近代爱国者的足迹》等），在其“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讲了编辑本套丛书的目的、任务，提出：“爱国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使我国各族人民富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精神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民族如果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力量，不会产生凝聚力，也就必然导致民族的衰弱。”因此，“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同仁，力图为宏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点力量，做点有益的工作”而编辑出版了本套丛书。

在明确了这层目的、任务以后，还有一层意思要先行确定下来，即编著的史书要叙述哪段历史，解决历史上的什么问题。如，有的史书要解决中国的或世界的“通史”任务，从古一直写到今；有的中国史书要解决的是中国历史上某一个断代史的任务；有的世界史书则只解决国别史或地区史的任务；也有的史书则只是完成一个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制度或现象的阐述任务，一般称作专题论述的史书。

目的和任务确定下来以后，心中就有了谱，所编著史书的内容，即可以随之而定下来了。

3. 定下分期与断限

历史分期包括了人类社会几个大的形态的划分和每一种社会形态内部再划分的时期。这是编著史书时所不可能回避而必须先行解决的重要问题。分期又包括了它的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外延指从时间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起迄时间；内涵则指这一历史时期与其它历史时期在内容的本质特征上的区别和差异。这些都无不表现出了史书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认识即观点。

大的历史分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我国古代已经有了。如，儒家创始时将其以前的历史分作为“大同”和“小康”两个历史阶段，并对之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特征，分别地给予了概括性的勾勒。后来，法家的韩非则把截止到他以前的历史分成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等几个历史时期，同时对于后一个历史时期进步于前一个历史时期，给予了阐释。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又对人类古代的历史重新作了分期，如将其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当近代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一些人主要是以发掘出来的生产工具来划分古史，如将其分作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我们现在则主要是依据于社会形态的不同，把人类历史划分作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我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就是对历史划分的时期、阶段持相同意见的人，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之间划分的具体时间和标志，也都仍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例如，关于我国奴隶社会阶段与封建社会阶段之间的划分时间，在学者中就颇有异意。有人统计，至少就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这还是“综其荦荦大者”，“倘苦‘析产立户’，还可划出四家，即‘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

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根据不同时期的矛盾又带有其一定阶段性、特殊性的情况，一本史书往往又要将其划分为若干个时期。如，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内部分期，不同的史书就有着不同的划分法，有人统计，至少有“二分法”，即主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亦有主张西周至春秋为一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前为一期和隋唐五代以前为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算作一期，北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算作一期，以及主张以隋末农民起义为界标、以唐代两税法为界标、以唐末农民起义为界标，来划分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等等的具体不同意见）；“三分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又有主张由西周至秦统一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由秦至元末为其中期、由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为后期和“二黄主张”即以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为界标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及主张“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相当于战国到西汉前期”，“从西汉后期到明中叶，是封建社会迟缓发展阶段”，“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它的衰落阶段”等的几种不同意见）；“四分法”，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作四个时期（其中亦有分作为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的意见，也有分作为形成时期、发展时期、螺旋式发展时期和逐步解体时期的主张，等等），此外，还有“五分法”（如过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六分法”（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一书）等的几种分期方案。

在我们编写一本史书时，一般说或以根据编写的任务、目的和史书的读者对象来决定采取那种历史分期。如，我们编写的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或者大学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那么不妨就采用史学界比较公认的、为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分期意见处理。现在涉及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起止时间（元谋人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和奴隶社会的开始（夏朝），以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用春秋战国之际说，等等，即是属于这种情形。假如是个人的学术专著，一般说都是依据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意见、主张，采取“一家之言”的分期方法。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都是持“西周封建说”，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则用的是“战国封建说”。

断限，是指史书的记述所起止的时间。它同样是反映了史书作者对历史发展所持的认识、看法和观点。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断限的标准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可以供我们参考。该书说：史书的断限标准应该是：“从总的方面看，首先要根据社会性质断限；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从具体方面看，比如说从某一性质的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则必须从经济状况、政治状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多方面作

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第39页。

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第88—96页。

综合考察，以确定其本身的断限。”具体地说，一本史书的断限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

第一，断限在什么时间，应有一个标志。能够做为历史断限标志的，一般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和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等等。也有的虽无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从历史整体看，一系列带有本质性历史现象的出现，也能够做为历史断限的标志。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起始时间，都是以中国或世界上正式出现了人类作为标志，其依据则是学术界关于古人类化石的重大考古发现。现在，世界历史的下限（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当代史）一般地都是断限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是因为这时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两级格局，正在向多极世界演变。这里不仅仅是发生了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总体变化来综合决定的。

第二，史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这也是决定断限需要考虑并受到制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是资料是否已经足够地充实或者是否已经披露出来。如，考古新发现有关古人类的化石、遗址等资料，是否足以将人类历史的上限推前；当代史的某些资料是否已经问世，足资使用，将历史的下限推得更近，等等。一方面是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研究，能否是以达到使人们可以写作出一定上限和下限的史书。如，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的书著其下限，就往往要视此作为决定。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古代史学关于“后朝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4. 确定史书的体裁和结构

史书的体裁是指一本史书所采取的表述形式；结构则指这本史书的内部都由哪些部分组成。这自然也是史书编著必须予以考虑和确定的一个问题。

拿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和结构来看，就十分丰富。《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一般认为，“记言”和“记事”是我国古代史书最早的两种体裁。这两种体裁从现有的《尚书》和《春秋》两部史书来看，其内部结构都是极其简单的。

后来，史书的体裁越来越发展了。但是就其主要的说，大致是四种，即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或称政书体）和纪事本末体。一直到近代，这四种体裁一直被旧史书的编纂所分别采用。以其中的纪传体为例，可以看出它的内部结构还是颇为丰富的。这种史书以《史记》作为开端，直到《清史稿》为止，囊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也可以说还包括了我国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历史阶段的历史）的全部历史。它们的内部结构大体上有“本纪”、“列传”、“书”（有的称“志”）和年表等几个部分。《史记》还独有“世家”部分。“本纪”和“世家”，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本朝或封国的小编年史；“列传”则是历史上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书或志是专题史；年表则是一种历史图表形式。

以上旧史书的体裁，由于受其内容（大都以中国史为主，贯穿了王朝正统观念和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观）和时代所限，自然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今天编写史书已经不再有人予以照搬照套地采用了。但是，它却仍然是我国史学遗产的一个极其丰富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编著史书是应该予以批判地继承的。只要是抱着“古为今用”和“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它们就仍然能够在我们今天编著的史书中，焕发出自己的光彩。

近代史书的体裁，主要是章节体。我国最早使用章节体编著史书的是夏曾佑。他早年与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等交往密切，曾撰文于维新派的《时务报》；后来则专门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使用章节体写成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版该书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章节体这种史书体裁，将其所述历史按照编、章、节、子目……等的形式，予以编著；其最大的优点是从中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层次、联系，从而了解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如，“编”可以标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标以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等；如是断代史则可以标以断代史内部的分期或专题。“编”下的“章”则可以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标以某某时期（或王朝），也可以标以历史发展的某一个侧面，如政治、经济、民族关系、阶级斗争、对外关系、文化等。“章”下的“节”与“节”下的子目，则是在这些“章”与“节”的外延之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以及所生活的历史人物或实行的历史制度等。

章节体史书的内部结构，也可以是十分丰富，并且多姿多彩的。如，一般地都包括有目录、正文、注释、插图（包括彩色的或黑白的历史图画，文物照片和历史地图）、图表（包括历史现象的表解、大事年表和朝代顺序表、帝王世袭表等）；如系教材一类的历史书，还往往有章或节的内容提要、思考题或练习题，以及参考书目和论文索引。

现在，我们编著的史书，还有史话体、图解体等。史话体其实即是章节体的一种变化，它往往虽然不标出编、章、节来，但是，仍然保留着章节体编写历史注意分出层次的特点。如，史话体中大小标题标以“一”、“1”、“（1）”……或者采用黑体字等印刷字体上的变化，就都是这个意思。一般说，史书中的专著（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题研究等）、大学教材或者雅俗共存的人物传记等，都往往采用分编分章分节的形式，而通俗历史读物往往多用史话体。少儿历史读物还大多采用杂以图解等的形式。

5. 注意文字表述

史书的文字表述，也是我们编著一本史书时所必须予以考虑而不可忽视的问题。

自然，由于所编著的史书内容不同和读者对象的区别，在文字表述上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如，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势必要征引较多的原始文献资料，文字表述上自不可过于“通俗”；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的专著，虽然也要大量的引用文献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大多为白话体，读起来自然地“通俗易懂”。通俗历史读物与历史专著的文字表述也必然不同，前者不引或少引原始文献资料，并更多地要注意文字上的通俗化，而后者则不必过多地顾忌读者读不懂的问题，因为它的对象理应是具有一定水平的史学专业工作者。

但是，作为历史的书著，在其文字表述上，还是有着某些共同性的基本要求。

首先，史书的文字表述要能够很好地体现史论结合。一本史书一定要有翔实的史料，要有充实丰富的史实。同时，也要能够让读者看出该史书所持的观点，要体现出其一定的理论深度。单纯的史料堆砌或者只有空洞的分析，都不能够算作是完整的史书。

我们看到在史论结合方面，不同的史书是采取了不同表述方式的。

寓论于史

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史书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表述方式。它的特点是，全书以叙述史实为主要表现形式，而把作者的观点贯穿在这些叙事之中，使之蕴含而不直露，让读者从史实叙述中即能自然而然地予以领会、认识。

在这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典范。

它在《李斯列传》中，写了李斯年轻时的一个故事：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一段故事，司马迁虽然未加任何一句分析、评论，但是，却蕴含着司马迁对于李斯一生在政治上一心钻营向上爬而不顾其它的个人品质的看法。同传后来记述的李斯活动、言谈，包括他在赵高的利诱、威胁下与赵高共同策动谋害秦始皇长子扶苏、立胡亥二世皇帝的阴谋等，都贯穿了李斯的这一政治投机、只顾自我的品质劣根。

它在《刘敬叔孙通列传》里，写了两个品质迥异的人物；一个忠厚朴实、耿直而不喜阿谀，另一个则善于曲从逢迎主子的心意以邀宠。司马迁对这两个人物的如上品质选用了他们穿衣服的“小”事加以描绘，同样用的是“寓论于史”的笔法。对于刘敬，司马迁写道：“娄敬（即刘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指刘邦）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关于叔孙通，他则是这样写的：“叔孙通儒服，汉王（即刘邦）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两个小故事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两种人品和两种性格。《史记》的这种表述历史的方法得到了后世史家的首肯和效仿，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太史公能之。”

点评

有人也称这种笔法作“画龙点睛”。其特点是在叙述史实之后，作者用自己的简炼语言，对之给予一定的评论，既分析这段历史又表明自己的看法、观点。

我国史书一直有采用这种“点评”笔法的传统。

《史记》于每篇“本纪”或“列传”之后，都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如在《项羽本纪》从“项籍（即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起，一直写到他与汉王刘邦军在垓下决战兵败后“乃自刎而死”及“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等终项羽一生后，使用“太史公曰”的口吻写道：“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王，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

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很清楚，这里的“太史公曰”即是对于前边项羽生平事迹的一个点评；它既说出了项羽的功过、在各路反秦“诸侯”中的地位，也分析了他之所以最终失败的原因，还驳斥了项羽自己的一些错误看法，可谓评论全面而公允。

《资治通鉴》中亦不乏“臣光曰”的点评；其中很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实足以反映出司马光对于为政、做人，以及对历史演变的深邃认识和理解。例如：

他在《资治通鉴》第 211 卷唐纪中写了唐玄宗奢侈淫乱的生活后，以“臣光曰”的形式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自厉节俭如此，晚节获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这段点评无论对于唐玄宗本人、唐代历史的发展，或是对于为君之道，都是非常中肯而很有见地的。

在《资治通鉴》第 220 卷唐肃宗乾元元年，司马光结合着书中写的裨将李怀玉杀害已死节度使的儿子，擅立自己亲戚为节度使，得到了肃宗的认可，从此开了军中将士自行废立节度使的先例这件事，在“臣光曰”中评论说：“《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眇眇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这段点评，不仅道出了唐代后期君弱臣强、中央集权统治失控于藩镇的历史事实及其治政举措失当的原因，而且讲了做为统治者制定政策要慎重，应该考虑深远的道理。

司马光在“用人之道”上很有一些好的见解，下面我们列出他在《资治通鉴》第 245 卷唐文宗太和八年针对当时的“朋党之争”及帝王应该如何处置、对待臣下等问题，写的一段“臣光早”，以窥其一斑。这段“臣光曰”说：“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显然，这段点评亦是十分深刻的。

在《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中，也有些论到教育子女、为人之道等的内容。如，在《资治通鉴》第 22 卷汉武帝征和二年讲完武帝的戾太子与当时丞相有矛盾、互相攻战于长安、兵败自杀的史实后写的“臣光曰”，就明确地提出了太子的培养教育问题。他说：“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关于“为人之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 279 卷后唐潞王清泰二年的“臣光曰”中，专门就大臣孙光宪等人的个人品性及其与治政、修身的关系所发表的议论就十分中肯。他指出：“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

这种类似旧史书如上“太史公曰”、“臣光曰”的点评一类的笔法，在

现代人编写的史书中也被广泛地运用。例如，一些通史、断代史、专史等的著作中，常常就是在叙述完某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或历史现象之后，写上一段评论，或评其性质、作用、历史意义，或评其得失、经验教训，等等。所不同的是，现代人写的史书中，但凡这些评论文字，只是缀于史事其后，不再加上什么“××曰”之类的辞句了。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关于史鉴类的史书，如《中外治政纲鉴》、《国史镜鉴》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某些专题（如勤政、清廉、用人、纳谏、改革……）作为中心，然后选取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事例，加以编写，以为今日汲取历史为鉴的功效。其中，有的书著写法即是直录一段历史资料，然后以不同的字体写出评论。这种笔法就更是与旧史书的点评非常相似了。

夹叙夹议

这是现代史书最为经常采用的写作方法。它也能够更好地体现史书中史论结合的要求。夹叙夹议的写法最大的特点是一边叙述史实一边即夹入作者的分析、评论文字，并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下面选一段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文字，大家从中体会一下这种写法的特点。

在《中国通史》第三册讲到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后期，唐军与安庆绪作战时，写道：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俶，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七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全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大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可以看到，《中国通史》上述一段文字，既是很具体、细致地把从安庆

绪失西京长安、退守邺城，到史思明大败唐军、杀安庆绪、自己称帝止的历史事实，叙述清楚，同时也夹入了许多作者的分析、评论，有的是专立一段，有的则径直放入叙事当中，把唐军失败的原因从各个方面说得很透，还为下面的宦官专权作了铺垫，可以说是夹叙夹议这种笔法的很好体现。

其次，史书的文字要求准确、生动，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

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目的重要的是要真实地认识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样地，史书也必须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够保证这一点得以实现。这就要求史书的文字应该重视准确无误，以写出信史。

史书文字表述的准确，首先表现在记述事实上要求真求实。这就要求我们如同前面讲过的那样，对于史料、史实的选取务必经过严格的考据。翔实的史料、清晰的史实，既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亦是编著史书时文字表述的根本依托。

除去基本史料、史实要准确地予以表述外，记年、记地常常是文字表述准确与否的重要表现。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假若在记时、记地上出现错误，那么历史就决无什么准确可言，甚至要出现“非常荒诞的事情。”

记年上比较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西历法的换算和中国古代王朝纪年中的岁首问题。前者要求我们要紧密地注意中国古代史书中所说的某某年中的某某月并不即是公历中的相应年代的同一月份，如陈胜起义爆发的时间是秦二世元年的七月。这一年相当于公历纪年的公元前 209 年，但是，“七月”并不等于就是公历纪年该年的“7 月”。我们编著史书时为了准确地记述陈胜起义爆发的时间，就要查阅一下陈垣编著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找出对照的年月，或是直书“公元前 209 年七月”，而不可以简单地写成为“公元前 209 年 7 月”。后者则要注意在中西纪年年代互算时要考虑到中国古代王朝纪年中岁首的月份。如，秦王朝以十月为岁首，和有的王朝以正月为岁首不同，在与公历年代换算时就必须予以考虑和关注，否则便会出现错误。

在记地上，一般的史书都应该注上相当于今天的地名，同时还要注意几个问题，否则即会出现谬误，而在展示历史事件等赖以存在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上，给人们以不正确的认识。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于史书记地上应注意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概括，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编著史书时的参考。该书在其第五章讲“史书的体例”时，说：“我们今天编著史书，在记地的体例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注意历代建置的变化。汉州、唐道、宋路、元省，这是大的变化；其下，或含郡、县，或含州（府）、县，有二级制，也有三级制，都应有所交代。其次要注意常见的地理概念。山东、山西、山左、山右，关中、关内、关外，关东、关西，关左、关右，河东、河西，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等，都是史书上常用的地理概念；沿用这些概念，必须注意其原意，才不会给今天的读者造成误解。第三要注意同地异名与异地同名。如今天的北京市，春秋战国称蓟，辽称燕京，金称中京，元称大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1 页。

这两个纪年著作都有中西历年、月、日的对照，在中历与公历纪年的互换上可兹参考。

明称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又改称北京。这是同地异名。如就“北京”这一地名来说，唐、五代指太原府，北宋指大定府，金先后改称临潢府和大定府为北京，明初以开封府为北京，旋又建顺天府为北京，即今天的北京市。这是同名异地。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不应相互混淆。第四要注意古今地名未变而管辖范围已有很大差别。如上海，在宋仅是一镇，元设为县，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为上海市，而现在的上海市则辖十区、十县。如扬州，相传为古“九州”之一，泛指我国东南地区；汉唐时期为州名，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与河南的少数县份；隋唐以后改为州、路、府名，辖境相当今江苏扬州市、泰州市、江都、高邮、宝应等县；1949年浙江都县城区置扬州市，此即今天的扬州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史书记地时应有所说明。第五要注重实地调查。以往史书上记载的地名，实指何地，在解释上有时含混，有时有错误，须经过实地调查，加以核实。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北宋与西夏大战于永乐城，双方兵力总计不下50万。历来有关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永乐村。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调查，认为永乐村是一个狭窄、缺水的小山沟，不可能是几十万大军决战的地方，而米脂县的马湖峪才是永乐城故址。

……可见实地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以往史书记地的错误和疏漏，还可以进而认识到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第六要注意对历史地图的运用。史书记地，最好附以必要的历史地图。……最后，我们今天在史书里记地，应当比古人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不只是从地理沿革上要求，而且还要把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条件。马克思重视自然条件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他在讨论劳动过程的时候，把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规定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劳动生产的自然条件；劳动资料，也是离不开自然条件的。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他在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马克思的这些话说明了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说明了控制并利用自然力的必要性，这对我们的史学工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重大问题，如广大国土的统一，各民族间不平衡的发展，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南方北方经济地位的消长等，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中得到启发，从而作出科学的说明。这是我们今天编著史书在记地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

在古今地名对照上，我们编著史书时要充分地运用一些专门的或载有古今地名对照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藏励龢等编，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1982年重印）等。由于现实中国行政区划不断地有着变化，一些古今地名对照的工具书势必有的要显得陈旧。因此，在使用它们查对古今地名对照时，还要注意新的政区变化情况，以免出现讹误。

当然，一本史书要想在文字表述上不出或者少出错误，关键的问题是要作者有一个认真、严谨的态度，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从编写、誊抄直到书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自序。

以上所引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1卷，第202、260、261—262页，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稿排版印刷后的校对工作，都应如此。一些同志都注意到了《汉书》在关于陈胜的记载上有一个不应该有的错误。该书在其卷 31《陈胜项籍传》中说：“高祖（即刘邦）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到王莽时乃绝。”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句话只从字面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班固修《汉书》是在东汉明帝建武三十年（公元 54 年）开始的，完书当在章帝建初八年（公元 87 年），所谓“至今血食”，显然是说直到东汉明、章二帝时仍然有人在为陈胜守冢、祭祀，但是，却又写了一句“到王莽时乃绝”，这就很让人费解。可是，我们看看《史记》卷 48《陈涉世家》就明白了。原来，《汉书》关于陈胜的这段文字记载全部抄袭于《史记·陈涉世家》，只是加了一句“到王莽时乃绝”。其实如果去掉“至今血食”几字，换写为“至莽篡汉前仍血食”即清楚了。由此可见，就是班固这样的大史学家，如果稍有疏忽，也是会在史书的文字表述上出现错误的。

史书应该让读者爱读，有较强的可读性，唯此才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效。这就要求史书必须写的有血有肉、生动形象，而不能只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规律，甚至成了“社会学的公式”。要使史书写得生动、形象，一是要注意写出史事的情节，二是要注意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在这方面，过去的史书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如，《史记》在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场面等上，就有许多篇章堪称一绝。写人物，象《高祖本纪》，把个刘邦从微时在乡里与朋友四邻相处，到起义反秦、与项羽争衡天下，直至最后称帝建立汉王朝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所建的功业，善于用人，能听取他人意见的政治家风度，以及其不拘小节、豁达大度乃至多少带有流氓无赖的性格，都写得淋漓尽致。一个 2000 年前叱咤风云的豪杰、帝王的形象，在司马迁的笔下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写战争，象项羽“破釜沉舟”救赵与秦军的巨鹿之战，无论是战前项羽的义无反顾决一死战的必胜决心，还是战场上义兵“无不以一当十”的勇敢冲杀气概，以及其它“诸侯军”的胆怯畏缩作“壁上观”的丑陋形象，都在《项羽本纪》中被活脱脱地写了出来。让人读了仿佛这场亘古战争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写场面，象刘邦、项羽的“鸿门宴”，《史记》通过项羽、刘邦和范增、张良、项伯、樊哙、项庄几个人物的坐立、言谈举止，以及时而剑拔弩张，时而化险为夷的气氛烘托，同样地活灵活现地展现出了当时的“宴无好宴”的历史独特场面。综观《史记》的一篇篇人物传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都是一篇篇生动的散文，无怪乎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他的史书如《左传》、《汉书》、《资治通鉴》等等，亦都如此；其中都有我们编著史书作文字表述时的很好借鉴与参考。

为了把史书编写的生动形象，旧史书在载言（写入人物自身或他人的语言、评议）和载文（全录或节录人物的著作、文章以及诏令、奏章）上也都有许多的优良传统，亦都值得我们编著史书时予以充分吸取，批判地继承。

二、历史书籍编著的一般程序、过程

1. 确定书名

2. 制订编写凡例，包括规定该史书的读者对象，编写目的，宗旨，体裁即以史话体还是以章节体编写，内容特点，书内结构，基本观点和史料选择，断限、分期和记年、记地的具体要求，文字要求，字数和完书时间等。制定

编写凡例时，要参考其它已出版的类似史书，避免是书与别人编写的史书重复，保持、具备自己的特色。

3. 收集和整理史料（对史料的整理，可视要编写史书的情况和个人的特点、习惯，可以按照专题整理，也可以按照年代、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整理；按照年代、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史料，对于史事来说又叫“长编”，对于人物生平来说又叫“年谱”）

4. 编写、设计全书提纲

5. 写作、撰稿

6. 修改

史书完成的标志是“齐、清、定”。“齐”指齐备，要求全部书稿撰写齐了、不缺章少节，是一本完整的书；“清”指稿子清楚，包括稿面、誊抄、字迹几个方面，不可在书稿上划的乱七八糟，使编辑和排字工人无法识读；“定”是要求最后交出的稿子是定稿，而不是未定稿乃至草稿。

最后，我们还必须说说集体编著史书的问题。一部（或“套”）大一点的史书，往往要有较多的人参加编写，须要集体力量协作完成。但凡集体编著的史书，除了以上编著史书需要注意的问题和一般程序、过程要遵循外，还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1. 主编应该确实对全书负起责任。

集体编著史书都要设立一位主编（有时是几位主编，并设副主编）。主编的职责是通盘考虑、决定全书涉及凡例的一些根本问题，为全书定个“谱”，组织编写、撰稿队伍、确定人员分工；协助具体撰写各个部分稿子的作者解决其撰写中的问题；收齐稿子，修改和通串全书，在观点、史料等思想性、科学性上把关，在文字上力求全书划一；撰写史书的前言、后记；定稿、发稿。目前，有些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带进了我们编书工作中来，如有的主编只是署名，目的是为了名利，而并不做具体事情，更谈不上对于所编著的书稿负责，这些都应该是集体编著史书时所必须予以反对和摒弃的。

2. 作者应该努力地完成自己分工部分书稿的撰写。

集体编著一部史书，参加的人较多，大家总要有个分工协作。主编应该根据每位作者的擅长和特点，安排每个人的写作任务，充分调动每位作者的积极性；同时，每位作者亦要有协作精神、集体观念，从全书完成的大局着眼，既可以充分地就全书的凡例、分工提出个人的意见，又要互相照顾，不能只是突出个人，还要很好地体会全书编写的宗旨、意图，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一部分任务。

现在，有人认为集体编著史书涉及的人多，组织工作麻烦，容易意见分歧，还有个团结问题和每个人的责任心强弱问题，不容易保证书稿的质量。因此，不如单个人自己写书“痛快”。其实，集体编著史书本身亦是一种客观需要，并有其各尽其才，完书时间快，发挥集体力量攻关的优点，我们对之决不能一概否定，遇到大的书稿时还应对之予以提倡。集体编书能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优势，确实保证书稿质量的关键，一是要组织好集体这支作者的队伍，一是要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当然亦要在成书后的署名、报酬等方面做到公平合理。这里，尤其是主编更要胸怀全局，不苟私利，能够团结大家，调动起每位作者的积极性，负起自己应负的编好书的責任。在集体编著史书，充分发挥其优势，最后完成其任务上，我国古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现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

《国史纲要》等恢宏巨著，都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在如何更好地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史书的编纂任务上，我们是能够从它们的编书过程和组织工作中汲取到许多宝贵的参考和借鉴的。

